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主办 邮发代号：2-500 零售：0.15元/份

炎黄春秋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三门峡地质会战人员

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

“陕北才子”贾拓夫
说真话遭厄运引发的思考

于光远：纪念革命先烈杨匏安百岁诞辰

“第二条战线”的闯将
袁永熙的传奇人生

冰心子女谈冰心家教

11
96



贾拓夫

炎黄春秋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长征·世纪丰碑 大型系列活动成果汇报会、中国西部开发国际研讨会开幕式



一老红军杨尚昆、萧克、张爱萍、廖汉生等出席成果报告会

陈炜华 摄



一老红军张爱萍将军(右一)接受电视台采访



一组委会副主任张钰秀(左)向总后科技开发部周国泰颁奖



一青年人请老红军签名留念



一组委会副主任老将军王诚汉(右)向上海电视台台长、大型专题片《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负责人盛重庆颁发纪念奖。

一王定国等红军女战士相互问候，互祝健康长寿



顾问(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朝闻 冯文彬 伍修权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絮青 费孝通 谢冰心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常 征 温济泽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 巍 魏久明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洪 炉

执行主编:刘家驹 王恂 舒元璋

理 事 长:杜导正

名誉理事(单位):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河南省炎黄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简祖扬 李华鹏

理事单位:

深圳市兴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顺地实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飞无线电电讯发展公司
深圳市建设基础工程公司

理 事:孙敏伟 宋晓洛

秘 书 长:徐 孔

副秘书长:段向群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邮编:100802 电话:66170955

排版:北京维科电子技术研究所

印刷:世界知识印刷厂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 购 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
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M

出版日期:每月 11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 价:4.00 元

春秋笔

- ②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张纪夫 谭德峰
⑩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 劳允兴

求实篇

- ⑭“陕北才子”贾拓夫说真话遭厄运
引发的思考 王尔澄

殒星篇

- ⑳纪念革命先烈杨匏安百岁诞辰 于光远
㉔我的父亲杨匏安烈士 杨 明
㉔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胡愈之 马仲扬

民族园

- ㉓跟着红军走到如今的扎喜旺徐 李志刚 李泰年

文荟园

- ㉔毛泽东与京剧演员李和曾 冯彩章 李葆定
④⑩诗六首 强晓初
④①台湾作家的乡土情中国心 王景山

遗闻录

- ④③江青诡踪查武训 傅哲清 傅 军

赤子心

- ④⑧冰心子女谈冰心家教 满素洁
⑤③吴清源驰骋日本棋坛六十年 吴景略

人海浪

- ⑤⑨“第二条战线”的闯将
袁永熙的传奇人生 章学新
⑥⑥梁实秋之女梁文茜的昨天和今天 杨小武

古镜台

- ⑦①居官之箴规 察官之明鉴 李文林
⑦②太平天国的禁赌禁娼禁毒 邱远猷

古今谈

- ⑦⑤欧阳修严以责包拯 春 江
⑦⑦闻一多眼中的美国 李 凌

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 张纪夫 谭德峰

1964年10月16日,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冲击波在新疆罗布泊戈壁滩上横扫亘古荒寂的时候,毛泽东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嘀铃铃响起来,周恩来略显激动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听到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毛泽东却显得异常冷静。究竟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外国人不承认怎么办?他说:要详细查清楚。

大约人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久久的冀盼一旦实现,潜意识里往往会闪过短暂的疑惑。此刻的毛泽东是否持这样的心态?何况,13日和14日,试验现场总指挥张爱萍、副总指挥刘西尧曾两次从试验现场报告:从最坏处出发考虑问题,有可能出现炸药爆炸了而核爆炸未发生的情况。因此,毛泽东此刻心里产生是不是真的核爆炸的疑问,也在情理之中。再者,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是要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事件,不能因一时的兴奋简单地根据某些现象仓促作出判断。冷静,稳健,智慧,是毛泽东的临事风格。

不久,电话里又传来周恩来的声音:“主席,经现场进一步考察,原子弹爆炸试验确实成功了。”

“再查,不要忙于公布。”

放下电话,毛泽东走到窗前,他那深邃的目光穿过树干不高但枝叶茂密如伞状的龙爪槐,越过庭院径侧苍劲、挺拔的古柏,看得很远,很远……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

10年前,也是群雁南飞的金秋,也是周恩来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地质部反映,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一句话激起了毛泽东全部的兴奋神经,他当即要周恩来约地质部负责人明天一谈。

明天一谈,如此紧急,实在有些异乎寻常。其实,只要回顾一下近几年国际政治、军事斗争情况,就十分明了了。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



周恩来在原子弹爆炸
两小时后宣布：我国成功
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将战火一直烧到中朝边境。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很快把美军逐回到三八线以南。

世界为之震惊。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时乱了方寸，在玩弄停火阴谋的同时，乞灵于原子弹。1950年11月30日，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时威胁说：“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

继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45年是反对杜鲁门下令在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但7年后他登上总统宝座，“一阔脸就变”，居然也声称：“为了避免使进攻付出高昂的代价，显然，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

随后，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形势紧张的时候，美国的头面人物还不只一次地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美国几次三番地在中国头上挥舞原子弹，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义愤。1951年夏，世界人民和平大会主席、1935年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获诺贝尔化学奖的著名核科学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对他即将学成归国的学生杨承宗说，请转告毛泽东主席，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没有什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对于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毛泽东那数十年来为中国人民遮风挡雨的伟岸身躯，自然感触最深，压力最大。他和地中海岸边的约里奥的心是相通的。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美国的核讹诈核威胁迫使毛泽东下决心研制核武器。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流血牺牲，推翻“三座大山”，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在50年代，世界上流行这样一种观念：核武器是现代化的和唯一真正具有决定意义的军备，一个国家要是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低人一等。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必须掌握原子弹。

1953年下半年到1954年间，朝鲜半岛、印度支那丛林上空的硝烟陆续散去，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果实初结。这时，著名核科学家钱三强向中央提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建议。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提出了包括研制原子弹在内的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的设想。国内要求发展核技术、研制原子弹的呼声日益高涨。

毛泽东洞察历史，审视环球，从时代特点、人民要求、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然地把发展核科学技术研制原子弹提上了议事日程。

关于核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毛泽东是有所了解的。当时,科学家们艰苦创业,训练了一些人,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可是,铀矿资源方面呢,音讯尚无。如果只有核科研这只轮子,没有铀矿资源这另一只轮子,原子能事业这辆列车是开动不起来的。美国、英国早期研制原子弹用的原料是从刚果、南非、加拿大购买或掠夺来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一般物品尚且如此,遑论铀这样的战略物资。其实,即便能买到,中国也买不起。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必须立足于国内的铀矿资源,舍此别无他途。

正是在毛泽东运筹发展原子能事业,急于想了解铀矿资源方面情况的时候,传来了广西发现铀矿石的消息,这能不令他惊喜万分,并急于想知道进一步的情况么!

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

第二天,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刘杰带着从广西捎回来的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来到毛泽东住所的会议室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已经坐在那里等着了。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刘杰的简历。汇报会从一开始便充满了亲切的气氛。

刘杰先介绍了铀元素的特性和战略价值,接着汇报了地质专家去广西等地考察铀矿资源的经过情况。

他边说边拿出蜡黄色的矿石标本请毛泽东、周恩来观看,并打开探测仪器作表演。当毛泽东、周恩来从探测器中听到嘎嘎的响声时,既感到新奇、神秘,又显得格外高兴。

“下一步有什么安排?”毛泽东问刘杰。

“根据专家们初步考察的情况看,我国南方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的可能性很大。”刘杰回答说,“这些地区有湖南衡阳、郴县、汝城,江西的上饶等地。我们准备组织力量在这些地区进行勘察工作。”

毛泽东听了刘杰的介绍,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插话说,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

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起身送刘杰到门口,他握着刘杰的手,端详着这位瘦瘦的有着宽广的前额和机敏眼光的39岁的年轻部长,笑着嘱咐说:“刘杰,这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大事哟,要好好干喽!”

由于发展原子能事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际政治斗争中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事关重大,毛泽东于1955年1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他说话时眼光落在李四光和钱三强身上,大家都明白,今天的老师就是他们了。

李四光首先对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表示赞同,接着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介绍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工作的筹备情况。

钱三强则着重介绍了核科学技术发展简史,美、苏、英、法等国发展原子能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所做的工作。

为了加深大家的直观印象,钱三强拿出物理所自己制做的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在口袋里从桌旁走过。当计数器发出嘎嘎嘎嘎的响声时,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人亲自做试验,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赞成发展原子能事业。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开始作总结性讲话:“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次会议整整开了三个多小时。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饭。毛泽东本来不喝酒,这次却特意准备了红葡萄酒。席间,毛泽东举起酒杯站起来,大声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让核工业坐上汽车前进

1954年10月3日,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会议室,中国和苏联两国最高级会谈正在进行。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中苏双方各自对国际局势、国内情况作了阐述和介绍后,赫鲁晓夫主动问中方。

苏联派出最高级代表团前来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活动,表明中苏修好进入最佳蜜月期。赫鲁晓夫在斯大林去世不久就取代马林科夫成为苏共第一把手,但他还面对着以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等为首的强大的反对派。这次他亲率代表团访华,就有寻求中方政治支持的底蕴。因此,会谈中他主动作出友好的表示。

会谈前,毛泽东、周恩来等商定,在核武器研制方面也要抓住时机争取苏联援助,以求有个较高的起点和较快的发展速度。

因此,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你们在这方面能不能对我们有所帮助?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回答感到突然,愣了一下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不用大家都来搞它……如果你们十分想要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会太多。”

显然,赫鲁晓夫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要求。当然,答应提供一座实验性反应堆,即使美、英

已经宣布放弃在科研和核能民用方面的保密政策,也不失为一个友好的表示。至于“核保护伞”一说,民族国家观念极强的毛泽东是一定会嗤之以鼻的,只不过当时不是表示的时候罢了。所以,他只点了点头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苏联氢弹爆炸的冲击波不仅冲破了西方原子孤立主义的围墙,也进一步推动了美苏核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深感核原料的匮乏,因此,提出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联合开发铀矿资源的意向。鉴于在开办新疆有色金属公司等四个中苏股份公司时的某些教训,所以,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动议起初持不赞成态度。但是,考虑到这有利于引进、掌握铀矿地质勘察技术,毛泽东还是批准了中苏关于在中国合营开发铀矿资源的议定书(一年以后改为中国自营,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这导致了中国大规模铀矿地质勘察工作的开始,使中国地质人员较快地掌握了铀矿地质勘察技术,并较快地解决了中国核工业建设初期所需资源问题。

1955年到1958年,遵照毛泽东确定的方针,中国政府抓住赫鲁晓夫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寻求支持,对援助中国核工业建设有所松动的机会,在核领域又和苏联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包括一个科研协定、两个工业协定和一个武器协定。随着这些协定的签订和贯彻执行,中国在青海高原、玉门戈壁,大青山下,黄河、湘江之滨,摆开了核工业建设的主战场。

中国核工业建设,由于引进技术的成功,起点比较高。如果把生产工艺研究、设备试制比作坐牛车阶段,把大规模建设、研制原子弹比作坐汽车阶段的话,中国的核工业不是先坐牛车再换汽车,而是从一开始便坐在汽车上前进,得到了超阶段性的发展。

未雨绸缪,晴天备伞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放大了的人际关系,也常常因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1958年4月18日和7月21日,苏联先后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有损中国主权的建议。7月3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同毛泽东会谈此事,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辞拒绝。赫鲁晓夫老羞成怒,从此开始了他破坏中苏关系的一系列行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见微知著的毛泽东,洞察五洲风云变幻,从那年5月开始,频频向二机部领导人发出了晴天备伞的告诫。

5月16日,毛泽东在二机部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6月,毛泽东以强有力的手势指着宋任穷的鼻子说:中国核工业建设“一定要实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根据毛泽东指示的精神,二机部于1958年8月提出“苦战三年,基本掌握原子能科学技术”、“边干边学、建成学会”的工作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使核工业建设往自力更生的轨道上倾斜。

在强调自力更生精神的同时,对于轻率对待苏联技术问题,毛泽东也实事求是地给予了纠正。

1959年,在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中,有的人头脑发热,要对苏联提供的铀同位素分离工厂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宋任穷等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意这样搞,便专就此事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当面汇报。两三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宋任穷。

宋任穷详细汇报了双革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并且说:“我以为,搞地质,盖楼房,以及对一些工程辅助系统,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革新、改造,但反应堆、扩散机等工艺设计和设备,我们还未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

毛泽东追踪着谈话人的思维轨迹,谈话人的话音刚落,他便点头表示赞同:“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235工厂,还没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比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学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

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

毛泽东的话,既内涵深刻,又形象生动。宋任穷回部传达后,那些主张对苏联设计和设备要革新改造的人像注射了一针清醒剂,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混乱。

不出毛泽东所料,苏方答应于1958年11月运交中国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在满洲里车站的中方接运人员等到的只是西伯利亚的寒流。他们中途变卦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来信提出:暂缓向中国提交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

赫鲁晓夫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已经不是秘密了。热风吹雨的7月,飞峙长江边上的庐山。毛泽东与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不理他那一套(对苏共中央来信不予答复)。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宋任穷、刘杰从庐山回到北京,马上部署应变工作:组织核原料的简法生产,安排扩散机分离膜的研制,抓紧原子弹的研究攻关……

1960年8月,赫鲁晓夫集团终于撕破脸皮,公开毁约停援,但这时,我国原子能事业已经基本上转入自力更生的轨道,没有发生大的震颤,更没有因此造成混乱和停顿。

让核工业开花结果

60年代初,苏联毁约停援、自然灾害、“大跃进”运动失误一起在中国大地上肆虐。天灾人祸像一双巨手,突然遏制住了中国的发展进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也陷入了困难的泥淖。

原子弹还要不要搞?严峻的形势引发了种种歧见。

在最高决策层,有人提出了尖端武器研制放缓的意见;在经济部门,有人认为“搞原子弹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主张索性“下马”算了;一些从事常规武器研制的同志又抱怨常规装备投入太少,“尖端挤了常规”。

疑问,忧虑,抱怨……

性格豪爽的陈毅元帅对原子弹在国际政治

斗争中的分量有着深切的体会，他一听说有人想打退堂鼓就火冒三丈，气愤地说：“脱了裤子当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他还对核武器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陈老总的这些名言，传遍了核工业战线的山山水水，像一团火在十万大军的胸膛里燃烧，温暖、鼓舞他们去战胜饥饿、严寒，攻关夺隘，要把“争气弹”搞出来。

1961年春天的日子真难熬呵，堂堂共和国总理的餐桌上也一样缺肉少油水。但是，周恩来的眼光并没有囿于一张小小的餐桌，他从国际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了集中力量争取3至5年突破国防尖端的战略构想。7月，针对二机部提出的问题，李富春副总理经过调查研究和组织协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经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审定后发出。

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他们肩拉手推，一心要使核工业这辆车子突出泥泞、崎岖，送到宽阔平坦的道路上去。

毛泽东倾听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影响论”、“挤论”之无理自不待言，问题是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底子那么薄，灾情又那么重，暂缓的意见就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现在暂缓，形势好了再上，一下一上，一晃几年时间就过去了。而且，省出三瓜两枣来，于国民经济也无甚裨益。问题摆在毛泽东面前，要他处理、决策。

就在这时，一份《关于日本军事工业的发展方针和情况》的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这是聂荣臻根据有关部门搜集整理的材料撰写的。毛泽东审阅后，迅即让秘书给聂荣臻打电话传达他的批示：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先研究，8月份我将亲自找你们谈一次。

这时是1961年7月，聂荣臻正在北戴河出席国防工业会议。聂荣臻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分析研究了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认为：在原子弹研制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

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已经探明的铀矿储量，完全可以满足初期发展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弹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短缺的重要设备，也已在国内安排试制……

为了进一步摸清情况，是年10月，聂荣臻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的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张爱萍一行在二机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登高原，进戈壁，穿行于黄河、湘江之滨。核工业战线在苏联毁约停援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像磁石吸引住了他们，越走越看越兴奋，信心也越足。11月14日，张爱萍、刘西尧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交了调查报告，认为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工作在现有条件下，只要国家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更好地集中全国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安排好所需设备、仪器仪表和原材料的研制生产，1964年炸响原子弹这一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

邓小平看了调查报告后批示：请主席、周、彭审阅，并在“主席”两字下面特别注明：如无时间，看第一页即可。

然而，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看得很认真。他用粗铅笔在报告上画了许多横杠，第一页几乎被画满了。毛泽东的喜悦兴奋之情，透过浓重的铅笔画痕，渗透在报告的字里行间。

既然在霜打雪压下，核工业这棵树苗尚在茁壮成长，那么，有什么理由不让它继续生长并开花结果呢？1962年6月，在听取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关于战备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一再嘱咐：“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这就为原子弹研制问题上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总动员令的签发

“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在审阅总参谋长罗瑞卿3天前写的一个报告时，目光停留在这一行字上，不禁思绪万千。

什么时候爆炸原子弹,这是全国人民也是毛泽东十分关心的问题。1957年三机部(后改二机部)提出可能在1962年爆炸。那个时候核工业建设尚处在勘查选择厂址阶段,虽说八字还没有一撇,但由于苏联答应提供援助,作这种希望也不是一点根据没有。苏联毁约停援后,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困难重重,二机部把爆炸时间推迟到1964年。有这么一个设想,便于规划工作,有个奔头,其实大家心里并没有多少底。而康生却在这个时候横插进来,表演了一段小插曲。

1960年初,周恩来召集一些部长在广州学习政治经济学。学习结束时,毛泽东约见了几位参加学习的部长,其中有二机部部长宋任穷,“理论家”康生也去了。

“老宋,什么时候爆炸原子弹呀?”康生见宋任穷就问。

“原来想在1962年,现在苏联拒绝给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爆炸时间可能要推迟到1964年。”

“1964年爆炸迟了,还是1962年好。”康生接着还讲了许多冠冕堂皇的话。

宋任穷对康生的话感到很恼火。你康生不管这方面的工作,不了解也不懂,就这么信口胡说。平时说说也罢,偏偏当着毛主席说。要是毛主席点头了,实际做不到,怎么办?!所以,宋任穷一再声辩,1962年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原子弹爆炸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是有考虑的。1958年6月,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次年7月,在得知苏联食言拒绝援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商定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推迟到1967年。毛泽东在原子弹问题上头脑是冷静的。此刻,他见康生还在那儿喋喋不休,就说:“康生,你去当二机部的部长吧。”

康生一听势头不对,哑口无言了。

宋任穷这才放下心来。他嘴没说心说:“你康生明知办不到硬说办得到,不怀好意。”

现在,二机部明确提出了“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经罗瑞卿转述),并

且详细分析了实现这个目标的依据。毛泽东看着看着,不由得频频点头,欣然提笔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

毛泽东的批示,无异于一声总动员令。14天后,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有国务院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组成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中央专委组织调动全国各有关部门和地区的力量,协同二机部在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领域里发起了总攻势,出现了一个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节节胜利的局面:

1963年3月,由邓稼先、周光召等签署的原子弹理论设计宣告完成;

1964年1月14日,兰州铀浓缩厂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

6月6日,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1:1模型全球聚合爆轰试验达到预期目的;

8月19日,3个核试验装置在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装配完毕,随后用专列陆续运到试验现场;

8月23日至9月1日,试验现场成功地进行了单元演习和综合演习。

至此,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就等着最高决策层一声令下了。

晚响不如早响

1964年9月,太平洋两岸两个大国的最高决策层都紧张、忙碌起来。

9月15日。华盛顿。一贯敌视中国的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确保摧毁、限制损害、灵活反应核战略的制定人麦克纳马拉等人举行午餐会,商讨美、苏联合对中国核设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问题。会后,经约翰逊总统批准,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联合行动一事进行了极其秘密的会谈。

腊斯克等举行午餐会的第二天——9月16日下午。北京中南海西华厅。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九次中央专委会,研究首次核试验问题。17日上午会议继续举行一直持续到当天下午。会

后,周恩来在菊香书屋向毛泽东、刘少奇作了汇报。

第九次专委会就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议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方案,现在就试;第二方案,推迟试验。

第一方案,从技术方面看,通过实弹试验可以取得直接的数据,以便对原子弹的设计作出判断。从政治方面看,可以尽早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当然,这要冒一定的风险,美苏两国可能借口我核试验沾污大气层,违反三国条约,而袭击我国的核基地。

第二方案,出于避免大的风险的考虑,推迟到明年或更晚试验。并且,试验可以采用空爆等较先进的方式进行。如待到新的核基地接续起来后再试,即使遭到袭击也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储备,而且新基地较易保卫。周总理同与会者大多数倾向于第二方案。

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早有考虑。在此之前,他在同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曾讲过核试验最好早些进行的话。听了周恩来的汇报,他当即表示同意第二方案。

毛泽东呢?还得由他来最后决策。

所谓三国条约,是指1963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这是核大国玩弄的一个骗局,旨在阻挠中国、法国掌握核武器,以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对此毛泽东心里当然清楚,他后来还填词嘲讽:“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至于美国要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毛泽东早有耳闻。去年,同白宫、五角大楼关系密切的艾尔索普写文章鼓吹对中国“实行核绝育”。侵略者的威胁,他的耳朵早灌满了。他历来的对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毛泽东沉思片刻后,神情严肃地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

毛泽东从战略高度回答了中国首次核试验的时机选择问题。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核大国企图绞杀它的图谋破产了!

1964年10月16日17时左右。北京,人民大会堂宴会厅。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3000余名演职人员,并合影留念。

大厅里,万岁的呼喊翻江倒海。这使毛泽东的喜悦之情更加高涨。根据他的指示,核试验消息的对外公布时间已由原定的18时推迟到23时,而试验结果的文字报告要19时以后才能报来,但他等不及了,他很想让眼前这些能歌善舞的青年男女早点分享胜利的欢乐。坐下来准备照相的时候,他问周恩来:“唉,要不要把那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呀?”

善于领会毛泽东意图的周恩来,笑了笑说:“告诉他们,一个个都要高兴得蹦起来!”

照完相,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掌声、欢呼声中挥手离去后,接见主持人大声宣布:“请大家原地休息,队伍不要乱,待会儿周总理要向大家宣布好消息!”

20分钟后,周恩来再次走进宴会厅,挥动双臂示意大家安静,然后激动地说:“告诉大家两个好消息:第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第二个,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了!”

整个大厅顿时沸腾起来。

周恩来风趣地告诫大家:“同志们,你们小心,别把地板蹦塌了!”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当初,赫鲁晓夫毁约停援,还污蔑中国人“喝大锅清水汤”,“几个人穿一条裤子”,“原子弹20年也搞不出来”。现在,苏联撤走专家仅仅4年,中国人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给了赫鲁晓夫一记响亮的耳光。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被赶下了台!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这样说:“导弹、原子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一吨重的勋章!”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孙中山北上及病逝北京前后

● 劳允兴

1924年11月，孙中山先生以大无畏的超人胆识，真诚的爱国精神，置生命于不顾，利用局势的变化，在宋庆龄陪同下再一次北上“谋求中国之统一”。自广州启程途经香港、上海，绕道日本抵天津。一路强调“北上力求和平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12月31日扶病入北京，翌年3月12日病逝。

孙中山逝世灵堂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古都哀悼，全城临吊，肃穆悲壮的时刻，留下永恒的纪念。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国民党改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成立，革命军队重新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青年积极投入革命热潮。孙中山把革命的基础深植于工农群众，坚定地实行扶助农工政策，一个新的革命局面出现了。革命政府所在地广

州称为东方“莫斯科”，广东成为革命策源地。组成东征军讨伐陈炯明，整军出师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这时北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长期接受孙中山思想影响的直系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受命进击奉军途中，于1924年10月19日与第二路军总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起兵倒戈推翻曹、吴统治。北京政变获得成功，曹锟贿选政府垮台，吴佩孚也在直奉战争中惨败。10月2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组织国民军，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中山对这次政变极为肯定。10月27日，他在复冯玉祥等人的电文中说：“义旗聿举，大整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同时与广东军政同志深入讨论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局势及有关方针，计划部署由广东开始进行的国民革命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孙中山北上会遭军阀、帝国主义分子谋害的问题引起国民党人的忧虑。孙认为，“若以我为大元帅，则此行诚险；若以我为革命领袖，则此行实无险可言。”毅然决定北上，于是发表北上宣言，接受中国共产党人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国家之统一与建设”。北行先往上海。上海的工会、学生总会等二十二团体立即组成欢迎孙先生北上筹备委员会，准备迎接孙中山。

广州各界经过数日准备后举行隆重的欢送会。11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等登上“永丰舰”，舰上鸣号三响起锚，广东军政各界官员及各机关团体代表数百人分立东堤、天字码头，为孙中山送行。“永丰舰”过白鹅潭，沙面中西人士均扬巾欢送。下午“永丰舰”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率全体师生热烈欢迎，复由蒋介石导往鱼珠炮台检阅。检阅毕，孙中



山赞扬说：“本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现本党主义。今我可以死矣！”孙平时一向乐观旷达，从未有此等言语，今突发此言，大家愕然，并不胜凄惻。下午孙复登舰径离黄埔，全体师生整列欢送。“永丰舰”遂向香港航行，苏舰“波罗斯基号”沿途护送。苏舰于是年10月3日由苏联驶抵黄埔，专为援助大批军械物资等而来广州的。次日早“永丰舰”驶入香港泊定，孙中山一行转乘日本邮轮“春洋丸”号。孙登“春洋丸”号即刻与《国闻新报》记者谈话说：“务期将北京之思想界完全改造，将旧日之复辟陈旧官僚，铲除净尽，于是国民革命始易着手，而本党主义始有实现之希望。”“北伐当然积极进行，长驱直捣鄂苏。”14日，“春洋丸”自香港开航，赴上海。17日安全抵达上海。船泊定吴淞口后，国民党要人及东方社记者20多人来吴淞口迎接。在船上有记者报告说，上海英《字林西报》日前发有短文，反对孙先生登岸与久居。孙为此严斥帝国主义，谈话谓：“余对于时局之意见，及国民党之政策，一与余离粤时发表之宣言书相同，兹不另引发表。惟《字林西报》日前著论主张应拒绝余入沪租界，以外人而发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吾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今之时代，已遭逢撤消一切外国在华租界之时机。吾人为贯彻此种目的起见，不惜极尽能力以赴之。中国人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之飞扬跋扈。”

孙中山在吴淞口登岸后，伫立码头的各界欢迎群众有一万多人，高呼“孙总理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孙向群众微笑颌首，表示谢



1924年
11月21日，
孙中山、宋
庆龄离开上
海，经日本
神户继续北
上

意。旋乘车至莫利爱路二十九号寓所，接见各界人士，宣传召集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当孙中山自码头步出轮船到登车过程中均有警卫持枪在前后左右护卫，直系地方军阀派出凶手预谋行刺，被民智书店职工发觉，转告保卫人员，加强保护防范，凶手无隙可乘，才没有发生意外。

19日，孙中山在寓所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各报新闻记者。到会者有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及日本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等30余人。会上孙重申了对内召开国民会议来解决时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他说：“这次单骑到北京，就是以极诚恳的意思，去同全国人民谋和平统一。”他严峻地指出：“中国当今祸乱之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之帝国主义，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

治久安。”“那些有大兵权的人，……如果用军人的资格在会议席上专横，不让大家公平讨论，我便马上出京。”“大家可以料得我很危险，但是我为救全国同胞，求和平统一开国民会议，去冒这种危险，大家做国民的人，便应该做我的后盾。”各记者听后踊跃发言，赞成孙先生的时局主张，并请先生早日北上贯彻主义，以造福民众。

是日，孙的随行人员报告，北京上海间交通因受军事影响断绝，津浦铁路停运，上海往天津之轮船数星期内头等舱位客满，但十日之内由上海至日本均可有船达天津。于是孙决定绕道日本，借机可在日本宣传时局的主张，同时亦可会晤日本朋友，以团结东方民族，巩固世界和平。11月21日，孙中山与庆龄等登日轮“上海丸”取道日本赴天津。23日抵长崎，在船上对前来欢

迎的中国留学生说：“……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要打破列强的侵略，就是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他希望留日学生“联络国内外学生会，全体一致主张由国民会议来解决国内民生问题和打破列强的侵略”。11月24日抵神户，日本政界、新闻界、旅日华侨、中国留学生一千多人前来欢迎。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一百多人一致表示愿辍学回国投入革命，服从指挥。孙中山勉励他们用功学习军事学科，将来回国为革命效力。24日留居神户，整日接见日本各界来访人士，当晚又在东京、大阪、神户国民党欢迎会上发表“中国内乱之原因”演讲。他再次明确阐述，“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援助”，“吴佩孚即获得帝国主义的援助；广州商团事变，亦为英国所唆使者。故阻遏乱源，必须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海关与领事裁判权，使外人无力在中国活动，方克有济。”“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不平等条约。”“防止外国人在中国捣乱的力量，中国才可以永久地和平。”演讲长达四小时之久，大家频频鼓掌，情绪十分激动。留居神户期间，孙还应神户商业会议所五团体之邀请，做“大亚洲主义”、“日本应助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重要讲演。这是孙中山最后的演讲，留有记录。两次演讲前者述中国文化之道德价值，后者说明中国国家民族境遇，对日本人士表露了宏大的政治家的气度和胸怀，听众中有多人动情而挥泪。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启程向天津进发。中日人士送行者五千余人，孙中山立于船头良久，脱帽还礼致谢。

孙中山莅津前，天津学生、市民

等群众团体搭起牌楼，悬灯结彩，准备盛大欢迎。12月4日正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有五万多群众等候在这里。船徐徐靠岸，群众举旗欢呼若狂，像潮水一样涌上去，热烈欢迎的场面在天津是空前的。孙中山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乘车至张园行馆。这一天，天津人像过节一样，到处燃放爆竹，兴高采烈。饱经帝国主义压迫的天津人民对孙中山的到来，寄予很大的希望。从11月13日自广州启航以来的行程中，孙中山不断地向各界宣传讲演，频繁地接见中外人士及各群众团体，为扩大召开国民会议的影响，壮大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声势，20多个日日夜夜，几乎是通宵达旦地思考问题，进行工作，过度的疲惫和多年的积劳，他终于病倒，随即滞留天津。

孙中山早在上海登船赴日时段祺瑞已入北京，并以临时执政的名义组织临时政府。虽然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曹、吴垮台，冯即迎请孙中山北上。同时他天真地认为借重段祺瑞暂主北京政局，维持过渡局面以抵御长江直系势力北进。而段祺瑞在英美日法等国支持下，北京变成驱虎引狼的倒换；奉系军阀张作霖也率军入山海关，武力夺取直隶，留驻天津。冯玉祥力量薄弱，完全失去主动，受排斥调派张家口。局势已经明朗，段祺瑞、张作霖发电或派人请孙中山北上，是设下的一个圈套，导演一台“大旗将临”“南北合力统一”的假戏。他们企图利用、软化、收买孙中山，参加军阀集团，作他们的傀儡，以转移全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化解各地展开的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面对北京复杂的局势，准备以政治斗争方式，改变段、张的统治地位。2月18日，段祺瑞派代表叶恭绰、许世英到津张园行馆谒见孙中山。孙问段政府对各国公使有“外崇国信”的保证，意即表示尊重不平等条约的事情。叶、许答确或有此事，但照会尚未送出。孙

中山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何还来欢迎我呢？”叶、许二人默然不敢再说什么，好久，才又腴颜地劝孙中山不要太过“激烈”，免得激怒了东交民巷的“洋大人”，引起帝国主义干涉。孙中山气愤地回答说：“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孙中山的肝病因此而加剧恶化了。

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是日晨专车自津出发，车到北京南永定门站时稍停。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上车见到孙面容憔悴，正躺在卧铺上看书，健康状况很不好。他向孙表示崇敬之情，同时为尽保护之责，婉转请求孙中山能在永定门下车入城，避免在前门东站下车因欢迎人群如海而生意外。孙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们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这时的前门东车站到北边城内棋盘街、天安门以东，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各界欢迎群众约计有十多万。个个手中挥动着红、绿小旗，人人向孙中山致以敬意，在寒风中涌动着热烈的情绪。大幅标语鲜明耀目：“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等。专车缓缓进站，孙中山见到欢迎的人群，精神为之一爽。北京国民党支部迎接小组马叙伦等，上车把孙中山搭上一张藤椅抬下了车，严肃恭敬静候多时的欢迎人群立即激动起来，欢呼声震天动地，持续不断。孙中山因病不能逐一和各团体代表握手，只是徐徐走过欢迎行列，含笑答礼，同学生们、

民众们见了面、谈了话。然后与宋庆龄等一行乘车到东长安街北京饭店下榻。随即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一刻不放松地进行工作,接见来访客人,处理公文,向广州写信指导广州政府的工作;苦筹熟虑如何对付段祺瑞等南北军阀、官僚操纵准备善后会议的问题。1月17日,孙中山在病榻上,最后一次亲自拟定了致段祺瑞的电报,指出他包办“善后会议”的错误,断然拒绝与段祺瑞势力妥协,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3月1日在北京举行了国民会议促进会全国代表大会,有代表二十个省一百二十个委员会的二百名代表出席,极力反对善后会议。孙中山生命的最后时刻,斗志益发坚定了。

自1月24日孙中山病势加重。26日下午三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六时施行腹部右侧解剖手术,检查全肝,肉眼亦可见全肝已坚硬如木,病状是肝癌不治之症。经取肝上极微部分试验,一面洗净肝脏缝合。27日详细察验之结果,确为肝癌,且已至末期,无药可医,尚可行镭锭放射治疗,稍减痛苦。2月初,伤口痊愈即接受镭锭医疗,至12日依然无效,2月18日,由宋庆龄等护送陪同迁至铁狮子胡同11号行馆,改由中医治疗。孙中山自知病势恶化,以超强的毅力抑制病痛,“勇气倍增,决计与病魔抵抗。”但是药石无效病情濒危了。3月10日,孙中山听到广东东征军连战连捷,已下潮汕,陈炯明遁逃;留守广州的胡汉民各项工作亦甚得力的报告后,极为快慰地说:“电告汉民,不可扰乱百姓。”3月11日正午,孙张目遍视床前家属及各同志,召之面前对大家说:“现在要分别你们了,拿前几日所预备的那两张字来呀,今日到了签名的时候了。”这时遂将2月24日曾向孙中山读过的两份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他的手力甚弱,并在颤动,不能自持,夫人宋庆

龄含泪托起他的右手腕执墨水钢笔逐一签名。所签的字虽手力弱,仍很清楚。此时在孙中山病榻旁的人除宋庆龄、孙科外,还有吴敬恒、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张人杰、陈友仁、何香凝等十余人。嗣后,他以极安静的态度向同志们说:“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自此以后,呼吸益加艰难,精神倦怠,不能连续说出完整语言,微弱地反复呼出:“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逝世,终年59岁。铁狮子胡同行馆内,国民党各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决议葬仪用国民礼制,以示平等。同时遵孙中山遗愿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3月15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举行大殓,遗体盛殓楠木玻璃盖棺。家属及追随多年的同志悲泣失声地亲视含殓。北京民众日日结队来铁狮子胡同及协和医院吊唁。3月19日,自协和医院移灵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安放。从协和医院门前王府井、东长安街、天安门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灵堂,路两旁约十二万人恭迎灵柩。3月24日,在中央公园开吊致祭。灵堂中央设孙中山遗像,饰以鲜花,左右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正中横额:“於戏国父”。祭幛挽联,堂壁皆满。中央公园开放,任民众来社稷坛大殿灵堂致哀,瞻仰孙中山遗容。4月2日,移灵柩厝香山碧云寺。上午11时发引,遗柩从灵堂移出至中央公园门口上灵輶。宋庆龄置花圈于棺上,舆顶及边络以青球,四周绕满花圈。四匹乌骓马高驾灵輶,经西单牌楼北转西四牌楼,顺原电车道至西直门。北京民众、京汉铁路总工会等工会组织、各学校团体、士兵

等三十万人步行相送。三架飞机绕空飞行,鸣炮三十三响,各处皆下半旗。下午2时15分,再由西直门向香山进发,沿途民众学生高呼:“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促成国民会议”等口号。灵輶过海淀、玉泉山口,下午4时25分到达香山碧云寺门口。寺门及二重门皆札有白花牌楼,二重门牌楼横额为中法大学敬奠孙中山先生,联为:“赤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灵柩安放在寺内第十一级高峰院塔石龛内,花圈围列其旁。龛内有长联一副,其文曰:“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瘞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1929年,孙中山遗体重殓易入铜棺,移灵南京,葬于东郊紫金山墓地——中山陵。北京碧云寺所易衣履安置原厝木棺内,为衣冠冢,冢三面石筑中勒石,文曰:“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古都北京留下永恒的纪念。

(责任编辑 萧 徐)

作者更正

据杨献珍亲属杨欣同志查证,《炎黄春秋》1996年第9期,《康生残酷迫害杨献珍纪实》一文中第8页左栏,曹轶欧请苏联学者吃饭由杨献珍作陪一事,客人应为郭绍堂,不是曾秀夫。特此更正。

“陕北才子”贾拓夫

说真话遭厄运引发的思考

● 王尔澄

编者按：贾拓夫同志，陕北苏区创始人之一。他帮助长征中的中央下了到陕北苏区站住脚，领导全国革命的决心。长征中，他功劳卓著，受到中央赏识。建国后，他在国家高层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中，比较注重调查研究，比较实事求是，所以能在1959年，大跃进的疯狂时期，提出与当时风行的相左的不同意见，为此受到错误批判与处分。这么一位优秀的高级干部，“文革”中被康生唆使所谓“造反派”的“小将”迫害死了。这是贾拓夫任国家计委副主任时，一位在他领导下的老干部，带着沉重的心情，写来的一篇纪念文章，文字写得很朴素，但有些道理深，值得大家思考。

一

1967年的夏天，“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揪人。一天，“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红卫兵派头头们时阴阳怪气地说：“为什么不瞄准好就拉开架势呢，这样到哪里都会扑空。”他还煽动地说：“革命小将的行动贵在认准目标。譬如说，‘陕北才子’贾拓夫哪里去了？这是个一贯反党的老右倾，文化大革命中他不会那么老实的。”

康生一句话，造反派马上行动，他们把贾拓夫带走了。可是，不出三天，国家计委大院内贴出了一张由“红色造反委员会”署名的大幅横标——“贾拓夫死有余辜”，同时还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在石景山附近的桑田里发现了贾拓夫的尸体，大字报没有说明死因。这消息来得如此突然，当贾拓夫的家人赶去看望时，发现他显然是因为不屈服于暴力，顽强抵抗，而招致殴打身亡的，死时他才54岁。

1980年3月20日，党中央拨乱反正，薄一波主持追悼会为贾拓夫平反昭雪，悼词中指出，

贾拓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

二

贾拓夫，陕西神木人。少年时在绥德师范读过三年书，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但是他刻苦自学，不仅学业未荒疏，文化水平还有很大提高，而且写得以潦草出名的草书，在朋友中间被誉为“陕北才子”。

1934年初，贾拓夫代表陕甘地区党组织经北方局介绍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可是到上海后，发现党中央已迁移到江西中央苏区，贾拓夫又辗转赶到江西瑞金找到了党中央，列席了正在召开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并被选进五中全会主席团，当时他才22岁，少年英俊，风华正茂。一年后，他又随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1935年1月，红军在长征途中召开遵义会议，会上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陈云出任红军总政治部白

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就在陈云直接领导下作白区工作。7月间,红军进入四川省西北部毛儿盖藏民地区,为了更好地发动群众,做好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工作,贾拓夫在为红军筹粮备盐的工作中,把红军中沿用的“打富济贫”的口号改为“借富济贫”,征粮工作成绩显著,受到人们的赞扬,当时在部队中流传着一首夸贾拓夫的打油诗:

拓夫不假,善骑战马;深入藏区,办法真大。
“借富济贫”,大得民心;建立政权,藏民紧跟。

每个红军,分盐二斤;吃上糌粑,粮袋有粉。
带上盐巴,浑身有劲;瓦布梁子,拓夫更新。
筹粮任务,超额完成;为过草地,添了把劲。
学习拓夫,为民真心;全心全意,共产精神。

1935年9月17日,红军闯过天险腊子口,进抵肃南部岷县哈达铺。党中央领导正在研究红军前进的具体路线和目的地,是打通国际路线呢,还是到哪里去,有各种不同的议论。贾拓夫是长征中唯一来自陕北的带路先遣人员,他将陕北刘志丹等领导红军开展活动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并具体建议党中央到陕北立足。毛泽东听贾拓夫介绍说陕北已有了上百万红军,还有个不小的苏区就非常高兴地说:“有一万红军就去,何况陕北还有那么大的一个苏区呢!”于是,经中央政治局研究,命贾拓夫作向导,并留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身边,一路上随时介绍陕北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况,为中央决策作参考。

9月26日,党中央进抵渭通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贾拓夫列席。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议中央红军进军陕北,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党中央立足陕北,从陕北领导全国革命。

目标既定,斗志昂扬。10月,中央红军翻越六盘山,毛泽东情绪激越,挥笔写下了著名的被人传诵的《清平乐·六盘山》词。

这时走在红军先遣队里的杨尚昆、陆定一、李一氓和贾拓夫等一班文人才子,情绪都特别高昂。尤其是他们领略到毛泽东在词中写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一远瞩前程的崇高意境,更加受到鼓舞,一路上说说笑笑,

吟诗联句,充分表露了革命的乐观主义。

这时,党中央派遣唯一熟悉陕北情况的贾拓夫率一连战士,带一部电台,作为先遣队的前哨,寻找还从未通过消息的陕北红军。23岁的贾拓夫身负重任,日夜兼程,沿途搜索前进,很快在甘泉县下寺湾,遇见了从陕北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和陕北党的领导人郭洪涛。贾拓夫在江西瑞金时经陈云介绍认识了程子华,郭洪涛则是贾拓夫的老乡和战友,两人本就认识。他们此时会见,彼此都心潮澎湃,激动不已。程子华、郭洪涛对贾拓夫说,他们本不清楚中央红军来的是一部分还是全部,只是他们派出的流动骑兵,看到了由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和司令员彭德怀署名的“红军陕甘支队”布告,才率部队前来策应的。贾拓夫向他们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情况和党中央决定以陕北为立足点的决定,向他们交接了带来的联络电台,就转身赶回,向还在北来路上的党中央总部复命去了。

党中央与陕北的党和红军取得联系后,兵分两路:党中央机关和非战斗部队向瓦窑堡前进;战斗部队直扑吴起镇,10月19日胜利到达,紧接着与红十五军团汇合,准备了有名的直罗镇战役。

1935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经保安到达甘泉下寺湾召开了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央红军在长征路上“得到了新的材料(即指贾拓夫向党中央提供的有关陕北苏区的情况),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决定去陕北,保卫、扩大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毛泽东同时指出,红军到达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目前的任务就是粉碎敌人的“追剿”,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11月,长征来的红一军团和陕北来的红十五军团,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在陕甘边区的富县直罗镇打了一个漂亮仗,全歼国民党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边区的“追剿”,为党中央在陕北建立巩固的革命大本营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时的贾拓夫眼看着红军万里长征已将胜利结束,心中的兴奋愉快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西安事变后与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与张学良商谈时的贾拓夫

贾拓夫完成了与陕北红军联络任务向中央复命时，又向党中央汇报了陕北党内斗争的情况，以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汪锋、张秀山、贺晋年、张达志等许多陕北党与红军的领导人，受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代表的迫害，被关押并准备处死的情况，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指示“刀下留人”，并派贾拓夫、王首道、刘向三3人去瓦窑堡接管陕甘边区保卫局，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同志，为他们平了反。如果不是贾拓夫及时向党中央汇报这一重要情况，帮助党中央做出正确决策，只差几天，刘志丹等一大批陕北领导人就会全部被处死，其后果不堪设想。

陕北根据地建立后，贾拓夫因一再立有大功，被升任为陕甘苏区中央局白区工作部部长。

三

全国解放后，1952年，经毛泽东、陈云点将，将在西北局和西北财委工作卓有成效的贾拓夫调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又受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当时在计委干部中，盛传他受人尊重的两

件小事，从中可见他的操守与人品。第一件事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按照党中央提倡的领导干部要学习经济建设业务知识，要有“钻进去”的精神，计委聘请一批专家学者给领导干部讲课，贾拓夫学得非常认真。冶金部钢铁专家陆达讲课时说到高炉炼铁要高温大风，炼钢要富氧脱碳，给贾拓夫以很深的印象。隔了一年，他要去石景山钢铁厂参观，就把当时听课笔记找出来，找学过科学技术的秘书张培江校对。他说年轻时没有念过自然科学的书，现在要补课。他还说：“科普、科普，普及科学知识很简单。干革命出身的人不懂经济建设业务知识不行，努力不努力学习，这是党性问题。”在贾拓夫等领导同志的影响下，计委形成了干部认真钻研业务知识的风气。

第二件事是有一次他早晨上班时忘了带工作证，当时门卫把守很严，不让他进去，直到他托人取来工作证验证后才让他进了大门。对这件事他非但不生气，而且动情地说：“这样的门卫战士多好，多负责呀！”传令对这位门卫战士进行表扬，并在计委各党支部进行了传达。由此可见贾拓夫平等待人、遵守纪律的精神。

1958年下半年，“大跃进”已经开始。贾拓夫到西安参观“大跃进”初期小土高炉炼铁和小土转炉炼钢的情况，他发现小土高炉的炉温和进风都不够，小土转炉没有富氧脱碳的条件，又有那样多高硫高磷的杂质，怎能炼出合格的铁和钢呢？他还发现原料堆集场上存放的铁矿石和土焦，更是不符合专家们讲课时说的有关规格。他起初还以为是陕西省科技不发达的缘故，是个局部问题，哪知道后来竟全国规模地都搞起以这种小高炉、小转炉为中心的“小土群”来了。当时以上海、四川干得最起劲，以至于在1958年11月召开的武昌会议上，由于他们坚持搞“小土群”，不肯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从3900万吨往下降，引起了一番争论。后来，毛泽东说了“冲天干劲和科学态度要冷热结合”的话，会上才通过了1959年钢指标为2000万吨的计划。事实上，这个指标还是离实际很远很远的。

1959年3月，上海会议期间，贾拓夫实在

看不过去,在会上就钢铁生产的矿石、焦炭、生铁、钢与钢材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平衡、衔接的疑问。同时,在锦江饭店南楼,国家计委重工业局的几个干部,用手摇计算机整整算了一夜,按冶金部大高炉、大平炉、大转炉的固定设备和全国小高炉、小转炉每日每时在增长的容积资料,一天一天的计算,24小时满负荷运转,一年365天不休假、不检修,当年钢产量也到不了1500万吨。可面对这个事实,贾拓夫的正确意见和科学的计算结果,仍然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驳。特别是毛泽东用批评口气说的计划工作必须“多谋善断,不要少谋武断”的话,给大家增加了很大压力。后来,上海会议虽然把钢指标又削减到1650万吨,但一看就知道,仍是完成不了的任务。

当时的情况是:鞍山钢铁公司从全国调到的土铁堆积如山,一罐一罐的土铁,一半是泥土,一半连含铁30%的铁矿石还不如,根本无法利用;哈尔滨的锅炉厂、汽轮机厂、发电机厂,因为从鞍钢调去的钢材杂质多,锅炉钢管出现了许多条发纹事故,不能用做锅炉;加工出来的汽轮机叶片、发电机的转子和定子的零件都成了废品,因此只能停产;沈阳靠钢铁作材料的许多机械工厂,下达的生产指令也因原料不能保证而朝令夕改,任务多变,厂内生产乱了套。而火车却仍在超负荷地运输着这些不合格的铁矿石、土焦、土铁南来北往,甚至挤得民用商品得不到正常运输,造成市场商品匮乏。

到今年4月,国家计委正要想着手研究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才好,可是还没有来得及运转开,陈云奉党中央之命亲自到计委,召集冶金部、煤炭部、机械部、铁道部开会,还是要研究1959年钢产量指标能否落实问题。

这时形势非常紧张,政治压力也很大。许多人回想起“反冒进”斗争开始后,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曾经严厉批判过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贾拓夫也被说成是“离右派只有50米的人物”,还说陈云是“商品拜物教”的右倾保守分子。因此,各部代表在这次召开的会上会下,大家都不敢说真话,绕着圈谈“大跃进”的高指标,用空话互相哄抬。甲给多少煤,



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贾拓夫及其夫人

乙就产多少铁;乙给多少钢,丙就产多少机械;丙给多少机械,甲就产多少煤;谁也不肯先说真话落实指标,谁也不敢对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钢铁高指标数字提出不同意见,以免当反“大跃进”、“犯政治错误”的“促退派”。针对这个情况,陈云在会上说:“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耍滑头,要不然我也可以不再理会这个指标调整问题。请大家来谈谈1959年计划究竟怎样处理好。是否稳住阵脚再前进?是否重视质量品种,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他又在一次座谈会上对计委各个主管有关业务的局领导干部说:“在中央有困难时,高级干部都该向党说真话,帮助中央正确决策,解决困难。”经过近一个半月商讨研究,中央政治局认真研究了陈云的建议,将1959年钢指标又下调到1300万吨,但其中仍有土钢400—500万吨。就是这样,钢铁生产设备和火车等运输工具还是在不能保证正常检修、“拼设备”的情况下,才勉强完成当年的钢产量任务。

5月16日,贾拓夫在计委党组务虚会上,把自己通过实际调查研究和理论学习的一些心

得,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发言,对计委党组成员统一认识,正确看待当时的经济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都有很大启发,受到全体党组成员的赞同,并要求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向干部作个启发性的学习报告。

6月17、18日,中央批准陈云建议1959年钢产量指标调整为1300万吨的文件下达后,由计委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宋平主持召开18级以上的干部大会,请贾拓夫以在党组务虚会上的发言为基础,敞开思想“讲真话”,作了《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他一下子讲了30多个问题,涉及到当时经济工作中的方方面面,受到与会干部的热烈欢迎。

可是,就是这样一次实事求是的、有精辟见解的受到计委党组成员和有关局干部热烈赞同的报告,却成为贾拓夫在此后连续受批挨整的罪状,直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冤屈致死。

1959年夏天,中央召开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以纠正“大跃进”带来的“左”倾错误开始的。可是,在彭德怀上万言书指出国民经济遇到困难的真相之后,风向突变,忽然变为批判彭黄张周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右倾机会主义”了。随之而来,全国开展了全面的“反右倾斗争”。贾拓夫在国家计委18级干部会上的报告,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党纲领”,受到计委、经委、冶金部、煤炭部、机械部、铁道部、化工部党组书记的联合批斗,并逼他交代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关系”。国家计委有4名局级干部被指为是贾拓夫在“计委的小集团”而被降职使用,贾拓夫被撤消了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职务,下放到抚顺发电厂当代理厂长。

计委统计局长、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一次出差去辽宁,遇见贾拓夫,贾拓夫对他说:“在基层看到了官僚主义根深蒂固,‘大跃进’还不只是钢指标高一点低一点的问题。我既到基层,只有冷静下来刻苦而愉快地改造自己。”并向孙冶方出示了一首他写给家属表示心迹的诗:

下放煤都原有故,庐山教训信无辜。

京中同志若相问,早已投身入洪炉。

1962年初,贾拓夫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问题,在党中央主持召开的为纠正“大跃进”错误的七千人大会上一风吹了。10月,他被批准以中共中央委员资格参加八届十中全会。但这时康生又突然制造出一个“写小说反党”的冤案来,硬说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写的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1954年的反党问题翻案。他把毛泽东本来是用疑问的口气说的“利用写小说反党”这句反问话,篡改为用肯定语气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并将之收进《毛主席语录》中。同时,康生还罗织出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说这部小说是这个“反党集团”炮制的。后来,又把“习、贾、刘反党集团”发展为“西北反党集团”,同彭德怀、高岗联系起来,升级为“彭、高、习反党集团”,贾拓夫又一次被取消了参加中央全会的资格,接受专案审查。对这又一次突然而来的打击,他胸怀坦荡,问心无愧,年底,他进中央党校研究班学习。在党校学习期间,他又作了一首七律,表示自己的心迹:

人间正道何处寻?四论传神辩证通。

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

曾经沧海仍为水,重整长缨好缚龙。

若将真知能学到,乾坤造化自无穷。

三年党校生活,贾拓夫认真钻研马列经典著作,自感学到了一些系统的马列主义真知。1965年10月,他被分配到石景山钢铁公司任副经理。这年他53岁,身体很好,庆幸自己有了新的工作岗位,便高兴地把在党校写的七律,改为赋有新意的诗句:

东风四起传天下,拨云驱雾正道通。

旧面岂容批判外,新生常在斗争中。

曾经沧海仍为水,落户西山愿做工。

勤学犹须能活用,人间造化自无穷。

这个在解放初期就调到北京工作,时常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肩负国家经济建设重任,并且坚信马列主义真理能愈辩愈明的贾拓夫,在历尽磨难之后,不知道阴险狠毒如蛇蝎的康生,正张开巨大的魔网,欲置他于死地。1966年12月,康生就对林彪、“四人帮”诬蔑他说:“陕北的那个贾拓夫是个老反党分子。”他还煽动各派红卫兵上门造反,要他揭发陈云、李富春、薄一波、

李先念的所谓“问题”，但一次又一次地都被贾拓夫严词拒绝了。终于到1967年5月5日贾拓夫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5月7日，在石景山电厂附近的八角村树林里发现倒卧在地的贾拓夫带着向暴力抗争的愤怒表情，已气绝多时了。

四

“陕北才子”贾拓夫历史上对党作出过巨大贡献，解放后在国家经济建设的领导机关担任负责工作，被誉为是“我国经济战线上有独到见解、有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但是却在他最好的年华被冤屈而死，而造反派却辱骂他“死有余辜”。1966年至今已30年，到底贾拓夫“罪”在哪里？“辜”又在哪里？而且至今贾拓夫究竟是如何被迫害死的，仍未有具体说明。无论是回顾历史、以鉴戒后人，还是对被屈死的一生耿直、追求真理的贾拓夫理直，都应该认真总结这个血的教训。

贾拓夫最早的罪名是他在国家计委18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作的《关于学习1959年计划调整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被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纲领”。这个报告能说是他的“罪”吗？他在报告中说的切中时弊的老实话，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已作了平反，得到共识，而且这个报告还证明他是一个无私无畏的勇者，他比有些人虽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不敢直言早说了两年半！这样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贾拓夫何“罪”之有！

那时毛泽东提倡“大跃进”的本意，是想摆脱从苏联搬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模式，从死板板、冷冷清清的局面向鼓舞人心、热气腾腾的局面，但错误是没有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以持续稳定地发展国民经济，以致欲高速度飞跃而不能达到目的。所以，贾拓夫报告的关键是在于执行计划经济，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办事。这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今天，也不能听任市场经济放任自流而必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得力的宏观调控。贾拓夫在三十年前的报告中，就已经把这

个道理说得很透彻，贾拓夫又何“罪”之有！

在“大跃进”中，国家的钢铁指标都得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但事实上是权威的政治性讨论不可能深入细致到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微观经济中去，这就需要从经济工作的人冷静地对客观现实作出深入调查的科学分析，向中央提供真实的情况，帮中央作出正确的决策。所以贾拓夫说：“当权派不算账危险很大。”又说：“不算账是浪漫主义、主观主义。”“应该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比资本主义大国要低。”其实他说的这些话，就是毛泽东一再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陈云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精神。贾拓夫又何“罪”之有？

此外，贾拓夫在这个报告中还讲到了当时基本建设规模失去控制，已远远超过国民经济能承受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水平，应该注意紧缩和防止盲目冒进。他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曾说了几句话以引起大家警惕，这几句话是：“上马容易下马难；仓库进货容易出货难；工人招来容易遣散难；工资增加容易减少难。”意思是说过于长的长线应该好好调整，预防酿成问题影响全局。可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这几句本是极正确的话，却被指责是贾拓夫有意制造的一套“动摇人心的口诀”。

针对在全国范围内铺开摊子到处建立不能形成生产力的“小土群”，贾拓夫早就说过，小土高炉、小土转炉不能形成生产力，更不该当作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是大工业。”多少年来，现实已为贾拓夫的话作了历史结论，这些话的正确性是不言而喻的。

对当时冲击全国农村的虚假风、浮夸风给农村以至于给全国经济形势带来的危害，贾拓夫在这个报告中都作了忧心的批评和科学的分析。如今事隔三十多年，党经过长期的实践、反思，现在可以感觉到1959年贾拓夫的这个报告，确实是一个党的高层经济工作者以科学冷静的分析、实事求是的无畏精神，比较早地总结了“大跃进”的教训。他是一位一身正气，一心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优秀共产党员。

（责任编辑 方 徨）

纪念革命先烈杨匏安百岁生日

● 于光远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常用一首革命诗句勉励身边的同志:“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子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这是一首绝命诗,它的作者是中共早期的著名共产党员杨匏安。

杨匏安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1896年11月6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南屏区北山乡(现珠海市境内),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接触西方和日本社会主义思潮。1916年回国,在教学中和文章中,积极宣传进步和革命的思想。那时他的著述大都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并被聘为该报记者。这家报纸在俄国十月革命后的50天就发表了《李宁(即列宁)胜利之原因》,这篇短评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主张之共产主义,最得平民劳动者之欢心”。就已经看到的文献来说,这是他最早站在革命立场对十月革命的表态。1919年杨匏安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从1919年5月21日起至同年12月底,他为《广东中华新报》写了近10万字的文章,介绍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他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亦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的时间与李达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是在同一个年月。杨匏安是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因此有“北李南杨”之说。

杨匏安也是最早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之一。1921年,广东正式成立了共产主义的组织,他加入了这个组织。他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1922年在广东省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为团刊《青年周刊》写创刊宣言,向读者宣告“社会革命四个大字,就是我们先行的旗帜”。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他担任区监察委员,与陈延年、周恩来一起工作。杨匏安还在1927年4月下旬到5月初举行的党的第五次代表大

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或中央监察委员),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27年他参加并领导了有名的省港大罢工,还参加了广州起义。在革命实践中,杨匏安的主要贡献是在致力于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1923年党中央指派他和谭平山到国民党内建立我党党团(现称党组),担任党团书记。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他在国民党内担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理部长。1925年11月他又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长兼常委,拥有组织大权,在为国民党输入新鲜血液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1956年,在台湾出版的蒋介石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之后,“他就推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产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们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为了使国民党建立在工农群众的基础上,杨匏安在国民党组织工作中扶植工农革命力量,并且直接投身于工农群众运动。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与谭平山、林祖涵(即林伯渠)、李大钊、吴玉章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九个常务委员之一,与另外两个常委谭平山和林祖涵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杨仍兼中央组织部和广东省组织部长的职务。

1927年11月中旬,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实行盲动主义路线和惩办主义,处分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的大批同志。杨匏安也被取消中央监察委员的资格,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1929年杨匏安不再是党中央的什么委员,到上海在党中央机关参与党的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并写有《西洋史要》和《地租论》两书。1931年7月,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被捕,八月遇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5岁。

杨匏安的儿子杨明是我的老朋友,1936年我们在广州的一个革命团体中一起活动,我是在那个时候通过他知道杨匏安的。1937年1月,杨明陪我去广州杨家祠看望过杨匏安的夫人吴佩琪,这次会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

记得当时她住在杨家祠一间很大的大厅里。这个大厅里住有好几家人家。杨匏安夫人住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只有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一张凳子这么小的一点空间。她住的地方同别人住的地方之间没有墙壁,而是用柜子隔开的。

我们去的时候,她正躺在床上。大概她的病不能下地,主要是卧床。她不但无钱治病,在病中还要剪红纸花,以赚一点手工钱。

在她儿子把我介绍给她之后,她让我坐在那张凳子上,她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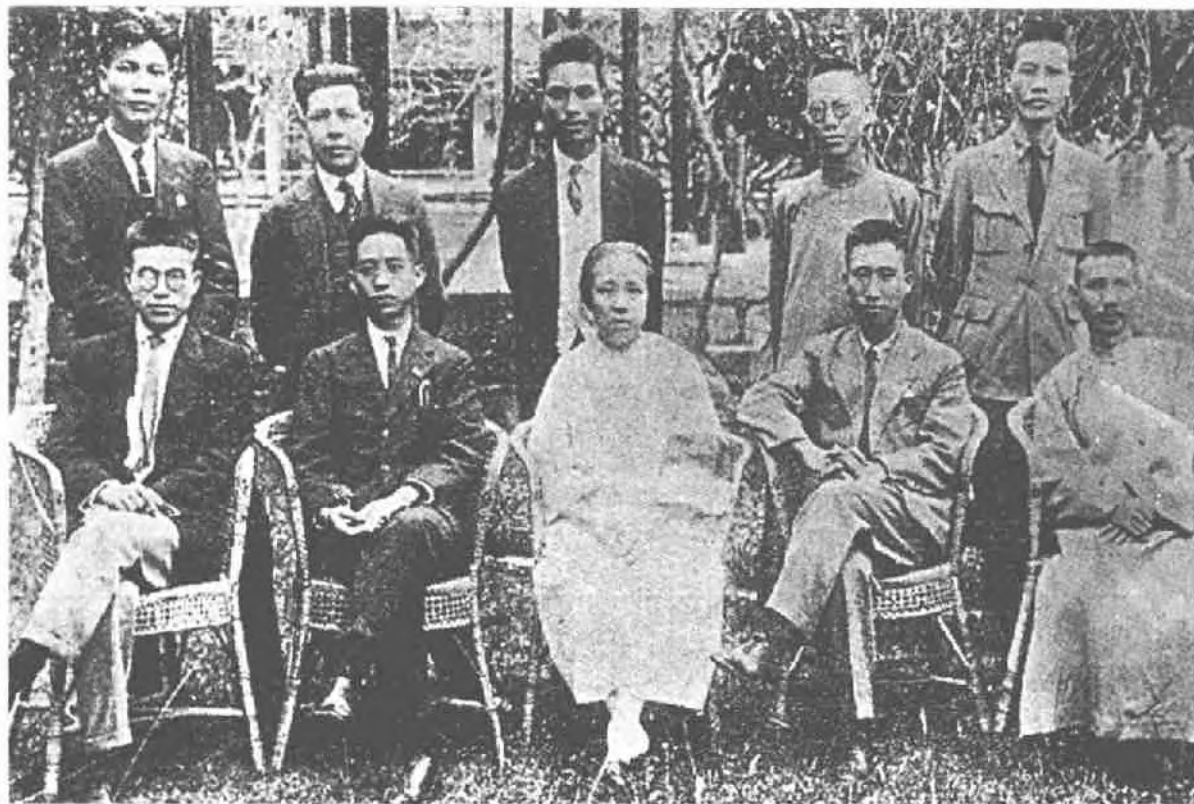
了一句:“现在的世界真不好。”她一下子就讲到世界,的确是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的口气。我听了很激动地对她说:“世界不好,我们就要把它翻过来。”我从她的表情中看出,自己的儿子带来了这个从北方来的陌生人,而且是一个发出“要把世界翻过来”的这种豪言壮语的人。有着丰富经验的她,一下子心里可能明白过来。她对我苦笑一下,说了一句“宗锐(即杨明)还小,你们要好好照顾他”,再没有多讲。

她显得非常衰弱。我算了一下,那时她的年龄大概是40岁左右,可以说还属于中青年的范围。但是她看上去仿佛已经有六七十岁了。那天她似乎不想多说话,我想多说一些,可又考虑到我们在一个完全不隔音的地方,不能多谈什么。因此在坐了一会儿之后,只好

匆匆告辞。临走时,我握着她的手,不知说些什么好,只说了三个字“你放心”,就同她分手了。

今年是杨匏安烈士诞辰100周年,这位革命先烈的革命业绩、不朽诗文、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都值得我们永远纪念。10年前,在杨匏安诞辰90周年时,在他的家乡建造了他的铜像。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匏安文集》,书中收有中山大学李坚教授撰写的杨匏安烈士传略(本人所写大都引自此文)。在广东知识界知道杨匏安的人较多,但仍有不少人了解他,全国其他地方知道他的就太少了。我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向他学习。因此,今年纪念他的百岁诞辰,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责任编辑 林 耀)



1925年杨匏安(后排右二)与彭湃(前排右二)、何香凝(前排右三)等同志合影

我的父亲杨匏安烈士

● 杨 明 讲述
曾庆榴 整理

我们家祖居广东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第五区北山乡（现改归珠海市管辖）。父亲生于1896年11月6日，幼时在家乡恭都学堂读书。及长，就读于广州广雅书院。离开广雅后，他无法继续升学，只得回到家乡，在恭都学堂任教。不久，由于揭露校长刘希明贪污学款，被刘贿通官府，拘捕入狱。父亲一生，四次禁于牢狱，这是第一次。出狱之后，他就与同族的杨辛甫（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奥汉铁路特别支部的负责人）等，一起到日本留学去了。

父亲在日本留学期间一面勤工俭学，一面苦心钻研有关西方新思潮的著作，发表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从日本回国后，父亲受澳门印刷铺老板陈立如的聘约，担任私馆教师，任职年余。1918年后举家迁往广州，寄居于司后街杨家祠，这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广东初期的共产党组织，经常在这里开会活动，周恩来、陈延年、谭平山、张太雷、苏兆征、彭湃以及廖仲恺等是这里的常客。

父亲在广州，先后在时敏中学、南武中学当教员。这段时间他同何剑吾（南武中学校长）、陈大年（著名律师）等，来往比较密切；同道根女校也有联系，曾应邀去校讲课。当时，父亲年岁不大，被人称做“先生仔”。最近看到父亲当时发表在《广东中华新报》上的几篇诗文。其中《诗选自序》一文说：“吾闻乱亡之

世，其音怨怒而哀思。验之今日，则国政乖矣！吾民困矣！”可见他在讲授诗词时，对黑暗之时政，曾有尖刻的抨击。父亲工于诗词文章，当时报上已有记载。《广东中华新报》1918年3月11日惺公的《东人西人》一文说：“友人杨匏安，文字雅诘，一望而知为曾致力于古文者……”写这篇文章的惺公是谁？我们不清楚，但父亲读书之多，写作之勤，我们是亲眼见到过的。他的书堆积如山，一有时间就披阅卷籍，札记翻译，写作时常常冥思苦想，彻夜不眠。所以他的文章写得好，并对诗文之道持有独到的见解，不是偶然的。父亲发表于《广东中华新报》的十首诗，其中三首同“无庵”有关。这就是《过无庵小饮索章甫》、《秋夜同无庵闲步》、《同无庵都休饮酒》。无庵是谁？据我们回忆，他叫贺瑞垣，家住西关，是个阔佬，我们称他“贺公”。父亲生前不喜同有钱人来往，但同贺公却很投契。贺公生得身高体胖，父亲的诗有“寻诗怯影瘦”之句，自注云：“予与都休皆瘦弱，无庵独伟岸。”这与我们的记忆是相符的。父亲当时以“寒灰”为笔名。他的诗集《寒灰集》，当时曾广为印发。

初到广州的那几年，我们家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家里除父母、祖母、二婆（我们的庶祖母）外还有一个堂叔和一个独身的姑祖母。我们兄弟陆续出生，人口日渐增多，入不敷出。父亲家累繁重，工作忙碌，生

活极度紧张。他之所以在教学之余拼命写作，目的之一是想多赚点稿费，以弥补家用的不足。

父亲五四时期在广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杨士曼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说他“归国后在时敏中学任教，兼《广东中华新报》记者，宣译马克思学说”。

五四运动后，来杨家祠活动的人很多，常到的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阮啸仙等人。父亲加入共产党后，他们的聚会，谈的就是如何发展组织，开展斗争的问题。稍后他们在杨家祠办注音字母教导团，把祠堂当学堂，授课、唱歌好不热闹；谭平山、谭植棠和家父都讲过课。听别人说，他们教的是注音字母，而注音的内容却是进步的文章或书籍，他们巧妙地利用讲课来进行革命宣传。他们还教唱革命歌曲。我们当时年纪很小，但也学会了唱“国际歌”。这说明那时杨家祠内的革命气氛是非常浓烈的。常到杨家祠来的还有学生和工人。因为不久父亲就开始从事青年工作和工人运动。据文件记载，他1922年时曾代理过广东区团委书记。他常邀集一些人到杨家祠谈话、开会或给他们讲课。经常来找他的，是黄沙铁路工务段的工人。

父亲参加革命之初，祖母心里自然是有矛盾的，因为祖母生育过9个儿女，只存活父亲一人，常常为他的安全担忧。但她没有起而阻拦，还靠缝衣服、做手工赚点钱帮助



杨匏安夫人
吴佩琪



杨匏安烈士

家用,支持父亲的革命活动。

1924年国共合作形成后,父亲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委兼组织部长、第二届中央委员和常委。他工作的地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就在杨家祠斜对面街上的那栋楼里。父亲那时特别忙,他全力以赴,从事国民党改组的工作,按照中共的方针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对国民党的组织进行整顿和改造。我们当时年纪小,懂事不多,只是后来读了一些历史材料之后,才对父亲的活动有些片断的了解。陈炯明兵祸东江时,当地国民党组织大多遭到摧残,或者被其利用。第一次东征(1925年2月)时,国民党组织部派东征军黄埔军校前方政治部代行重建潮梅各县的国民党组织,任周恩来为组织主任,鲁易、杨石魂为组织特派员,方方为普宁、揭阳组织特派员。第二次东征(1925年10月)时,任周恩来为东江各属党务组织主任,派彭湃、邓颖超、赖先声(玉润)等组织潮梅特委(见杨匏安《中国国民党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报告——1926年12月》)。这些措施,有的反动刊物攻

击父亲是搞排斥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阴谋,其实这在当时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符合国民党改组的根本原则的。因为孙中山说过:国民党之所以屡起屡蹶,其原因就在于“组织未备,训练未周”,因而才需要输进新的血液——容纳共产党人,实行认真的改组。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国民党,使之免于在堕落中死亡。潮梅地区国民党组织经过改组,特别是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不但组织发展了,而且工作很有起色。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1926年12月)的文件,还说这个地区的党务工作“堪称模范”。这就说明,父亲当时派员整理潮梅党务,并不是“危害”了国民党,相反是推动了国民党的新生和发展;说明反动分子的诽谤和攻击是徒劳的。父亲这一时期还十分注重发展共产党的组织。他的做法,是将一班进步青年吸收进国民党,然后经过锻炼、考验,又将其中之精英分子介绍加入共产党。我们确实见过,他同潘兆璠、赖玉润、沈青雨等等有密切的来往。这班人在当时都是活跃分子。中山大学学生陈录年,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他和妻子经

常来我们家。据说“清党”后不久就牺牲了。黄埔学生来找父亲的也很多,其中李之龙(当时任中山舰舰长)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由于父亲善于团结人,因而引起了反动分子的忌恨。蒋介石1956年在台湾出版的《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谭平山担任组织部长之后,“他就荐杨匏安为该部秘书。杨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于是组织部就在其共产党组织的控制之下,由他们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这些诽谤之词,从反面说明父亲的工作,是忠于国民革命事业,忠于我们党的原则的。

1925年春,革命军第一次东征,不久回师广州,讨伐杨(希闵)刘(震寰)。那时我们家已搬到万福路。刘、杨在败去时肆意抢劫杀人,市面很乱,我们家门口就躺有尸体。肃清叛军后,父亲去了香港,策动工人罢工,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在香港他和戴卓民、胡茵被警探逮捕,一连关了50天。这是父亲第二次坐牢。1925年8月20日出狱那天,传来不幸的消息,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廖先生是父亲的好友。父亲去香港,是以廖先生的代表身份

十月既望泊舟星洲坡港
 故鄉回首戰雲深漏及投荒萬里臨餘日可消行
 坐臥感懷休問去來今江南有夢迷瘴瘴
 海外何人識雅音同樂身閒心獨苦當頭皓
 月伴微吟
 寄小梅
 去國三千里心隨雲水長逃生來絕域問禁入危
 邦歸意再無動公忠不棄忘相思憑夢寄
 月色滿梳櫛

杨匏安烈士
 遗作诗两首

开展工作的。因此廖先生罹难，父亲内心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他回到广州之后，连省港罢工委员会为他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也没参加，就一边为追查廖案的真凶，一边为筹措20多万罢工工友的食宿问题等等，进行了紧张而忙碌的工作。我们记得周恩来、何香凝等曾在我家开会，商量捉拿凶手的问题。

陈延年、陈乔年同志也常来我们家，他们在同父亲商量工作、讨论问题之余，经常同父亲的卫士梁桂华一起打枪练武。此外，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彭湃、刘尔松、杨殷等同志同父亲也有密切的往来。周恩来当时曾送给父亲一个铜制的墨盒。盒盖上刻着一幅西湖风景画，并刻有两行字：“匏安同志文玩——周恩来志”。胡荫也送过

一个墨盒，上面刻着：“匏安同志惠存：努力革命！胡荫敬赠。”这两件文物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它是我们小时候常用的文具，整天带着它上学读书。

父亲当时身居要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很高的地位，因此免不了有些人找上门来要求介绍工作，安排职务。对这些问题，父亲总是秉公处理，丝毫不讲私情。他常说，做人要脚踏实地，光明磊落；告诉我们不许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有一年中秋节，有人送来几盒月饼就走了。父亲回家看到后，十分生气，一定要家里人查明来处，把礼物送回去。又有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在杨家祠发放一笔捐款，事后草袋（那时装银毫都用草袋）里剩下一个两毛钱的银币，被我

们捡到了。父亲发现后严肃地对我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要我们把钱送回去。这两件小事，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在广州暴动后去了南洋。他在南洋曾写给他的堂妹夫霍志鹏两首诗，被霍家保存下来。诗中有“自笑身闲心独苦”，“海外何人辨雅音”等句，可以看出，大革命失败后，父亲流落异国，心情是极其痛苦而悲愤的。

父亲在南洋的时间不长。1928年4月清明节时，他和我的哥哥宗玄（杨玄）一起去上海，家中其他人不久也迁往上海。在上海我们的处境是危险的，生活是艰苦的。父母在我党中央地下机关工作，他们的住处是秘密的，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则分散住在党的各种交通、出版等机关里。经常变换住处，几乎每月都要搬家。那时我们正是上学读书的年纪，但由于环境险恶，怕人认出我们，只好失学，化装成各种身份，掩护党的活动。或担任传递消息，散发传单、书报，或到印刷出版机关工作等等。我们口袋里装着两毛钱，规定平时不准动用，一旦机关暴露，或同组织失去联系时，才准作救急之用买东西吃。祖母年老，不太引人注目，她用这一条件掩护过很多同志。庶祖母周秀英挑担子进工厂走街串巷，把传单文件塞在箩筐里。为革命，我们一家老少也算出过一点力量。大约1930年时由于《红旗日报》暴露，父亲被捕，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党中央及周恩来同志大力组织营救，并冒着白色恐怖来看望祖母和孩子们。祖母很感动，说：“这么危险，你就别来看我了。”坚决不许他再来。由于父亲没有暴露身份，敌人没查出他的真面目。加上党组织通过律师公会进行了营救。结果在公共租界提篮桥监狱关了8个月就释放了。这是他第三次坐牢。出狱后一天晚上，全家

聚在一起谈话。记不得谁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父亲说：“再穷再危险，也要革命到底，不能半心半意。”祖母说：“既然这样，我们全家都支持你。”那一晚的情景，今天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祖母、母亲的话犹在我们耳边回响。

父亲在上海时，写作和翻译过许多文章。据我们所知，他曾用“王纯一”的笔名出版过两本书：一本叫《西洋史要》，一本叫《地租论》。这两本书都是在杜国辛（即林伯修）同志主持的南强书局出版的，我们曾到那家书店取过版税。

《红旗日报》遭破坏时，与父亲一同被捕的有20多人，其中有陈筱梅的丈夫胡章原。那时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罗绮园，趁胡章原被捕的机会觊觎陈筱梅。陈当过护士，与我们同住在一个机关，在一栋楼内。那个地方是个印刷机关，负责排字校对和打纸版，然后送到别处印刷。这里很容易暴露，每天有几个同志来工作，完事就走，尽量减少留住人员，重要的人物是不能来这里的。但罗绮园为了接近陈筱梅，却常常借故到那个地方来。后来他还以工作需要为名，将陈调去同他一起住。胡章原出狱后，对此极为不满。罗绮园还不罢休，又借组织名义将胡章原调离上海，派到危险性很大的温州去工作。胡怀恨在心，离开上海那天，开船前几分钟，假称上厕所，摆脱同行的同志，上岸向国民党特务机关告密。罗绮园因此被捕，并累及十多个人，致使父亲再一次落入敌手。

父亲被捕的那天半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闯进来的是一群持枪的特务，开口就说要找杨匏安。父亲知道自己暴露了，说“我就是杨匏安。”母亲给他找了件御寒的衣服，我们忍着极度的悲愤，看着他被特务押走。这一走竟成为永诀！他在狱中曾传出一张字

条子，那是铅笔写的，大意是：近日有个南京“旧识”去劝他，他不为所动；告诫家里的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果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我们记得两句原话是“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等等。（缝纫机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可以谋生的工具，别无财产，故父亲着意叮咛）。从此以后，我们虽然到处打听，但再也得不到他的确切音讯了。（父亲被杀害，组织上怕我祖母及家人伤心，长期没告诉我们）。不久，上海发生“一二·八”战事，我们陷在战区，逃出后又同党组织断了联系。这时我们只好按照父亲的嘱咐，南返广州。在广州，不久我们又住进杨家祠（不用租钱），那时外有反动派的压迫，内有族中恶棍的欺凌，几年间所受的苦楚，真是口舌所不能尽述的。

好容易才熬到1938年。那时已是抗战时期，我辗转回到武汉，见到了周恩来同志。这时才知道党组织和周恩来叔叔一直关心着我们，并派人到处寻找我们一家的下落。周恩来对我说，他除了托何香凝先生及一些同志找我们外，曾亲自化名周翔宇写信给我们的乡亲，打听我们的下落。周恩来叔叔详尽告诉我们那一次胡章原告密，罗绮园被捕，祸及父亲缙狱的经过。他说：“罗绮园动摇变节，当了可耻的叛徒。你父亲很英勇，保持了革命气节。那时，蒋介石接连写过两封劝降信，被他撕毁了。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到狱中劝他投降，他就把安到牢房里的话筒摔碎了。”周恩来叔叔还说：党组织已作好了准备，拟在反动派把你父亲解到南京或苏州时，武装抢劫囚车，把他营救出来。但狡猾的蒋介石却下了在龙华就地处决的命令，我们的营救没有成功！周恩来还问我这几年怎样渡过困难，做过些什么事？参加过些什么会议？我告诉他，祖母和母亲靠打零工，做手工，我们小孩子基本上是到处寄食

流浪。我和妹妹经陈大年先生的提保进了孤儿院，到1935年，何香凝伯母回到广州后，把我从孤儿院接出来送到“仲恺农工学校”读农科，由此我参加了救亡运动，结识了由北平南来的黄秋耘、于光远、力伯皖等同志，组织“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队部。后来为逃避国民党的通缉到了海南，和海口地下党市委林克泽取得联系并由他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勉励我们好好学习，继承父志，革命到底。他还给祖母寄了信和生活费用，并委托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负责安排我们一家的工作和生活。

最后谈谈关于父亲牺牲前在狱中所写的一首诗。时间大约是1943年元旦，那天邓颖超妈妈要我和弟弟杨玄，到她住处延安杨家岭过年，周叔叔也在。邓妈妈拿出亲手抄的一首诗给我们看，说这是你父亲临牺牲前写的，这是父亲的绝命诗。我们当时将这首诗转抄在一张小纸上，一直保存了下来。这首诗的原文是：

死前一夕作，示狱友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
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
知止穷张俭，迟行笑子渊。
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

这首诗有些字句与《革命烈士诗抄》发表的略有不同。我们认为从邓颖超同志处抄来的是比较真实可信的。这首诗，是父亲的革命精神和崇高气节的见证，是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读着这首诗，就更加加深我们对他的追思和怀念，更加激励我们努力工作，革命到底，勇往直前！

（本文根据杨匏安烈士的儿子杨明同他的兄弟杨玄、杨感生前回忆材料，由曾庆榴同志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 林 耀）

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 杰出代表胡愈之

● 马仲扬

胡愈之是我国进步文化事业的先驱者之一，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1996年9月9日，是他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在纪念他的百年诞辰之际，重温他那种追求真理，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坚韧不拔的精神，可以使后人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一、珍贵的“师生之谊”

胡愈之是浙江上虞人，生于1896年9月9日，父亲是清末维新派的知识分子，在乡创办新学，受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倾向民主革命。他对胡愈之的启蒙和教育起了重要作用。胡愈之的幼年进了私塾，后来进了县里设立的高等小学堂，按当时的课程规定，这种小学堂毕业，就取得了秀才的资格。胡愈之小学堂毕业之后，于1911年离开家乡去考绍兴府中学堂。这个中学堂是为绍兴府所属8个县设立的，学制4年，读完4年即可取得举人资格。学堂分设文、实两科。胡愈之对数理有兴趣，因而考了插班二年级实科生，成绩为第一名。鲁迅当时在这所学校任学监并兼授生理卫生课，他对学生既有言教，也有身教，胡愈之正是在这里和鲁迅结下了难忘的师生之谊，且使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得到充实和发展。1912年胡愈之离开绍兴府中学堂，进了杭州

英文专科学校，除攻读英语之外，还参加了世界语的函授学习，从而掌握了世界语。1914年，胡愈之18岁，因家庭经济情况所限，告别学生生活，到上海考取了商务印书馆，当了编译所的练习生。后来主编了《东方杂志》。

与鲁迅有“师生之谊”的胡愈之，在上海拓展进步文化事业，得到了鲁迅的关心和支持。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胡愈之坚定地投入以鲁迅为首的反文化“围剿”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和胡愈之又紧密地团结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

1933年初，鲁迅邀胡愈之、邹韬奋一起参加宋庆龄、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为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政治犯”做了许多工作。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住在鲁迅家中的中共党员冯雪峰，立即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胡愈之，并说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组织办理。胡愈之同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及其他领导共同商讨后决定：鲁迅的葬礼，以上海救国联合会名义主办，并通过这一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由于胡愈之的具体组织和大家的努力，鲁迅的葬礼，进行得十分隆重。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让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

天。10月22日下午2时起灵，把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都参加了送葬行列，近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既唱挽歌，又呼口号，群情激愤，震动了整个上海。这不仅反映了群众对巨人鲁迅的爱戴，也反映了人民抗日救亡的高涨热情。

胡愈之不仅出色地组织办理了鲁迅丧仪，而且承担了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任务。当时抗战烽火已起，各种条件极其困难，胡愈之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了《鲁迅全集》这部巨著出版面世，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抗议“四·一二” 血腥屠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四·一二”的第二天，即4月13日，胡愈之目击了国民党驻军开机关枪，大批屠杀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他满怀激愤，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中的文化界著名人士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递交了对蒋介石的《抗议书》，其中写道：

“4月13日午后一时半，闸北青云路市民大会散会后，群众排队游行，经由宝山路，当时群众秩序极

佳,且杂有妇女童工。工会纠察队于先一日解除武装,足证是日并未携有武器。”群众正欲前进至虬江路,“即被鸿兴路口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前哨兵拦住去路。正在此时,司令部守兵即开放步枪,嗣又用机关枪向密集宝山路之群众,瞄准扫射,历时约15分钟,枪弹当有五六百发。群众因大队拥挤,不及退避,伤毙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人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食品里居户,捕得青布短衣之工人,即在路旁枪毙。”“国民革命军为人民之军队,为民族解放自由而奋斗,在吾国革命史上,已有光荣之地位,今乃演此灭绝人道之暴行,实为吾人始料之所不及。”

在《抗议书》上署名的有: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7人。《抗议书》4月14日发出。15日就在《商报》上公开发表了,这是胡愈之利用他弟弟胡仲持在该报作编辑的方便,把蒋介石的血腥罪行予以曝光。

《抗议书》的执笔者和组织者都是胡愈之,在血腥屠杀的险境下,在风云急转的危难中,没有大智大勇,是不可能这样大声疾呼并付诸行动的。尽管当时胡愈之还不是共产党员,而他为革命写下的这块丰碑是不朽的。现在,这份《抗议书》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收藏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里。

三、与邹韬奋共难共谋

胡愈之与邹韬奋,在国民党统治区,为了进步文化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共同奋斗,费尽心力,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胡乔木生前回忆:“1933年9月,他(胡愈之)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愈之同志按照党的指示,想方设法打开宣传局面,占领宣传阵地。……这

个时期他在出版事业方面做的一件最重要的工作,是支持和帮助邹韬奋同志办好《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为巩固和扩大进步文化阵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书籍和其他刊物。他还协助韬奋起草了生活书店章程,并在1933年进一步协助韬奋把生活书店改组成一个生产合作社,规定了成套的经营管理原则,使生活书店的组织形式更适合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需要。生活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版了大量的革命和进步的书刊,为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胡愈之印象记》第18页)

夏衍生前也说:“韬奋的转变,完全是胡愈之的功劳。韬奋的生活书店,胡愈之是‘军师’,他出主意,做了大量的工作。”(《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4期《夏衍谈“左联”后期》)

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关于这件事是这样写的:“党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是共产党人对《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帮助。《生活周刊》原来的内容主要是谈论个人修养问题,也进行一些职业指导,其政治思想倾向属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使邹韬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生活周刊》从此办得有声有色,发行量达到十多万份。邹韬奋的言论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生活书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18—119页)

胡愈之在文化界活动,是以编辑家、政论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身份出面的,因为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不能暴露身份,就是同他很接近的人,也不一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他同邹韬奋是亲密的战友,为着共同的事业,有着共同的方向,他们心心相印,携手前进,一起战斗了10年。

四、全力营救“七君子”

1936年11月22日深夜,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7人被捕,后送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关押。这是国民党当局对救国会举办鲁迅葬礼而引发群众爱国示威大游行的报复措施。这一反动举措,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救国有罪,成了广为流传的话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

宋庆龄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



1939年胡愈之去新加坡时在船上留影

份立即发表严正声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幕后指使这次逮捕，有很明显的证据。”后来从敌伪档案中查明，当时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确实派人到上海市政府，提出日本政府的强硬“要求”，上海市政当局，奉南京指令，对“七君子”进行逮捕的。对此，北平、天津和华北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群众，纷纷提出了强烈抗议和立即释放爱国领袖的要求；上海市有4800人联合签名，5000人参加会议，先是呼吁，继而抗议；广州7000名学生签名要求爱国自由和沈钧儒等7人无罪释放；连国民党高级著名人士冯玉祥、于右任也在南京发起了十万人签名运动；李宗仁、白崇禧发出营救电报；张学良飞赴洛阳请求蒋介石释放“七君子”。

中共中央为此发表宣言，指出：“沈钧儒等以坦白之襟怀，热烈之感情，光明磊落之态度，提倡全国团结，共赴国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实我中华男女之应尽责任与光荣模范。”

胡愈之在这种形势下，肩负起了党交给的动员各界力量，迫使国民党无罪释放“七君子”的重大任务，并立即投入紧张的斗争。

在组织方面。首先把救国会的力量运作起来。救国会是抗日救国的社会政团，组织工作不大严密，领导人突然被捕，如何开展有力的斗争，如何调动全社会的关注，又如何抓住关键环节，壮大爱国正义力量的增长，打击和孤立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这需要胡愈之花很多心力，在救国会内外，在被捕者家属和友好中，在文化界、新闻界和律师中，在社会各层人士中，都需要按不同对象，进行不同的解释和答复，以凝聚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这些方面，他都做得井井有条。

在宣传方面。他不仅直接执犀利之笔，参与斗争，也号召大批骨干命笔响应，与他一起瞄准丧失人心的国民党政府，为营救“七君子”大



胡愈之和老友叶圣陶交谈

造舆论。

胡愈之在宣传方面的特殊优势，是以外语为工具，与国际友人直接打交道。他不仅精通英语，而且法语运用自如，世界语也是他掌握的武器。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艾泼斯坦、艾黎等，都是他交往的好友，他又曾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工作过。他以上海租界作掩护，从事营救“七君子”的活动，国民党特务对他也无奈何。

有了上面的基础和条件，胡愈之的信息很灵通。他能将外面的信息传给狱中的“七君子”，又能了解到“七君子”的一切情况和要求，尽管监牢囚房隔在他们之间，但彼此的关注，相互鼓舞，使他们共同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强起来。西安事变之后，对“七君子”的看守突然严格起来，连家属探监也被中断，不给报纸，增派宪兵，军警加岗，顿时成为警戒状态。在这关键时刻，胡愈之与狱中中断联系。为突破国民党的严密防守，胡愈之将写好的国内外形势和其他信息，密约韬奋、公朴、乃器等人的几个孩子，贴身放好，逐一叮嘱，让他们前往探监，同时又与监内一位看守打通了关系，这样终于将外面的信息，传到狱中，恢复了

与“七君子”的联系。

在营救“七君子”活动中更加引人注意的是以下几件事：

第一，“七君子”本来是日本人指使逮捕的，国民党政府却掩人耳目，罗织了莫须有的所谓“十大罪状”，法庭5次开庭审讯“七君子”，诬陷他们“危害民国”！“七君子”雄辩地一一驳斥了这种拙劣的谎言。加上胡愈之与7人共商约请著名律师（每人请两位，共14人）组成辩护团，沈钧儒、史良、沙千里三人本来就是著名的律师。强大的律师阵营，使检察官、法官为之吃惊。每位律师口若悬河，唇枪舌剑，驳得对方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引起旁听席上不是对被告的同情欢呼，就是对审判者的冷讽热嘲，使人分辨不清究竟是谁审判谁？

第二，真正的爱国志士，一致认为，拯救国家危亡是我中华儿女应尽的天职，“七君子”忠贞爱国何罪之有？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在胡愈之的安排下，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1937年6月27日，除宋、何之外，胡愈之、彭文应、潘大逵、王统照、张天翼、沈兹九等16人，前往苏州，自请入狱，提出如果爱国有“罪”，要求同“七君子”同“罪”，如爱



胡愈之与沈兹九在北京住处（1972年）

国无罪，则与“七君子”同享自由。江苏高等法院不敢收留，国民党惶恐不安，社会上盛传奇闻，正义之士纷纷提出这一要求。7月5日，宋庆龄、胡愈之、陈波儿、胡子婴、张宗麟、沈兹九等人再次前往苏州，并自带行李、雨具，以示入狱决心。这一历史壮举，使国民党高等法院不敢贸然对“七君子”判罪。

第三，胡愈之是直接掌握“七君子”案的新闻报道的。他获悉6月11日开庭审讯，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他派张仲实等人前往苏州去旁听，又约请上海各报友好预留第二天的版面，以报道审讯的详细情况。胡愈之生前回忆说：“晚上在苏州听审的记者一回来，我就在生活书店听取他们汇报，同时执笔撰写了《爱国无罪听审记》，我写完一部分立即交人刻印，随即送各报排字排版，就是这样写一部分送一部分，一共送了4次，最后部分完稿送去时已是晨3时左右，终于使这篇文章在第二天上海几个报纸上差不多整版篇幅登载出来，揭露了反动政府所谓审判的真实情况，引起了轰动，更增加了对国民党的舆论压力。”（《我的回忆》第41页）与此同时，胡愈之还把国民

党反动政府的丑恶行径，以各种外文揭露于全世界。

五、杰出的文化战士

抗日战争在上海燃起之后，许多文化单位遭到惨重损失，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文化单位和人员西迁到武汉和重庆。

在战事急变、炮火袭击的形势下，胡愈之苦恋不舍的是两部书，一是约600万字的首版《鲁迅全集》，一是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这两部书，在胡愈之看来，都是中国人民渴望的精神食粮，应当及时地送到读者手中。可是，当时既无出版资金，又无印制条件，离开上海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他只好留在“孤岛”上完成这一任务。

《西行漫记》是著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6月从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作了4个月的采访，所写的一本动人报道，也是突破国民党新闻封锁，向外部世界透露红色区域真实情况的珍贵史料。这本书由伦敦戈兰茨公司第一次出版，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接连发行了5版。

胡愈之看了这本书的英文版之后，认为它不仅关心中国的外国人需要，而长期被欺骗被封锁的中国人更需要。得到斯诺的同意之后，立即动手翻译出版。可是当时的上海已为日军侵占，租界当局对中日战争宣告中立，要在这里公开出书是不可能的。在这种危难中，胡愈之就把上海租界内的一群抗日救亡人士组织起来，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以“复社”的名义，集体翻译、印刷、出版和发行这本书的中译本。斯诺除了对原著的文字作了少量的增删，并且增加了为原书所没有的大量图片以外，还为中译本写了序言。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中译本用了《西行漫记》这个书名，作为掩护。

《西行漫记》出版之后，不到几个月，就轰动了国内和国外华侨聚集的所在地。连印五六版，发行八九万册。原来无资金，是他们几个人凑了点钱买纸，排印费是出书销售后归还的。

从此书的出版和发行，胡愈之得到启发，接着《鲁迅全集》的出版，也以预约推销的办法，来解决缺少资金的问题。

完成出书任务后，为参加抗日活动，胡愈之到达武汉，当时国共已经合作，他被周恩来留下，担任了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五处处长，分管宣传工作。当时直接领导政治部和三厅的是周恩来。为了更好地做好宣传工作，周恩来曾与胡愈之作了一次通宵达旦的长谈，他指出：我们尽力做好宣传工作，提高群众的认识和觉悟，就可以抵消国民党顽固派的一部分影响，使他们搞颠倒黑白和投降的阴谋难以得逞，就能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要排除万难去做好工作，同时在向国民党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中，又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不作无原则的让步。根据这些原则，胡愈之同其他同志一起，组织了“七七”

抗战一周年的宣传周活动。大批宣传队、演剧队，深入武汉三镇街头，向群众演说和表演，发动几十万人火炬大游行，振奋了整个武汉。胡愈之利用朋友关系，与范长江一起组织一个国际新闻社，以合作社形式创办通讯社，并取得国民党中央国际宣传处的认可，这就得到了采访和发布新闻的合法地位，在国际宣传上起了很大作用。

武汉失陷前夕，胡愈之在周恩来的指派下，到了广西桂林。对桂系上层领导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进行了成功的统战工作。桂林是当时著名的文化城，聚集了大批文化人，有不少是胡愈之的老相识和老战友。由于国民党中央同桂系之间存在着矛盾，国民党特务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不敢肆无忌惮。胡愈之代表救国会和李任仁等人办的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建立“文化供应社”，社长为陈劭先，胡愈之任董事和编辑部主任，又聘请了王鲁彦、宋云彬、傅彬然等一批著名编辑。这是一个进步的出版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据点，在西南，在国统区都有很大的影响，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0年11月，胡愈之经香港到了新加坡，由周恩来和廖承志推荐去办《南洋商报》。该报系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后归大实业家李光前（陈嘉庚的女婿）等人所有。掌管经营和舆论大权的董事经理傅无闷，是个政治敏感的老报人，拥护筹赈爱国运动，拥护陈嘉庚等爱国华侨。直接和胡愈之联系的是进步记者张楚琨。胡愈之的老友俞颂华在《星岛日报》当总编，郁达夫编副刊。这批文化人，受到了新加坡华侨的热烈欢迎，他们的文章成了爱国华侨的心声。但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了新加坡，这批进步文化人都变成被残酷迫害的对象，流离失所，改名换姓，隐藏漂泊于南洋各地，著名作家郁达夫就是在日寇

侵占南洋后惨遭杀害的。

1945年9月，胡愈之和沈兹九等，又回到新加坡，得助于上海帮侨领陈岳书的支持，办起了一个“新南洋出版社”，专门经销国内和港澳出版的进步书刊，不久又创办《风下》周刊，这是一本指导青年学习和认识世界的综合性刊物。1946年初，又创办了《新妇女》，由沈兹九主编，在广大妇女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民盟中央要胡愈之在南洋负责建立和发展民盟组织，于是民盟南洋总支部迅即成立，新加坡也成立了办事处，吸引了华侨中的爱国、进步的知识界人士，很快发展到数千人。为加强爱国华侨的团结，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胡愈之等又办了一份《南侨日报》，于1946年11月21日问世，日出8大版，胡愈之任社长，并负责言论方针和编辑事务。他在《创刊词》中说：“以前南侨是抗日长城，现在南侨是和平先驱，民主堡垒”，“唯以和平民主为宗旨，对内要和平，对外亦要和平，南洋要实行民主，祖国更不可不实行民主。”

胡愈之在南洋的七八年中，充满了磨练和斗争，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他都笔耕不止，时论不停。他留下的是坦诚直书，满腔爱国深情。他的著作对促进南洋华侨的觉醒，起着深远的影响。

六、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胡愈之在建国以后，是人民共和国的首任出版总署署长。他既是新文化的先驱，又是新闻出版界的专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权威。在他的领导下，聚集了一大批专家，共同建立了出版总署的具体机构和它所属的各个领导机关，为发展和繁荣新中国的出版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愈老”是大家对他的亲切尊称，他同人交谈，平易近人，循

循善诱，一直是学者风度，没有什么官架子，被他领导过的干部至今对他念念不忘。此外，胡愈之还兼任过建国以后《光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对知识界有过很大的影响，起过很好的作用。胡愈之自己是知识分子，他一生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知识分子的好朋友。以后，根据党的安排，他担任了民盟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熟悉而且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贯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他身处“逆境”的时候，仍然不顾“四人帮”的威胁和压力，冒险去探视一些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使这些知识分子十分感动。

长期在民盟工作的闵刚侯，在“文革”中备受折磨，在医院医疗时，胡愈之多次到医院探视问候，闵逝世后，他继续关心其家属和子女；

对当时受到特别冷落而无人过问的沈雁冰，他前去看望，送去革命友情，并利用一切机会反映沈雁冰的正当要求，使沈的问题受到重视；

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病危，被从隔离的监牢里转到阜外医院，胡愈之不顾一切赶到医院，向这位含冤受辱的老同志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老共产党员楚图南被隔离审查，最后下放到干校，胡愈之想各种办法同他保持联系，见不到本人，找到他老伴，关心地询问一切；

冯雪峰逝世后，“四人帮”不准开告别会，在最初的治丧方案中，连“同志”都不许称呼，胡愈之仗义执言，奔走呼吁，后来总算争得了用“冯雪峰同志”的名义；

胡愈之还和周士钊、杨东纯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虽未能如愿，但他们向被指派代表，诚挚而沉痛地反映了“文革”中若干关键性的重要问题。

胡愈之虽然离开了人间，但他的言行，成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光辉榜样，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责任编辑 林 耀）

跟着红军走到如今的 扎喜旺徐

● 李志刚 李泰年



扎喜旺徐（摄于1995年）

美国作家海伦·斯诺在《延安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在延安的那些日子里，一次曾碰到一位瘦高个儿、一头卷发，行为比较异样，说话不太听得懂的红军战士，通

过翻译知道他是一个来自川西北的战士，现在延安一所学校读书识字。看来他和这里多数战士处得很融洽。”海伦·斯诺这里讲的藏族红军战士叫扎喜旺徐，他是中国共产党

培养的最早一批藏族干部之一，离休前曾任青海省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省人大主任。

在红军和藏民 之间搭桥

扎喜旺徐于1913年农历六月二十五日出生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瞻化）一个贫苦牧民家庭，从小给牧主放羊，当长工。

1935年10月16日，红四方面军攻打百丈时失利，张国焘下令部队往北撤到四川甘孜。当时这里非常荒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红军到来的消息引起整个村子惊恐和骚动，土司、头人、牧主、大喇嘛、大官家和有钱人东躲西藏；贫苦牧民也逃到百里外的山沟、森林里躲避起来。

扎喜旺徐当年21岁，给本村一家牧主当长工。牧主逃跑后，他却悄悄地留下来想看个究竟。他



果洛和平解放时，最大头人旦增嘉措等向扎喜旺徐（中）敬献哈达

想：天上的老鸹没人打。因为它的肉不好吃，毛不值钱；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红军杀我干啥？

1936年2月的一天，徐向前带领红四方面军进驻甘孜。扎喜旺徐大着胆子跑到县城观看红军，要看看红军到底与白军有啥不同。他见红军官兵平等待人，和蔼可亲，见了藏族老人先行举手礼，同见了藏民骂“番子”的国民党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在红军司令部里，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接待了他们。后来知道这人叫邵式平（解放后曾任江西省省长），他了解到扎喜旺徐的身世后，要他把村里人找回来，向他们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不打人骂人，不伤害宗教界人士。

扎喜旺徐领了任务，就到各处说服群众返回村里。但是，由于受国民党挑拨诬蔑之毒太深，不少人仍心有余悸。扎喜旺徐想到了最受人尊敬的格达活佛，如果消除了他的疑虑，县里许多人都可以争取过来。

隐藏着的格达活佛，很快被扎喜旺徐找到了，扎喜旺徐告诉他红军是劳苦群众的军队，经过甘孜是

为了北上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格达活佛听了解释，对自己的随员说：“我作为活佛，14岁到西藏噶丹寺学经，是用佛经超度人们灵魂到极乐世界去，而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军队。我们的信仰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劳苦大众。”他回到他主持的甘孜县百土寺家庙，见经堂、佛像等完好无损，更增添了对红军的信赖之情，在扎喜旺徐引见下，很快与红军会面。后在格达和扎喜的带领动员下，白利寺所属僧俗群众捐献的“拥护红军粮”，计有青稞134石，豌豆22石，军马15匹，牦牛19头。为了感谢对红军的大力支援，1936年4月17日，红四方面军特为白利寺发出布告：“查白利喇嘛寺配合红军共同兴藏灭蒋，给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犯，违者严办，切切此布！”朱德总司令到了甘孜，亲自看望了格达活佛和扎喜旺徐他们。

同年2月，在红军途经康北时，昌都地区的红教喇嘛呼图克图·诺那，纠集地方武装在康区堵截红军，迫使红军两次进行反击。诺那溃逃到甘孜后，又纠集康区最大

的藏族封建土司——德格土司泽旺登，率领骑兵数千名，在甘孜白利寺一线，再次阻击红军。扎喜旺徐得知连夜赶到县城向红四方面军总部报告，又急回村子，说服群众不要受蒙蔽。4月1日，提前得到消息的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作好充分准备，一举击溃了德格土司泽旺登及其属下的进攻，克复了甘孜、瞻化、白玉。诺那被下瞻堆土司却葛、巴登多吉俘获。

诺那被送到红四方面军总部后，总部负责人找来扎喜旺徐，让扎喜告诉诺那：红军考虑到诺那是一位康巴的藏族宗教界人士，在藏区很有影响，不杀他，只要他从此不反对红军，就既往不咎。扎喜旺徐向诺那反复解释党的民族、宗教和统战政策，还陪同护理、照顾诺那的食宿，诺那逐渐改变了仇视红军的态度，还跟红军指战员交上了朋友，他教红军学藏语、藏歌，亲自煮酥油茶款待红军。

同年4月，率领两千余名藏族士兵，连夜奔袭驻绒坝岔红军的夏克刀登，反被红四方面军的二六五团俘虏后，红军对他以礼相待，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派人找来扎喜旺徐，一起向夏克刀登宣传党的民族统战政策，扎喜旺徐和其他绒坝岔的藏族群众还把红军与国民党有什么不同之处讲给夏克刀登等人。经过反复宣传，夏克刀登的疑心冰释，与李先念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帮助红军筹集军需物资，计牛150头，马53匹和大批粮食。

7月2日，贺龙率领主力部队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久，红四方面军先行北上，邵式平安排扎喜旺徐为红二方面军过松潘草地准备粮食和其他物资。扎喜旺徐走村串户，依靠着红军的良好影响和他的宣传、说服，短短四十几天时间，筹集到粮食四万六千多斤，以及一些酥油和肉类。二方面军撤离甘孜时，扎喜旺徐毅然

跟着红二方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

舍死忘生朝北走 再朝北走

扎喜旺徐跟随贺龙的部队越过一座又一座雪山。山上不是下雪就是刮风，积雪常从山头崩落。在一个冰雪的世界里，人踩在冰上滑倒了，挣扎着往前爬，却没有力气。但谁也没想到会死，也不知道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氧气如此稀薄。有的人挣扎着站起来，结果却永远倒了下去。卫生员叮嘱大家，在山顶上一刻也不能停留，尽快翻过山顶，不能休息。浑身麻木得好像自己已不存在了，扎喜旺徐靠着坚定的信念和求生的欲望坚持再坚持。

一旦越过山顶，最好的办法是坐在冰雪上往下滑，反正没有路，多数人都这样滑了下去。尽管有人为此摔断了骨头，甚至滑下了悬崖，但总体看来，这仍不失之为最好的下山办法。

在冰天雪地里，大多数战士还穿着草鞋，有些人找到破布把脚包了起来，多数人没有包，冻伤是可想而知的。扎喜旺徐属于最惨的一类，他是光着脚翻越雪山的。好在他体力比较好，总算挺过来了，只剩下一副没有多少肉的“骨头架子”。

越过隘口，队伍行进在人迹罕见的地方。这里留给扎喜的印象是：只有月亮、雪山和一望无际的荒原。红军来到这里时，藏族群众也因害怕而逃到更荒凉的地方去了。只有小股藏族牧民在山头上向没有戒备的红军战士放枪或扔石块，战士们奉命不准还击。扎喜旺徐用藏语向藏族群众使劲地喊叫：“不要打，这是‘红汉’，不是‘白汉’，是穷人的队伍。”

他们走的路，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小路上没有标志，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的野草，草的



1988年，扎喜旺徐（中）在四川甘孜调研

下面就是水，沼泽地软得像酸奶一样，积水常常没过膝盖，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们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中。扎喜旺徐永远也忘不掉他搭救一个战士的情景：他拉一个在泥潭中挣扎的同志刚站起来，一下又跌倒在泥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他试图再去拉那战士时，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小心翼翼地往那个战士的嘴里放了些炒青稞，但那战士已无力咀嚼。他眼巴巴地看着那个战士咽了气，蜷缩在沼泽地里。此后，每当扎喜从干粮袋里拿出炒青稞吃时，那位战士的悲惨形象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没有食物，体力消耗又大，他们就采集蒲公英、荨麻、苦苦菜、花花菜、辣辣盖等野生植物充饥。令扎喜旺徐欣喜的是，长征途中他一直在贺龙同志身边。贺老总是个性情开朗的人，总有说不完的笑话；他有离开家时带的烟叶，常常给贺老总吸，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1936年9月份，扎喜旺徐所在部队到达甘肃静宁、会宁地区。部队驻扎在农民的麦场上，由于行军

打仗极度的疲劳，扎喜旺徐一头扎进麦草堆睡着了，部队出发的吹哨声竟也没有听到。扎喜一觉醒来，部队已走得无影无踪。不大懂汉语的扎喜旺徐白天隐蔽，晚上看着北斗星继续往北走。一天，他实在找不到东西吃，饿极了，便潜入一个富人家，偷出一只鸡。没有刀剪，他用手把鸡脖子拧断，喝鸡血，吃生鸡肉。但不巧被人发现抓住，把他当成红军的“向导”拷打，逼问。他装作听不懂，只是龇牙咧嘴地笑；把他绑在树上，用棍子打，他又故作委屈地哭。那些人还是不罢手，往死里整治他，他就又装死，趁其不备逃出了虎口。

又一次，他被马家军阀所属的甘南一个民团抓住，判断他是掉队的红军，便捆打逼问，先把他的脚吊在树上用鞭子狠劲地抽，然后又放下来扒了裤子在屁股上用白桦棍子打，直打得他皮开肉绽。有了头一次挨打的教训，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吭，寻找逃跑机会。

这次，扎喜旺徐是被敌人打得昏死过去，拖出村庄后，侥幸苏醒过来逃生的。他一恢复知觉，便在那

茫茫的黑夜里,寻找那天上的北斗星。他十分清楚,红军北上了,朝着北斗星走,就能够找到红军。稍有了一点力气,他便坚持着爬行,尔后慢慢站起来,一步一步向北,向北。有一天,天快黑时,他猛然听到了熟悉的红军歌声,接着是军号声,扎喜旺徐竟高兴得疯了似地循着声音跑去。哨兵问他是干啥的,他立刻举起双手说:“红军!红军!”当同志们帮他洗掉脸上手上的血污时,当部队首长认出他就是与藏民打交道的“好帮手”扎喜时,当扎喜得知他失踪后部队曾多次派人寻找未果时,他不止一次地泪如泉涌。第三天,他被送到了贺龙首长那里。

民族学院里的 “扫盲对象”

延安,对扎喜旺徐来说既是革命的大熔炉,又是一所学习政治文化的大学校。

1936年10月,扎喜旺徐等许多同志被送往延安中央党校,董必武、谢觉哉、成仿吾三位老同志都来迎接。董老详细询问了每个人的情况,并为大家安排好了住处。1937年3月,民族学院开学,按民族分班编组,藏族除扎喜旺徐以外,还有天宝、郭锐、杨东升、孟泰、罗德干、贺土司和王寿等人。在这里,扎喜旺徐第一次系统学习了政治课和文化课。政治课包括:中国革命问题、民族问题和时事政治;文化课有汉语、历史、地理、数学和自然常识等。在延安的那些日子,是紧张而愉快的。

这里,经常进行各种集体比赛,由连、营、团分别给在体育运动、军事训练、政治学习、识字、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优胜者颁发奖旗。这些奖旗都陈列在每个团或连的列宁室里。

列宁室每个连都有,是政治文

化活动的中心。室内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像,室内有土制的模型,也有是用来识字的地方。每个战士的笔记本挂在墙上指定的木钉上。学校分五个识字班,识字不到100的一个班,识字100—300的一个班;能读写的字超过300的又是一个班。扎喜旺徐被分配在一个完全不识字的“瞎子班”,他在这里大约学了一年零四个月。

识字课本的内容,是以政治宣传为主的。扎喜旺徐至今还记得有一课的内容是:“这是什么?这是红旗。”“红旗是什么?红旗是红军的旗帜。”“什么是红军?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如果谁第一个学会五六百汉字,谁就会受到表彰、奖励,奖品是红旗,或是铅笔。谁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就发给他一本叫《红色中华》的小字典,里面是有注音字母的。

扎喜旺徐在延安进步很快,不但学会了一些汉字,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而且还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思想上发生了质的飞跃。1941年成为陕甘宁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扎喜旺徐被党组织派往张家口,任自治运动联合会盐务局长。1946年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古分会成立,扎喜旺徐调到锡林郭勒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扎喜旺徐调到察哈尔盟行政委员会任处长,为扫除内蒙古境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土匪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扎喜旺徐随军来青海。曾任省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工商厅副厅长。1950年8月奉命拜见班禅大师,转交了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的信函和赠礼,请班禅号召西藏人民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1950年10月,在青海省首届

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扎喜旺徐当选为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不辱使命, 一心为民族和解

扎喜旺徐同志先后于1949年底和1979年春两度来青海工作。为青海的民族工作作了重要贡献。

解放初期,青海省人民政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治安,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民族平等政策,对王公、千百户进行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许多封建领主分别被安排在各级政府任职,从而广泛地团结了各少数民族。

昂拉地处黄河南岸,与化隆县卡力岗地区仅有一河之隔,东接循化,南及同仁,西靠雪山,山高林密,居民约有一千余户五千余人,由千户项谦管辖。这里刚解放时,项谦和其他王公、千百户一样,接受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然而,1949年底项谦由于受反革命分子蛊惑宣传,开始首鼠两端,与人民政府假意周旋,离心离德。到1950年下半年,化隆反革命武装叛乱平息后,被击溃的叛匪头目马成贤、马全彪、谭呈祥及循化匪首宗吾加洛等人聚集在昂拉,项谦与他们沆瀣一气,妄想昂拉地区形成反革命割据,多次派匪徒进行烧、杀、抢、掠。但党和人民政府仍然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民族统战政策,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人力、财力,进行政治争取。1952年2月初,扎喜旺徐配合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组织桑热嘉措和古嘉赛去做说服工作。桑热嘉措和古嘉赛不顾生命危险奔赴昂拉,想以旧相知关系和佛教的诚心感化项谦觉悟,希望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然而,项谦等执迷不悟,先是不让他们进入腹地,并威逼他们赶快离开;后虽经过多次交

涉，与项谦见了面，并向这里的群众放映了特意带去的电影《中华民族大团结》和《翠岗红旗》，但项谦仍冥顽不化，对归顺政府毫无诚意。叛乱不靖，人民难以安居乐业。中央和西北局指示青海省委再做最后一次争取，以民族统战政策动其心，撼其志，以期达到和平解决的目的。省委省政府派出周仁山（省委统战部部长）、喜饶嘉措（省政府副主席）和扎喜旺徐等人组成劝解团，再次赴昂拉争取项谦归向人民。1952年4月初扎喜旺徐等人亲自赴龙潭虎穴，在马克塘与项谦进行面对面对谈判，当时说好双方只带15人，但项谦背弃诺言，带了二百多人，妄图软禁扎喜等人。鬼迷心窍的项谦，置人民代表的好言相劝于不顾，视多次劝解为人民政府软弱好欺，再次断然拒绝。

经过17次和平争取，项谦无动于衷，中共青海省委经报请党中央、西北局批准，于1952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昂拉叛匪进行军事围剿，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平息了这次叛乱。接着周仁山、扎喜旺徐等人再次带着医疗卫生、贸易方面的工作人员和大量物资前往昂拉对群众进行安抚，使昂拉地区在很短时间内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不久，项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心存愧疚地拜伏于人民政权之下。人民政府对项谦仍既往不咎，将其安置为尖扎县副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

值得记述的，还有果洛的和平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建立。当时扎喜旺徐和马万里受党的派遣，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组织、领导并参加了进军果洛，建立人民政权这一复杂而艰巨的斗争，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未打一仗，没放一枪，和平解放了祖国大西北的这块“雪域之州”。

果洛地处青海高原东南部，东

连甘肃，南接四川，面积为七万五千平方公里，果洛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过政权，一直实行政教合一的部落制度，所有权力都掌握在头人和牧主手中，直到解放前夕，还处在封建割据状态下，并保留着某些奴隶制的残余。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马麒、马步芳父子连续不断对果洛实行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其中大规模镇压有7次，给果洛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50年在全国政治形势的影响下，果洛康赛部落头人康万庆先生通过甘肃省黄正清引荐，先后在甘肃夏河和四川阿坝与我党有关部门接触，表示欢迎共产党解放果洛。接着，果洛另一个头人然洛（康万庆的女婿），于1951年秋派尕日万、尔金索南父子代表三果洛上层人士到西宁，请求我党解放果洛。当年冬，扎喜带领尕日万父子进京，受到朱总司令、邓小平副总理、李维汉部长的亲切接见。中央领导同志随即召见扎喜旺徐和天宝同志，征求他们对解放果洛的意见。1951年12月间，党中央、政务院电召西北局、西南局和青海、四川两省的有关同志和扎喜进京，会商解放果洛及其隶属等问题。12月31日，还受到毛主席接见。毛主席来到扎喜面前，忆起在延安的情景，称赞他们这批党培养起来的藏族干部，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嘱咐扎喜说：“你是藏族，又是老同志，果洛工作团团这副担子可是不轻哟！”

1952年2月，中共果洛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政委员会果洛工作团正式成立，马万里任工作委员会委员，扎喜任工作团团长。

经过充分准备，同年8月24日果洛首届民族联谊会在查郎寺召开。出席会议的民族、宗教代表人物271人，场面相当热烈。马万里

和扎喜旺徐分别作了“关于加强民族团结”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报告。阐明了党的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和保护现有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的政策，揭露了马步芳压迫果洛人民、制造民族分裂、渔利自肥的罪恶，号召果洛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走上幸福的道路而奋斗。

各界代表人物第一次坦诚相见，其中有些人，过去联盟不联心，有的武装械斗多年，见面就眼红，人畜伤亡不计其数，经过多次调解终于握手言欢。紧接着又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群众性团结大会，到会各阶层代表313人，主要任务是具体调解各部落之间的纠纷。

扎喜旺徐在解决果洛部落之间的重大纠纷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例如，康赛与康干、周吉雪化与上下莫坝、红科内部的纠纷等，解决起来颇费周折。在协商过程中，民族上层人士坚持按照历史的习惯来解决。例如，人命的价格，部落头人为200个元宝（每个元宝合70块银元），而穷苦百姓只20个元宝，相差达10倍，这是极不公平的。调解命案的费用也相当浩繁，有衙门钱、上门钱、认错钱、消恨钱、道歉钱、低头钱等，一般都在100个元宝左右，普通牧户一次解怨，就要倾家荡产。

扎喜旺徐成天斡旋，不辞劳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有时调解到深夜两三点钟，终于感动了各方代表，调解平息了38起较大的械斗纠纷。其中有九起重大纠纷曾死亡55人，伤残77人，损失畜牲数万头。经过调解，出现了“团结光荣，纠纷耻辱”的气氛，充分显示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

为了使果洛各阶层人士了解祖国的伟大可爱和解放后的变化，开阔眼界，1952年12月间，组织了“果洛藏族参观团”，由扎喜旺徐带

队，前往祖国各地参观。

至1953年3月，果洛藏族参观团满载而归，带来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带来新的思想观念。代表们喜形于色，欢欣雀跃，许多上层人士有了很大的转变。

工作团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在果洛站稳脚跟，打开局面，赢得人心，这个藏族红军战士出身的“工作团长”的作用是很大的。

经过一年多繁忙而紧张的准备工作，经与各方爱国人士充分酝酿协商，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有关规定，于1953年底召开了果洛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1954年1月1日，正式宣布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区成立。会议民主选举扎喜旺徐为自治区主席。新生的人民政权诞生了，红旗终于插上阿尼玛卿雪峰。

忠正耿直， 敢于向党直谏的勇士

扎喜旺徐在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他努力从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出发，不论任何时候，他既要维护党和国家的大局又要维护少数民族的切身利益。1956年9月19日，他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流散的哈萨克族完全安置好了》的专题发言。他说：“我是一个坚定的少数民族利益维护者，既然党把我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放到了一定的位置，我就要替少数民族说话，不当‘聋子的耳朵’，不当‘摆设’。”扎喜旺徐是这样说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在建立和发展“谁也离不开谁”的新型的民族关系，推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实行牧业区民主改革，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等重大实践中，

扎喜旺徐都敢说真话、实话，敢提不同意见。正因为这样，在1957年的青岛民族工作座谈会上，周恩来总理表扬“扎喜旺徐同志是一个向我们党说实话的同志”，1963年北戴河工作会议上，李维汉部长肯定扎喜同志是“忠正耿直，敢于向党直谏的勇士”，彭德怀、乌兰夫也非常喜欢扎喜旺徐的这种性格。扎喜旺徐在兼管全省的民族事务工作时，他曾向省委提出过许多解决民族纠纷问题的很好的建议，创造了“开团结会”、“吃和气饭”、“喝合心酒”等生动活泼的形式。从1949年初至1959年10月，在他主持或参与下共调解处理了民族之间、青川、青甘两省之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两千余起，从而疏通了民族关系，促进了团结。

在1958年到1960年期间，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青海省提出“两步并作一步走”、“一步登天”的口号，不顾客观条件，忽视地区特点和民族特点，在牧区大办人民公社，严重地挫伤了牧民积极性。扎喜旺徐挺身而出，反对“用棍子把人赶上天堂”。

1959年3月和6月，中共青海省委先后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和全省统战工作会议，扎喜旺徐对1958年青海省平叛斗争中出现的扩大化作法提出意见，他说：“在去年的平叛期间，大多数民族干部是坚定的，但有些同志看到个别民族干部思想认识模糊，就对民族干部有戒心，信任不够，尊重不够，培养不够，关系有些不正常。”他在1960年、1962年召开的西北民族工作会议和全国民族工作会议上，又用大量事实，指出民族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失误，受到李维汉等同志的肯定。

“文化大革命”中扎喜旺徐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遭到严厉批判，扣上了“执行民族主义路线”

的帽子，并先后下放到吉林、湖北沙市劳动改造，但他对党还是充满了信念。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扎喜旺徐调回北京任国家民政政法司司长。1979年根据中央的精神和中共青海省委的要求，扎喜旺徐又回青海任青海省委副书记。重新工作的扎喜旺徐焕发了青春，在民族工作中拨乱反正，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

1979年2月，扎喜旺徐抱着“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决心，带着许多资料，来到北京上书邓小平，据理力陈1958年青海平叛斗争中扩大化的问题。5月份，他带回了中央同意彻底纠正1958年青海平叛斗争中扩大化错误的文件。6月27日，根据中央决定，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布宽大释放因1958年参加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全部在押人员，公安厅同时宣布，对刑满留场的参叛人员一律回原籍另行安置。解决了1958年平叛斗争扩大化遗留问题，为一大批人平反，纠正了冤假错案。扎喜还对牧区在“文革”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历次政治运动错戴的“地方民族分子”、“投降主义”帽子等历史遗留问题，在省委领导之下，实事求是地给予处理解决。这些作法，极大地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群众反映：“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

1979年8月，政协青海省第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扎喜旺徐为主席。1981年11月，省五届三次人代会议上，扎喜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4月，扎喜担任中共青海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在青海，无论是汉族同胞还是藏族同胞，都十分敬重扎喜旺徐同志。

（责任编辑 洛松）

毛泽东与京剧演员李和曾

● 冯彩章 李葆定

李和曾作梦也不曾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他结识了毛泽东，毛泽东特别爱看他的演出。从1949年初到1976年的20多年中，毛泽东不仅经常看他的戏，而且喜欢同他谈戏，还多次关怀他的工作、生活和身体情况。在毛泽东和李和曾的交往中，人们会发现，毛泽东对京剧高派艺术有着强烈的偏爱和独特的感受，对李和曾本人的感情又是那样真切与独钟。

第一次观看李和曾演出，毛泽东便赞不绝口。工作人员发现，从来没有看到主席对一种艺术像这样情绪激荡、喜形于色

那是1949年3月上旬，华北大地春寒料峭。在太行山深处的平山县西柏坡，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解放以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从石家庄通往西柏坡的土路上，一队牛车吱吱哑哑走了过来。一眼就可以看出，车上拉的是一个戏班子。连续几天的行程，演员们显然已不耐烦总坐在慢腾腾的牛车上，纷纷下车步行，以便活动一下困倦的身体。

这个剧团就是由原延安平剧院与冀南军区京剧团合并组成的华北

京剧团。他们是由华北军区政委薄一波派往西柏坡，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行慰问演出的。剧团团长是1945年八路军解放山东临清时参加革命的李和曾。

演出的场地是1947年刘少奇和朱德率中央工委到这里后修建起来的大礼堂，可以容纳七八百人。舞台虽然不大，但有电灯，这对于长期生活在西北农村的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来说，已是相当不错了。演出安排了四场，会议代表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两场，西柏坡及附近群众两场。

事先，工作人员对毛泽东主席看不看演出是颇为担心的。他们希望主席去看，但又担心他工作忙，抽不出时间来。卫士长在毛泽东散步时向他提起看戏的事时，毛泽东平静地回答说：

“好吧，到时候咱们都去吧。”

尽管临到看戏那一天，开晚饭的时间已过了很久，毛泽东还在工作，而且恰在这时，机要处又送来电报，但他还是在工作人员的催说下走进了剧场。

第一出戏是《宋江杀楼》，李和曾扮演宋江。李和曾表演很成功，赢得了观众一阵阵掌声。

毛泽东看起来也很兴奋。

“唱得不错。我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种高派须生唱戏呢。”他自语道。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也说道：“唱得好啊！”

毛泽东接着说：“这个人唱得好，这出戏点得不够好，只是逗笑的戏，政治内容虽说也不错，就是没有表现出主角的唱功来。唱哪出戏，最好让主角自报。他认为哪出戏唱得最好，就叫他演哪出戏才好。”

在阿甲主演完《王佐断臂》之后，由李和曾主演了《失空斩》。

毛泽东对这出戏是非常熟悉的，还喜欢唱《空城计》中诸葛亮的唱段，这次看李和曾表演，越看越带劲，不停地鼓掌。他一边看一边对身边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说道：“唱得好啊！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就有这样高超的艺术才能，真是前途无量，大可称赞呀。象这样的艺术人才，应多培养一些。”

接着，毛泽东又情不自禁地谈起了自己的感受：“他这是高派唱腔。高派唱腔的最大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热情奔放。看了这出戏，给人一种刚强奋力的感觉。李和曾唱得好，他的基本功扎实，表演潇洒，看得出来他是科班出身。”

说起李和曾的身世，周恩来简要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经历和这个剧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听后说：“那好啊，我们今天在这里看他们演出，演得不错；我们进北平以后

再看他们的演出，那时候他们演得一定会更好。”

周恩来问毛泽东：“主席，明天晚上想让他们演出什么戏？”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答道：“明天晚上我来看戏，演什么戏由他们自己定，他们认为什么戏演得好，就演什么戏。”

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的兴致丝毫未减。回去的路上，他高兴地对警卫人员说：“你们说说，今天的戏演得怎么样？”

卫士长阎长林说：“演得不错。扮演诸葛亮的李和曾演得最好。特别是他的唱腔，那样洪亮、宽厚，听起来真带劲儿。我还没有听过这样好的须生戏呢。”

毛泽东对这个回答点头称对。接着他又侃侃而谈：“这就叫高派唱腔。戏剧界有流派，他这种唱腔是属高庆奎那一派。我是很喜欢听高派戏的，越听越爱听。明天咱们还来看戏，明天早点来，还是走路来。”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准时到达剧场。

这天晚上，李和曾在第三出戏《哭秦庭》中出场。由于李和曾昨天的出色表演，所以他一出场，观众便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由于周恩来在第一天演出结束后，走上舞台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并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向他们祝贺并致谢，还特别提到毛泽东主席对李和曾的高度评价，给剧团带来很大鼓舞。而且，《哭秦庭》是高派的杰作，由高派创始人高庆奎先生最先演出，唱做并重，最能充分表现高派艺术风格。李和曾在演出中全力以赴，调动高派激越挺拔、酣畅质朴的演唱风格，将楚大夫申包胥不忍国土沦丧、百姓涂炭、只身赴秦、乞求出兵救楚，在秦庭一连七天七夜不食不寝、号恸哭诉，终于感动秦王发兵讨吴，表现得淋漓尽致。整个剧场群情激奋，掌声阵阵、唏嘘声声。演出结束后，全场又是一阵经



李和曾在
《赤壁之战》中
扮演张昭

久不息的鼓掌。

毛泽东笑容满面，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一齐站起来热烈鼓掌，并一再向谢幕的演员招手致意。

在回去的路上，毛泽东又一次同大家讨论起京剧来，他兴致勃勃地说：“李和曾真不愧为高庆奎的亲传弟子。他唱、念、做、打、舞，样样精到，文武功夫都很扎实，难得！”毛泽东还如数家珍似地逐一点出了京剧的众多流派和他们的创始人。

有的同志说：他只知道梅兰芳、马连良，不知道京剧还分那么多的派。

毛泽东说：“戏剧界的流派，都有他们自己的独到之处。越是自成一派的，越是注意总结经验，提高艺术水平。各种流派，他们都培养自己的艺术家。你们对戏的流派不熟悉，也是自然的，因为你们过去生活在农村，看不到他们的戏呀。就是在大城市里，一般的市民也很少能

看到他们的戏。戏票太贵，穷人是看不起的！”

跟随毛泽东多年的工作人员发现，从来没有看到毛主席对一种艺术像这次对李和曾表演的京剧高派艺术这样情绪激荡、喜形于色、念念不忘。

毛泽东这样偏爱李和曾的高派艺术，是一时的兴致所至呢，还是包含着其个人气质、情绪方面的底蕴？以后的事实也许能够回答。

毛泽东说戏，流露了他在对历史和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像他在西柏坡所说的那样，仍迷恋京剧高派艺术，经常看李和曾演出。“文革”以前的十多年中，李和曾还经常参加中南海的周末活动，表演清唱。其中有好几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

特意安排李和曾先表演。他们说：主席还有工作，听了您的清唱就走。有一次，毛泽东观看了中国戏剧学校学生演出的《逍遥津》，问是谁教的。当他得知不是李和曾教的时，说：“《逍遥津》是高派的戏，要让李和曾教这出戏。”

有趣的是，毛泽东有一次在观看李和曾演出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可以作为他偏爱高派艺术的一种解说。他说：“解放以后的演员应当高歌，黄钟大吕，不要阴沉沉的。高派的唱法是好的。所有的流派，包括高派，都是好的，都要继承，又要发展。”

《李陵碑》是一出杨家将戏。一次，毛泽东在观看了李和曾演出的这出戏后对他说：“杨老令公八个儿子死了四个，发发牢骚是可以的，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忠心报国、坚贞不屈的将领，所以不宜唱得太悲。你现在唱得有悲有愤，是对的，应该这么唱。”

还有一次，毛泽东在同李和曾说戏中提到《李陵碑》中一句唱词。他说：“你唱的《李陵碑》里有一句唱词是‘方良臣与潘洪又生机巧’，我查了资料，没有查到方良臣这个人，是不是改成‘麴麴臣贼’潘洪又生机巧？”

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唱古装戏要多看历史书，对历史事实，对古代人的行为举止和语言，都应当很好研究。”

吴蜀彝陵之战，发生于公元222年。毛泽东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把它与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一起列为作战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的中国古代有名的大战。

毛泽东熟悉三国时期的历史，在写文章和讲话中喜欢用三国的典故，对京剧《彝陵之战》很喜欢。有一次，他在同李和曾说戏中，不无感

慨地说：“现在四平调还能听到，反西皮却很少听到喽！”

京剧表演艺术中，唱居于首位。京剧的唱不仅丰富优美，而且颇为讲究。除表现力很强的曲腔（音乐结构中的曲调形式）和变幻无穷的板式（控制曲腔的节奏和速度）外，众多名家根据他们自身的声音条件，通过不同的吐字发音以及运腔的方法，形成各个流派的演唱风格，从而使人们能够在欣赏京剧艺术中，品味到其中的不同韵味，获得更深层次的声乐美的享受和满足。

毛泽东提到的四平调，特别是反西皮，在复杂的京剧曲腔、板式中，属于演唱难度最高的一类，艺术造诣不深的演员是难以掌握的。毛泽东所说难以听到，其原因大概于此。

京剧传统戏《彝陵之战》的“哭灵牌”一场使用的是反西皮。李和曾在听到毛泽东的慨叹之后，赶排了这场戏。他仔细体味刘备接连失去关羽、张飞之后悲痛欲绝，誓死亲征东吴报仇雪恨的具体环境和特殊心境，围绕“舍恩义锦江山有何留恋”、“全恩义拼一个海沸山摇”这一情绪中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对唱腔作了一些改进和加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刘备由悲痛进入对死者的追思和缅怀，由追思、缅怀进入激愤、拼死这样一个起伏跌宕的感情发展过程。

毛泽东看了这场演出，对李和曾的表演十分满意。或许是对中国传统的忠义思想和蜀汉君臣英雄末路的喟叹，抑或是触发了自己某种尘封已久的亲自感受的记忆，毛泽东为这出戏深深感动了。他对李和曾说：“你唱得好。白盔白甲白旗号，烘托了全剧的气氛，如果能再加一点风吹旗动的舞台效果，气氛会更强烈。”

1963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夜。李和曾参加了中南海的周末活动。他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排演现

代京剧《千万不要忘记》饰演海宽的情况，并清唱了其中的一段唱词，毛泽东很高兴。

李和曾记得，这是他最后一次到中南海演出。

他关心李和曾，终生不渝喜欢高派艺术，在他病重和弥留之际的一个愿望便是看李和曾的演出

1950年初，在中南海的一次周末活动中，李和曾表演了《辕门斩子》杨延昭的一段清唱。毛泽东一边听，一边用手在腿上打着拍子，津津有味。演唱完毕，毛泽东带头鼓掌，并把李和曾叫到身边，亲切地问道：

“你参加党组织没有？”

“我1949年参加党组织，年限很短。”李和曾回答说。

毛泽东高兴地点点头。他鼓励李和曾：“好好学习，多为工农兵演出。”

这天晚上，毛泽东还特意请李和曾同他一起吃了夜宵。

在另一次会见中，毛泽东关切地问起李和曾有没有什么病。李和曾告诉他：

“我的身体还好，有点小毛病也不影响演出。有时累了，有点高血压，还有点肩周炎。”

毛泽东深情地嘱咐他：“有高血压，要注意适当休息，不要老查表，有负担。可以找找中医，吃点中药慢慢会好的。肩周炎可以贴膏药，贴膏药的效果比吃药更好一些。”后来，毛泽东还向李和曾介绍了一个治疗高血压的中药药方。

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艺术家，不仅在艺术表演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赏和热情鼓励，而且一再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厚爱，这怎能不使李和曾激动和感到幸福呢？50

年代初,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中,李和曾演完一出《二进宫》,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告诉他:“你知道吗?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李和曾一愣,他哪里知道毛主席的寿辰,又何从问起呢?从此以后,每年的12月26日,他都要在家里的毛主席像前三鞠躬,而且还虔诚地让自己的子女给毛主席像磕头拜寿。

进北京后,毛泽东身边保存有不少京剧唱片,其中有不少是李和曾灌的唱片。不论居家还是外出,只要有空隙时间,毛泽东总爱听听京剧唱片。

毛泽东喜爱京剧,爱听也爱唱。他有时甚至要自己身边的年轻卫士跟着自己学唱京剧。久而久之,这些小战士们也都能唱几段。《逍遥津》中汉献帝的唱段是毛主席最喜欢唱的,战士们自然也很熟悉。有一个山西籍的战士在说出戏时带有浓重的山西口音,毛泽东喊着他的名字逗他说:“唱一段‘小妖精’!”引得大家欢笑不已。

“文革”开始后,李和曾成了批判对象,再不能登台演出,更不能进中南海给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表演了。

“文革”期间,中国的文艺界几乎成了一片荒漠。60年代,戏剧界执行的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同时并举方针的局面,被八个样板戏独霸舞台所替代。

直到“文革”末期,毛泽东指出,传统戏、新编历史剧还是要演;并提出,他很想看到李和曾的演出。

毛泽东的这一态度,无疑是给“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当头一棒。他们不仅秘而不宣,而且对重病中的毛泽东的愿望也置之不理。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后,向江青提起这件事,江青不敢否定。于是,有关部门便开始组织拍摄李和曾演出的传统戏。第一次在北京录的电视剧目有《斩黄袍》、《辕门斩子》等。大概是由于毛泽东视力不好,看电视困难,有关部门又组织李和曾等人到上海拍电影片。先拍《碰碑》一出。刚一拍摄完就立即送往北京。重病

中的毛泽东看了这部影片,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现,毛泽东在看影片时落了泪,口里喃喃地说着什么。

李和曾在上海拍完《碰碑》,接着拍《逍遥津》。刚刚结束拍片,就传来了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李和曾极为震惊和悲痛。他向领导急切地提出,他必须马上回北京。他怀着巨大的悲痛向领导请求:“我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没有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毛主席对我恩深义重,我一定要赶回北京参加他老人家的追悼会,最后见他老人家一面!”

领导满足了李和曾的要求。李和曾坐飞机赶回了北京。

.....

多少年来,李和曾常常这样想,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他没有能够完全满足晚年的毛主席的愿望。每每谈起毛主席对他的关心和爱护,他总是泪流满腮,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责任编辑 舒 蓝)

诗六首

强晓初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伟人相继去世,他们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始终萦绕在我的心中。特整理几首旧作,以表对他们的怀念。

沉痛哀悼毛主席

(一)

日月情伤天地晦,丹心欲裂泪双垂。
京都肃穆江河咽,霄汉寂然寰宇悲。
教导谆谆怀肺腑,雄文卷卷放光辉。
铭心镂骨承遗志,高举战旗势不移。

(二)

百年国耻今朝雪,一统中华绝代功。
不朽思想齐北斗,长存浩气壮东风。

哭周总理

(一)

长征陕北正初冬,黄土高原遍有踪。

安塞谭营聆教导,西京事变树勋功。
从文运武创宏业,伏虎降龙战恶风。
为国劬劳筹国策,外交内政掌心中。

(二)

坚持马列一生终,盛德伟功史册中。
敬颂人民好总理,经纶大度有谁同?

痛悼朱总司令

(一)

总理长辞泪有痕,晴天霹雳又忡忡。
三军痛悼总司令,八亿缅怀开国雄。
征战沙场贼胆破,劳勋枢要众讴功。
黑纱白素寄方寸,山水萧萧浴日红。

(二)

戎马终生百战功,指挥雷动树军风。
精神永在勉侪辈,耿耿丹心日月同。

1996年四五月间,我随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文艺家访问团赴台访问,受到台湾作家、诗人们的热情接待,同时也使我亲身感到他们的中国心之重,乡土情之深。在一次由台湾资格最老的文艺协会主办的欢迎座谈会上,我作了一个简短的以文学交流和亲情交流为主题的发言,并朗诵所作诗一首,原诗是:

春暖花开日,来到咱宝岛。
千言万语意,先问一声好。
先问一声好,热泪忽盈眶。
回忆春帆楼,两岸同心伤。
两岸同心伤,国仇深如海。
宝岛为日据,悠悠五十载。
悠悠五十载,光复岂容易!
无奈又分裂,将近半世纪。
将近半世纪,亲友隔云天。
泪眼遥相望,盈盈一水间。
盈盈一水间,半生不了情。
抽刀难断水,血总比水浓。
血总比水浓,点滴在心中。
劫波终有尽,兄弟喜相逢。
兄弟喜相逢,我已逾古稀。
乘风跨海来,春暖花开日。
春暖花开日,来到咱宝岛。
千言万语意,再问一声好!

我本不会作诗,诗的艺术性肯定不高,但想不到的是,现场反应非常热烈,著名老诗人墨人(张万熙)立刻离座过来和我握手致意,另一位著名诗人文晓村后来发言时说,听王教授的发言和诗,本想接着就说几句,但不能,因为已经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许多台湾作家诗人的浓厚的乡土情、沉重的中国心,于此可见。

我这次访台,《联合报》为我个人发的文坛消息中,误我为河南人。其实我是山东人,因此会见的鲁籍作家诗人就更多一些。他们少小离家,现在多半鬓毛已衰,但乡音不改,比我的山东腔更加地道。著名诗人张腾蛟先生邀我餐叙。腾蛟是山东老乡,笔名鲁蛟,说明了他对故土的魂牵梦绕。著名小说家朱西宁

台湾作家的乡土情中国心

● 王景山

先生也是山东人,他和他的太太刘慕沙,三个女儿天文、天心、天衣,一家五口都是作家,出版作品合计起来已近百种。他们邀我在一家咖啡店茶叙,除天衣居家外地未回,全家到齐。我和他们都是初次见面,但你言我语,谈文学,谈故乡,谈家常,完全像亲人团聚,故友重逢,毫无陌生之感。那天在座的还有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的总编初安民先生,又是一位山东人,听说我对他们出版的一些书颇有兴趣,立即打电话要来十本持赠,真是“美不美,故乡水;亲不亲,故乡人”呀!

这次邀请我们往访的是台湾“中国作家艺术家联盟”和“强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而协助会长尹雪曼和董事长王强华负责接待我们的王书川、刘鉴二位先生却又都是山东人。书川先生长我四岁,随军去台时方31岁,38年过去,始克返乡探亲,已经六十有九了。我翻读他持赠的《缘与愿》一书,细读书中《归乡》一篇,读到文末的“往日,翎翎残折,‘北雁南飞’,如今白发如雪,梦魂中竟是‘南雁北飞’!一只疲倦的劳雁北飞,一只苍老的劳雁北飞!北飞才是故乡,北飞才是神魂相系的故乡!”这几句的时候,我感动不已,我这位老乡的乡心之切、乡情之深,真是溢于言表了。

台湾的资深女作家刘枋和我是山东济宁小同乡,在“我非故都人,却居故都久”这一点上和我相同。我在《北京晚报》副刊上发表过十几篇有关台湾作家北京缘的短文,其中有一篇就是写我这位乡姊的。1993年我们在北京见面,她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诗云:“寄居宝岛四十年,时将泪眼望家园;同乡同里人难遇,何幸竟逢王景山!”当她谈到“台独”为害时更是痛心疾首。我记得在台湾“文协”会上,司马中原等几位谈到不能容忍“台独”时也都是义愤填膺、慷慨激昂的。有一位作家在给我的信中还说:“若台湾一些政



和台湾著名小说家朱西宁（左四）及其女天文、天心茶叙时合影

客果真闹台独闹得不像话，也只有与内子徙居南京终老了。”

在“台湾作家北京缘”这组文章里，我还写到了台湾新文学第一代作家张我军的“乱都之恋”；写到了夏元瑜、唐鲁孙两位老作家的“京味儿”文学，夏曾十分自豪地声称：“我的稿子要用北京话来念才对劲儿……我们北京长大的人就是爱这个调调儿”；写到了我们熟知的原籍台湾却“比北京人还北京”的林海音，在她的小说《城南旧事》里，那种浓厚的京腔京调，浓重的乡情乡愁，真是挥洒得淋漓尽致；写到了前北京辅仁大学校友张秀亚、公孙嫒，他们怀念着恭王府改建的辅大校舍，校舍里的几杆瘦竹、一株海棠，什刹海的碧波，鼓楼、地安门一带入冬时有骆驼队走过，身在台湾的公孙嫒曾说：“虽说这里四季常青，但我还是怀念北平那种四季分明的日子”；写到了也是辅仁大学校友的侯格生生前始终难忘的通县十年，她居住过的靳家胡同，她就读过的旧址为清代河台衙门的通县女子师范学校，以及每晚八点鼓楼上的钟声，每年一次的城隍出巡；写到了“生于北平，长于北平，受教育于北平”的原籍广东的陈香梅，她定居美国数十年，环游世界各地，却仍然觉得“在北海划船就比在密西西比河游历有

趣，逛东安市场就比到纽约第五街买东西有味，到西山或北戴河避暑比到瑞士滑冰还够诗意”，而“欣赏围炉吃烤羊肉那股味儿比在法国丽都饮香槟、看大腿舞更美”；写到了曾在北京河北高中就读而原籍山东的马森教授，虽曾在欧、美许多大学任教，却也同样诉说着对北京的怀念，“印象中故宫的辉煌，北海的清雅，甚至到了秋天，北京四合院中一方蔚蓝的青天，都是以后见过的巴黎和伦敦壮丽风貌不能取代的”；写到了李敖一直保存着北京东城新鲜胡同小学的毕业证书，一直怀念着

教过他的小学老师们。啊，这不但是洋溢着一片片乡土情，也是跳动着一颗颗中国心呀！

我这次访台，在随团活动十日后又单独延期一周。前后十余天中会见诗人特多。余光中、痖弦、向明、张默、涂静怡、陈义芝、简政珍诸位都曾约我餐叙。我不能不想起余光中的诗集《中国结》和诗集中的《我之固体化》、《当我死时》、《乡愁四韵》等诗，以及《乡愁》诗中“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的句子；不能不想起向明的诗《还乡的短章》中“铜墙般的壁垒呵终不敌亲情的柔指/轻轻一推/就踉跄地闪了过去”的句子；不能不想起张默写赠一位韩国女诗人的《苍茫的影像》中“要不是太平洋的波涛/要不是鸭绿江的易色/我们会在洞庭湖畔/以道地的无为话念您的诗/今天/我们把您送的手帕拧了又拧/泉涌的泪水好重啊/故乡，你的根须伸向何处/请轻轻染织我苍茫的影像”的句子……

啊，去台湾我是以文会友，却会见了那么浓的乡土情，那么深的中国心！

（责任编辑 洛松）



台湾鲁籍资深女作家刘枋（左三）邀宴后合影。右二为本文作者

江青 诡踪 查武训

● 傅哲清 傅 军

一个化名李进的女人

1951年6月的一天，中共聊城地委办公室接到上级领导机关打来的一个长途电话，说有《人民日报》社、文化部的若干同志，去聊城考察关于武训的问题，其中有位女同志……电话上不便谈，来人带有刘澜涛同志一封信，希望你们做好保密和保卫工作，要保证不出问题。

口气相当严肃。来的是谁？又是由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刘澜涛亲自写信介绍，肯定来头不小。

当时，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已经展开，聊城是武训的故乡，作为当地一级党委，当然不能置若罔闻。虽也组织人深入武训家乡进行了一些调查，但总认为这是文艺界和教育界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建国之初，百废待举，党委要抓中心，确无过多精力顾及此事。现在，上头竟然直接派人来，非同寻常，不得不认真对待。

考察团到了聊城，成员有《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钟惦棐、李进，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中共平原省委宣传

部的宇光、杨敬仁，平原省文联的王燕飞，《平原日报》社的陈蕴山，全是宣传文化界的人士，其中果然有个女的，她白皙的面皮上戴副眼镜，眼光在镜片后面一闪一闪的。

“她究竟是谁？”

考察团介绍这位女同志叫李进。

若在60年代，毛泽东“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诗已经发表，李进的真实身份业已传开之后，就用不着如此神秘兮兮的，然而那是在建国之初的1951年，李进的名字其奥莫名。

刘澜涛的信，内容很简单，除要各级党委协助做好考察外，郑重写明李进就是江青。

原来如此！江青这时虽然仅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但她的特殊身份，不由人不肃然视之。

中共聊城地委与考察团经过一番研究，确定了考察团所要到的考察地点。为便于联系活动和做好当地有关各方的工作，又确定由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部长）、段俊卿（中共堂邑县委书记）、赵安邦（堂邑县县长）、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部长）、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部长）为考察团组成人员。

兴风作浪初露“峥嵘”

武训，山东省堂邑县柳林镇武家庄（今属冠县）人，生前无名，因行七，人称武七；武训愁头愁脑，人说他胡涂的像豆沫一样，又送浑号“武豆沫”。武训之名，是他死后，堂邑绅士张敬承在撰写诔文时，嫌“武七”二字不“雅驯”，取“其人其事，足以垂训于世”之意，改称“武君训”，由此沿用下来的。

武训自幼贫苦，因不识字，屡受人欺，遂起兴学意念。从21岁起，行乞募化，积三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至59岁时，终于在堂邑县柳林、馆陶县杨二庄（今属山东临清）、临清县御史巷办起了三处义塾。

早在抗战期间，即有人思谋将武训搬上银幕，因种种原因直到1950年底，方拍摄完成，编导孙瑜曾带着这部影片的拷贝进京，请周恩来

总理审阅。

孙瑜给周恩来的信说：

总理先生阁下：

一九四九年文代大会，七月二十六日在北京饭店全国影协成立大会聚餐会上，曾经把我筹备摄制的《武训传》电影题材，向先生请教，承先生指导：（一）站稳阶级立场；（二）武训成名后，统治阶级即加以笼络利用；（三）武训最后对兴学的怀疑。这些，我都在影片里写到了。

《武训传》现运京上映。沈雁冰部长、袁牧之局长均已看过。先生爱护文艺，能否于日理万机的余暇，赐以三小时的审映。

本月二十六日前的任何晚间，均有影片拷贝可供放映，请示知电影管理局或中影华北管理处即可。专肃。特致

敬礼！

孙瑜谨启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总理收到孙瑜来信的当晚，就同朱德委员长、国家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还有中央机关的一百多位领导人在中南海看了《武训传》。反映良好，获得不少掌声。朱德大加赞赏，说“很有教育意义”。

中南海审映顺利通过，孙瑜不胜欣喜。

2月25日《武训传》在北京公映，电影界给以高度评价，在教育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有位教师说：“虽然武训的斗争方法与道路不是我们所要学习的，但他那种坚韧不拔的性格，将指引我更踏实、更细致、更专一地为孩子们工作。”

《武训传》被《大众电影》评为1950年十部最佳国产片之一。

然而，正值《武训传》受到一片赞扬的时候，江青却众人皆醉她独醒，发难说此片有“严重问题”。

江青此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还在电影指导委员会挂一名委员，这在中央机关，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儿，但她是毛泽东的妻子。她利用人们对她的逊谦，自以为是，说三道四，用批判一切、否定一切来显示自己最高明、最革命。

她先是把矛头首先指向《清宫秘史》，说这

部影片“内容反动”，是一部“卖国主义的片子”。接着，又提出批判《武训传》的问题。

在她的屡屡建议下，毛泽东调阅了电影《武训传》，终于发表了意见，说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有了毛泽东这一“尚方宝剑”，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文章，从1951年4月下旬开始，相继发出：

4月25日，《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

5月10日，《文艺报》又发表《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

5月15、16日两天，《人民日报》连续转载《文艺报》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大家对这部影片进行深入讨论。

一场新的斗争逐步展开，又以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而达到了高潮。



著名画家任必瑞为武训画像

这篇社论,措辞严厉,说“《武训传》所提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连续发出责问说:

“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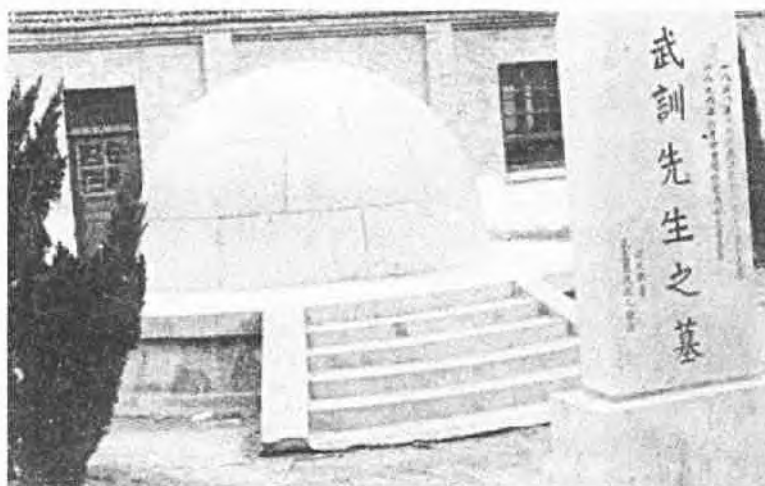
“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

责问之后,继以更加严厉的批判:



老舍夫人、著名画家胡絮青题联赞武训

山东冠县柳林武训墓



“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认为正当宣传。”

在列举从当年2月20日到3月29日在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武训的文章和近期出版的书目后接着说: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混乱达到了何种程度!”“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这篇文章,当时虽不知何人所写,但知道它是有重要背景和大有来头的。

形势急转直下,各级党组织纷纷发出通知,要共产党员参加对《武训传》的讨论,借以提高认识,肃清不良影响。《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发表评论,要“歌颂过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一律要作严肃的公开的自我批评,而担任文艺、教育、宣传工作的党员干部,特别是与武训、《武训传》及其评论有关的……干部,还要作出适当的结论。”

批判电影《武训传》,形成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政治运动。

电影《武训传》的作者孙瑜和主演赵丹必然成了重点批判对象,郭沫若、周扬、夏衍等一些

名人都被牵涉进去,不得不纷纷发表文章检讨,就连周恩来总理也检讨自己有一部分责任。

局面已经轰开,各路武训歌颂者纷纷就范,江青得意洋洋,乘势组织起武训考察团,来到了武训家乡聊城。

被访问人的疑惑

武训考察团,分成几个小组,到堂邑、柳林、武庄、临清、馆陶等地作考察,江青带着中心组坐镇堂邑。

堂邑县的县长叫赵安邦,赵安邦家住柳林东南赵家庄,离武训的家只有几公里,是武训的乡亲,从小就听关于武训的故事,在他的脑海里,武训为了兴义学,受苦一辈子,是个大好人。赵安邦虽然也被列名武训考察团,但是一谈到武训,他就冲口而出:“对武训这个人,可不能乱批评……”

县委书记段俊卿,连忙打断他的话,悄悄告诉他,北京来的那位叫李进的是江青,要他千万别乱说话。

听说上头既然已经定了调子,赵安邦便再也不说关于武训的好话了。

江青在堂邑,把城里乡下许多见过或知道武训的人接了来,连续开了几个调查会,而后又到柳林、临清走了一转,也开了调查会,还到有些了解武训的老年人家中走了走。

临清有个在清朝当过“藤甲兵”的人,名叫李汉邦,七十多岁了,独个儿居住,当考察团到他家时,他正看《三国演义》,一听说调查武训,张口就说:“武训一生吃苦耐劳,攒钱为穷孩子办义学,我见过他,也知道他一些事……”他喜眉笑颜,谈了多半晌。

晚上,村干部对他说:“武训挨批了,说话留神点。”第二天,考察团再去作调查时,他说:“我耳朵聋,听不清您说的啥。”就什么也不说了。

以后,人们就顺着江青的话音咋问咋答。

经过20多天的鏖战,江青认为所需要的材料已经到手,满意而归,聊城地委宣传部长司洛路也相随去了北京。

三顶帽子的来历

江青到北京后,回头翻检,材料不少,但要给武训戴上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的帽子,定案定性,证据不足,于是又把司洛路派回聊城进一步搜集材料。

武训一辈子没结婚,父母早亡。既然定他大地主、大债主,就要有地有钱,他的地在哪里?钱在哪里?他的私人财产究竟有多少?他又有哪些剥削行为?司洛路带着这些问题又来到了武训的家乡武庄。

时隔数十年,与武训同代的知情人多已亡故,最后找到武训二哥武谦的曾孙武金兴。武金兴拿出两本地亩帐,上面写的是“义学正”,帐中记着买地的时间、亩数、地价、座落等等,一笔一笔,具体详细。司洛路一见,如获至宝,赶紧说:“我把这两本帐借一段时间,以后再还给你。”于是带着这两本帐上了北京。

江青得到这两本土地帐,喜出望外,连声说道:“够了,定他大地主足够了。”

其实,武训经过几十年行乞募化,购置的三百多亩地,其中用作柳林崇贤义学田地230亩,捐赠杨二庄义塾40亩,加上临清御史巷用地,武训的田地已全部属于义塾,除地亩账归他保管外,武训既不耕种,又不收租,甚至连义塾的一口饭也不吃。

武训确实放过债,但目的是以本求利。利息有多有少,借主也有商有农,有贫有富。他究竟积攒了多少钱,一个材料说一万七千余吊钱,一个说光临清就有二千两银子。江青写《武训调查记》时也没搞清楚。不拘多少,武训全部花费在了义塾买地、盖房和办学开支上,而且交给义学的钱,他从不动用。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夏天,他病倒在临清,连买药治病的钱也舍不得花,这天下大雨,冲塌了一家小药铺的屋墙,药铺发了霉的药丸子滚到街上,他拾来吃了,中毒而死。临死,还一再嘱咐人们不要花钱为他买棺材,要省下钱来办义学。

武训在交由义塾管理的财产之外,还有没有私产?江青曾煞费苦心搜寻,但始终未找到线索,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不得不含混其词

地说：

“武训很可能还有一部份未交学校的私产……”

“武训在光绪十四年前所积的财产是否全部捐给柳林学校，也是可疑的。很可能有一部份未交出，……不过我们未找着确实的证据。”

“武训究竟有多少财产？由于我们现在得到的材料还很不充分，这个问题不能确定地回答。”

即使如此，江青还是依据这些，定武训为大地主、大债主。

江青还给武训扣上了一顶大流氓的帽子。关于这项帽子的来历，司洛路回忆当时情况时说：“在临清西关进行调查时，有人嘻嘻哈哈说，听说临清有个三十多岁的寡妇，武训认她做干娘，还吃过她的奶。还说柳林也有个妇女同他有来往。当时很多人都是当笑话说的，是否确实，并无证据。”赵国璧也谈到武训曾认一个小寡妇为干娘，小寡妇生了孩子人们叫他“小豆沫”的事，但赵国璧说：“这纯是些流言蜚语。至于武训在地上打滚、学爬、出洋相等，那都是为了讨钱，根本算不上什么流氓行为。”

然而，“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这三顶帽子，不仅使武训痛遭批判，被掘坟抛骨，而且压了不少活人。

武训也讨回了公道

“文革”以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深入

批判，要求为建国初期因电影《武训传》受牵连的人平反、为武训平反的呼声愈来愈高，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1985年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武训这个人物应该如何评价，这是一个历史学的问题，需不抱任何成见加以重新研究。”又说：“解放初期，也就是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个批判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我们现在不对武训本人和这个电影进行全面评价，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明，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

当年武训办的义塾，历经沧桑，已发展成为现代的学校，成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基地；义塾的性质，学生的学习内容，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人们仍然记着武训办学的功德，钦敬武训办学的精神。他们说，社会已发展到今天，武训行乞兴学的具体行动，已不能重复，但他为兴学而不畏艰苦，不怕困难，不顾个人一切，不达目的誓不休，为办学贡献一生的精神，仍是值得学习和发扬的。对武训不能一概否定，应当汰其不可训而训其可训。

著名诗人臧克家有诗曰：

破钵百衲度春秋，心铁情痴为众谋。

今古完人完多少？何于一丐作苛求。

对一个身无分文、只字不识的乞丐，还能苛求他些什么？（责任编辑 刘文）

启功家的『兽类会』

● 朱继功

启功先生博雅、精深、有趣。张中行先生说：他善书能画，精于鉴定之外，『他肚子还有大批存货，因为受『能者多劳』之累，即使想掏也掏不出来。』如果有什

么光的探测器，对准他的肚皮（从旧而俗之习，不说心，更不说大脑），卡喀一响，我想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

启功先生曾住鼓楼东里芝麻胡同，张中行先生住鼓楼西，一街之隔，晚上常在启功先生的『三堂』见面叙谈。那时必到的有曹君家琪，因面长，启功先生呼之为驴；有马先生焕然，启功先生小学同学，也是寡言，可是屁股沉，入室即上床，坐靠内一角，不到近三更不走；有熊君尧，寄生虫学家。所以启功有一次对张中行说：『到我这儿来的都是兽类，有驴，有马，有熊，有獐（其内牙章五），您可不在内。』

冰心子女 谈 冰心家教

● 满素洁

吴平说：“我是冰心的儿子， 但我更是社会的儿子”

吴平是冰心老人的儿子，今年65岁。但他声音洪亮，走路生风，神采飞扬，除了头发略有花白之外，显不出一点年老的迹象。

吴平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而和平时代他又曾被打成“右派”。历史使吴平与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聆听母亲的教诲更是少于两个妹妹。掐指算来，65年中，他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不过10年，即7岁以前的那段时间以及在日本读高中的3年。因此，吴平更多的是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受到陶冶。他感慨地说：“我是冰心的儿子，但我更是社会的儿子。”

吴平原名吴宗生，宗字是母亲谢家的排行。父亲家是中农，没有家谱。生字是外婆给取的，那时外婆已虚弱得不成样子，取生字是留恋生命、留恋生活的意思。周总理把冰心全家从国外接回来后，建议他们改名字。吴宗生想到自己出生在北平，便改成了“吴平”这个名字。



1996年8月，吴青与母亲在北京医院

吴平不愿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身世，更不愿向他人提及自己的母亲是冰心，也不希望自己的家人这样做，因为他认为母亲的成就是属于她自己的，他不喜欢依靠母亲的名气来成就自己的事业。因此，知道吴平就是冰心老人的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的人并不多。

吴平说自己出生于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父母亲都有国外求学的经历，早年又到过许多国家，所以他们的民主气氛较浓。对于自己的择业、交友和爱好，母亲都不加阻拦，也不以自己的意志去干预孩子的选择。吴平也就成了家里唯一一个爱好音乐和摄影的人，他的摄影作品在国内外都获过奖。

尽管吴平在成长过程中与母亲在一起时间不足以对他的人格、性格构成全方位的影响，但是，母亲身上的许多优秀品质还是遗传给了他。

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政治运动中，多少人堕落、多少人自杀、多少人一蹶不振，但吴平虽然倒下了却又爬了起来，站了起来，而且有了一个辉煌的现在。

吴平没有走上自暴自弃的道路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独自在外闯荡多年，使他深刻认识社会、人生的性

格使然；二是吴家在患难中血肉相连，相互打气、鼓劲的亲情使然。母亲冰心一再写信给他和同时被打成右派的父亲，告诉他们要“好好改造”。

冰心对自己一家所遭受的磨难看得很淡。她在一篇文章里说，连共和国的主席、元帅、将军都在这场政治浩劫中难以幸免，我们一介平民百姓挨斗挨批还有什么忍受不了的。冰心最推崇毛泽东的一句话：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所以，当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时，吴氏一家想的是人民，历史的主人，会对这一切做出公正的裁判。他们要活下去，为祖国、为人民而活下去。

吴平喜欢新闻、建筑和机械，他感谢父母没有阻拦他，使他最终选择了建筑，这个与父母所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专业。

吴平现在是北京市建筑装饰设计所所长、高级建筑师。他涉猎的范围很广，由民用建筑、工业建筑到室内装璜设计。可以说，吴平的设计风格在我国室内装饰设计方面走在前列。

吴平说，归纳起来，他的一生得益于母亲教诲他的六个字：诚实、无私、宽容。

冰心一贯主张诚实，不允许孩子撒谎，对自己子女要求更严，如果哪个说了谎话、假话，那么她就用肥皂水洗他们的嘴巴，让他们喝又苦又涩的奎宁水。喝奎宁水成了吴氏三兄妹儿时共同的经历。

1985年，中国社会学界德高望重的吴文藻先生驾鹤西去。父亲的去世使吴平的心油煎般地难受。然而，这位在社会漂泊闯荡多年的“异教徒”（吴平说自己是异教徒是因为在家里父母、两个妹妹都是教师，只有他不是），这位戏称早与家庭划清界线的“社会人”，却在这场家庭变故中发现他的心原来与母亲是那样的贴近。

他越发敬佩母亲了，因为饱尝丧夫之痛的母亲没有一味沉浸在悲伤的情怀里，而是拿起她那忧国忧民的如椽大笔，让她的生命真的从80岁开始。

吴平发现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与母亲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母亲极有耐心和兴致地听他讲自己的工作、经历和人生体验。

吴平告诉母亲，作为北京市人大代表，自己襟怀坦白，没有为自己谋过一分私利。吴平当右派时曾被打到社会最底层，所以，他对普通人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他认为人民代表就是人民选了你当他们的代表，不替老百姓主持公道的代表不是称职的代表，所以，吴平不辞辛劳为老百姓的利益奔走呼号。他把自己大部分业余精力都用在了对他极其信任的老百姓身上，而对自己拥挤的住房条件却安然处之。

1985年吴平大胆“下海”，组建了北京第一家装

饰建筑设计所。九年后，他又把辛辛苦苦和大家一起挣的钱全部交给上级公司，体现了一个人不为钱所动的高尚情怀。

吴平很谦虚地说：他60岁以后才懂得怎样做人。他告诉母亲他从不记恨那些在政治运动中整治过他的人，他不愿在过去的事情上纠缠不休。他说：我犯过“所谓的错误”，所以，我深知没有人愿意犯错误。他从不轻易批评别人，总是想自己在那个场合，那个条件下会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说人应该有宽广的胸怀，人应该朝前看。

对于儿子所作的一切，冰心没有作更多的评价。但显然，她老人家赞同儿子的作法。1990年夏天，90岁高龄的冰心老人满怀激情挥毫送给儿子一个座右铭，冰心老人是这样写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敬录乡老先生林则徐句为吴平吾儿作座右铭

孟夏 庚午

吴平把母亲赠予自己的座右铭裱好，放在书桌上，让它时时刻刻成为一面镜子，端正自己的言行，激励自己忘我地工作。

吴平用“两个主义”来评价他那可敬的母亲：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个主义也是他最敬佩母亲的地方，同时也是他要向母亲学习的地方。

冰心说：吴冰是“我的骄傲”

很小的时候，有人问吴冰：

“你爸呢？”

“我没爸。”

“你妈呢？”

“我没妈。”

“这个孩子真可怜。”

原来吴氏三兄妹从来都管父亲叫“Daddy”（汉语爹爹的意思），管母亲叫“娘”。吴冰也无法解释怎么会出现这么一对奇怪的组合。Daddy是西方称呼，娘是中国传统叫法。这组称呼完全反映出吴家是一个具有西方文化色彩又包含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家庭。

吴冰在家里排行老二，小吴平四岁，长吴青两岁。拿冰心的话来说，吴冰是家庭成员中最富理性，最老实厚道的一位。

从小到大，吴冰都是班级的优秀生，只是在日本圣心国际女子学校读书时，因为英语程度差，母亲曾帮助过她。那时12岁的吴冰本该上初二，可却上了六年级，母亲给她讲解布置的阅读作业时，她委屈得直

掉眼泪。冰心就说：“六年级不行，你就上五年级好啦！”吴冰心想六年级我都不想上，还上五年级呢！她最终挺了过来，良好的英语底子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后来吴冰的学习就更少让母亲操心了，倒是吴青小时候淘气，像个男孩子四处打闹，快考试时，需要有人帮忙，约束她好好复习。因此，冰心说：吴冰是“我的骄傲”。

对于子女的学习，冰心其实管得不多，她不要求孩子必须出类拔萃，只要学习不落后就行。给吴冰印象最深的是妈妈总给他们讲故事，如《块肉余生记》等，一听说妈妈要给他们讲故事，吴氏三兄妹就特别兴奋，一人搬个小板凳坐在母亲身边，同时还不忘记准备一个小手绢，因为母亲给他们讲的故事总是让他们感动或伤心得落泪。

吴冰说自己是在自由、宽松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但这不等于没有一丝束缚。母亲从不允许他们穿拖鞋，认为那是懈怠、懒散的标志，也不允许他们睡懒觉，一旦偷懒，冰心就会跑过去掀他们的被子，大喊“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来！”还不允许他们嗑瓜子，因为瓜子皮扔得到处都是，使屋子显得很干净。

在吴冰眼里，母亲这个作家当得实在轻松，她从未见母亲在那里吭哧吭哧地写过什么，或给自己每天规定什么任务，或为是否成功而苦恼忧伤过。母亲从来都是在做家务时打腹稿，向来有感而发、一气呵成。有一次吴平跟人打架有人告状到家里，来人看到冰心穿着朴素、忙这忙那，还以为是吴家的保姆呢。

冰心一生艰苦、朴素，只求衣服干净、合身就行。来帮忙的小保姆还以为冰心家里会多么富丽堂皇，看到后大吃一惊，说还不如她工作过的小厂长的家里阔呢。

冰心只有在参加外事活动时才穿上好一点儿的衣服，因此，一旦冰心穿得稍稍好一点儿，人家就会说：老太太，是不是准备参加什么外事活动啊？

母亲的朴素作风也影响了吴冰，吴冰不喜欢首饰，不懂得首饰的好坏，不知道价格的高低，也从不为此费什么脑筋。当系副主任那阵子上台向来校演出的外宾致谢，系里年轻教师对她好一阵嗔怪，台上那么多人，相比之下她穿得过于朴素了。

吴冰的朴素习惯还表现在节约上。她的讲义从来都是正反两面写，去复印室看到扔掉那么多纸，她觉得扔掉怪可惜的，征得人家同意后她就带回家里做论文的草稿纸。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目前还不发达的中国是值得提倡的。

在吴冰看来，尽管母亲19岁就成名，但从不清高、自大、孤芳自赏。她活得洒脱，与世无争，不做讨好、巴结、奉承之事，比如那时江青请她写什么革

命儿歌，她都给予回绝。冰心以超然态度看待人生，觉得应该怎么活就怎么活，她有自己做人的原则，那就是淡泊名利，这是冰心为人处事一生的准则。

由于妹妹与母亲住在一起，母亲有什么颁奖、获奖活动，吴冰都推给妹妹去参加。她说她不太习惯应付那热闹的场面，不喜欢用母亲的羽毛装饰和抬高自己。对于一张口吴冰是谢冰心的女儿的介绍，她更觉得窘促。

接受我的采访后，吴冰问母亲：“有人采访我，问我你在家教方面最重视什么？”冰心，这位96岁的老人，还是一字一顿清晰、肯定地说：“要诚实，不说假话。”

因为说谎话，吴冰也喝过奎宁水，但小时候的她脾气很倔，从不像妹妹那样向母亲求情，让喝就喝，绝不含糊。但吴冰又说她被强喝奎宁水的次数并不多。

吴冰原是北京大学的高才生，现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但在谈话中，她一直告诉我，自己什么学历也没有。

吴冰出国进修时，正好是许国璋教授当系主任，许老师对她说：“你能读个学位就读个学位吧！”但是，吴冰若继续学下去，北外就不能再派人来了。吴冰放弃了再读个学位的打算。因此，如今带博士研究生的吴冰教授靠的不是学历，而是自己的智慧和务实肯干的精神。

吴冰认为母亲对自己教育最多的还是爱祖国。1951年，冰心一家在日本时，耶鲁大学曾聘请吴文藻先生去美国任教，但他们却在党的帮助下秘密回到了祖国。冰心与吴文藻先生的爱国思想，对尚未成年的吴冰影响极深。

冰心喜欢看球赛。当中国女排1984年获得“三连冠”时，她兴奋地撰文，盛赞女排荣获“三连冠”的勇敢进击的精神。而每当冰心听说有谁出国时，她都会告诉人家：好好干，为国争光。

吴冰在北外工作，有出国机会，但她认为祖国的条件再差也是自己的国家好。尽管中国目前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她还处于建设和发展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在爱国这一点上，吴氏三兄妹的观点与母亲是完全的一致。

吴冰对冰心的评价是：“她是一个极具爱心的人。”

冰心爱花草、爱小动物、爱他们兄妹的小伙伴。吴平初中时，周末经常带他同校的小伙伴回家，冰心就给他们洗澡、搓泥。

冰心也爱自己的和丈夫的学生。丈夫的学生找老师谈学问，但找冰心谈私事，谈恋爱、家庭中的问题。

1980年冰心摔伤后，又得了脑血栓，右手不能握笔。她曾难过地对吴冰说：“我再也不能写作了。”吴



冰心夫妇和两个女儿

冰第一次感到母亲是那样爱着自己的事业，写作对她来说是那样的重要。后来，冰心每天不断地练写字，终于恢复了写字能力，于是就有了《生命从八十岁开始》那篇文章。

吴青说：“做带刺的玫瑰 又有何妨？”

吴青原名吴宗黎，取名黎字是因为母亲在法国巴黎怀上她的。吴青虽然比姐姐吴冰只小两岁，但性格却有着天壤之别。小时候做游戏，吴冰喜欢扮演老师，而吴青和舅父家的孩子则扮演学生。吴冰在台上一板一眼，认真严肃给他们授课，而吴青坐在底下则像个顽皮的猴子，做着鬼脸。

小时候的吴青出奇的淘气，她会跟男孩子一同爬树、荡秋千、用弹弓打鸟。有时候她会逮一些小动物回家，比如说蝴蝶或刚出世不久的小麻雀。一贯喜欢小动物又懂得儿童心理的冰心，既怕这些小生命死在孩子手里，又不能生硬地训斥孩子，于是她对吴青说：“小妹，你把它放了吧，它妈妈可能在等它哩。你要不放了它，它妈妈可能会着急的，尤其是天黑了。你要是在外面没有妈妈，你会是什么感觉呢？”

冰心虽是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但她从不重男轻女，反而对吴冰、吴青有些偏爱，尤其对小女儿吴青，更是视为掌上明珠，称她是她的“欢乐”，因此，不知吴青要比哥哥多得多少母亲的疼爱，吴青也毫不掩饰地说：她得到母亲的爱和教诲最多。而吴青对母亲也非常理解，她说：“妈妈不说话我都知道她在想什么，妈妈喜欢什

么，不喜欢什么，我一眼便知。”

吴青之所以那么顽皮、淘气，除了跟她性格有关，还与母亲从小对她的教育有关。冰心从没有刻意教育过吴青，说作为女孩子应该怎么着，反而教育她女孩子要有独立性，不能依赖别人，所以，吴青也就养成了他人可为、我为何不可为的性格。

吴青与陈恕结婚后要回陈恕老家与公婆见面。冰心就对吴青说：咱们家“没有规矩”，到人家可不能像在咱家那样。

其实，冰心家教哪里是“没有规矩”，没有规矩何以成方圆。在教育子女成长上，冰心都有大的规范和总的要求。比如说，她会告诉吴青，做人要真，不能说谎；不要欺负比自己年龄小的，尤其不能欺负伤残人；不要推诿责任，自己做事要自己承担。吴青说：在这种大的规范下，她就觉得比较自由，因为只要不做那些坏事，她的行为都不受约束。

在和一些官员打交道时，吴青经常直呼其名，但在某些人看来这很有犯上不恭的意思，但吴青认为人都是平等的，你叫我吴青，我叫你的名字，这有什么不可？吴青看不惯某些人的长官意识和腐败作风，就要说上几句，不看别人眼色，即使说她“出口不逊”，“不尊重上级”，她也不屑一顾。

当我告诉她有人称她是带刺儿的玫瑰时，她说：“做带刺儿的玫瑰又有何妨？”冰心老人一生喜爱玫瑰，尤其喜欢玫瑰上的刺儿。在作家群中，冰心被认为是最讲真话，最敢讲真话的人。拿冰心自己的话来说，她已经不怕砍头了。

当她得知女儿一次人大会议表决投了唯一的一张反对票时，她抄录了林则徐的一句话鼓励女儿：“苟利国

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同时还告诉女儿，如果你真想当好人大代表，你就不能惧怕那些邪恶势力，要敢说真话。

然而，敢于说真话、能够主持公道的吴青，却不断受到爱说三道四人的冷嘲热讽，说她是在利用母亲冰心的荣誉。吴青非常坦然地说：“就算是我利用我母亲的名声，这有什么不好，有人利用父母的名声为自己捞名、捞钱，而我利用母亲的名声为群众做善事、办好事，这有什么不可以？”

出身于书香门第、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的吴青，对农村却有着特殊的感情。吴青感慨地说：“我的母亲和父亲的上上几代都来自农村。我的事业的很大一部分根基就在农村。”

她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农村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占很大比重，要想改变中国，就必须改变农村，要想改变农村，就必须改变妇女。教育一个女人，就是教育一家人，就是教育几代人。农村妇女潜藏着巨大的能量，一旦得到合理开采，她们就会象油井一样把全部热能喷射出来，而她目前要做的就是这个工作，所以，当《农家女百事通》杂志主编谢丽华女士邀请她担任刊物顾问时，她愉快地接受了。

除此之外，吴青还是环球世界妇女基金的顾问（美国非政府组织），加拿大国际发展署妇女参与顾问。她以自己这些特殊身份为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筹措资金，为“希望工程”、扶贫等项目不辞辛劳地奔波着。

吴青有一个梦，那就是一个县一个县地扫盲。扫盲

工作中，她重视耕耘，更关心收获。为了检查扫盲效果，吴青和谢丽华等人下到底层的扫盲点，拿着上报的名单与实际的人头一一核对。真的发现了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的。吴青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要的是真文盲！”

农村妇女干部们都很激动，她们说这是她们第一次见到从北京来扫盲的人，第一次见到这么认真做扫盲工作的人。

吴青象个陀螺每天都在高速旋转着。

一向认为“热爱教育就是爱国”的冰心老人，1995年把自己出版《冰心全集》获得的9.4万元稿费全部捐给了农村妇女发展基金会，用无言的声音支持女儿的行动。国家主席江泽民闻讯派人送来装有玫瑰的花篮以示祝贺。

尽管现在冰心住在北京医院里不能从事过多的教育活动，但她仍不忘以自己言行影响下一代。今年8月，外孙陈钢（吴青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去看望她，这位生于1900年、与世纪同龄的老人不断地嘱咐外孙，要在美国好好学习，不要惧怕外国人，不要做奴才。她还说她要坚持活到100岁，看外孙从美国学成回来。

冰心以自己的言行为家人树立了为人从业的楷模，影响了家里的第二代、第三代，然而，冰心在87岁高龄写的《万般皆下品》以及先后写的《我请求》、《无士则如何》、《真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开卷有益》等呼吁国人重视教育的文章不知会影响中国多少代人，而且这种影响是深远的、无法估量的。

（责任编辑 萧 徐）

高二适先生，一名锡璜，号舒凫，江苏东台人，为当代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与陈树人、马一浮、于右任等名士唱酬甚密。

高二适先生为人磊落坦荡，刚正孤傲。1965年，我国书法界、学术界对《兰亭序》的真伪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高二适先生对郭沫若先生关于《兰亭序》为“后世依托”之论独特异议，撰成《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但慑于郭老的威望，无处敢于发表。

毛泽东主席看到高文后分别致函章士钊、郭沫若两位

高二适

与

《兰亭序》

真伪之争

朱继功

先生，内有“……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笔墨官司，有比无好”等语，高二适的文章遂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同年7月，《文物》杂志全文影印刊登了高二适的手迹。

“文革”中，高亦未能免遭冲击，他的藏书几乎全被抄走。

批林批孔期间，他竟在家教学生高声朗读《论语》。他的弟子张尔滨等人都为老师捏一把汗。



吴清源九段(1973年)

吴清源 驰骋日本棋坛 六十年

● 吴景略

我的弟弟吴清源，是日本围棋界的一个知名人物。1928年他14岁离开北京去东京，1984年70岁时从棋界引退，在日本棋坛纵横驰骋近60年，创下无数辉煌纪录。他一生对局795次，胜530局，败240局，和25局，得胜的百分比极高。尤其是在30年代至50年代，在日本棋坛横扫三军，所向无敌，至今仍为日本人所津津乐道。

川端康成说：在没有围棋天才传统的国土中，不会出现吴清源的天才

清源发迹在日本，起步却在中国。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说：“在没有围棋天才传统的国土中，不会出现吴清源的天才。”的确，清源的围棋天才从幼年时便显现出来。

清源1914年生于福州，长于北京。他8岁时，父亲便教我们兄弟三人学围棋。他天性沉静，喜欢思考，一接触围棋，就如同生铁遇到磁石一样，立刻被吸引住了。他每天早晨9点开始摆棋谱，直摆到夜里12点左右，几乎到了痴迷忘我，不

知疲倦的境界。他理解能力很好，能钻研棋谱上走法的意图；他记忆力也特别强，凡是他摆过的定式，无论多么复杂，他都能记住不忘。半年多时间，清源就把棋界名人黄龙士、范西屏、施襄复的对局棋谱都研究完了，棋力也飞速进步。父亲、大哥和我都远不是他的对手了。清源9岁那年，父亲带领我们兄弟3人到北京著名棋手聚集的“海丰轩”茶社，长长见识。那天著名国手汪云峰正在那里，父亲请他指点清源一局，汪云峰让清源五子，被清源杀败；汪云峰又让四子，同清源下了一局，仍然输了，从此，清源在北京棋界的名声大振。我们父子4人经常去“海丰轩”茶社，清源有机会和顾水如、刘棣怀等高手一一交锋，棋艺不断提高。后来，他又经人介绍，同在北京的一些日本棋手以及应邀来华的高段棋手交锋，并不断取得胜利，这样，他的名声就传到日本，引起了日本棋界的注意。1928年，日本棋院的高段棋士濂越完作邀请清源去日本棋院作棋士，共同切磋棋艺。当时，父亲已去世3年，家庭生活发生困难，为了清源的前途，母亲

决定接受邀请。1928年10月，清源在母亲、大哥的陪同下，东渡日本，开始了他在日本的棋坛生涯。

“不败的名人”本因坊秀哉败在吴清源手下

清源到东京以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怎样评定他的棋力，授给他几段棋位。当时段位对于一个棋士来说十分重要，它不但决定棋士在棋坛的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

段位对于刚到日本的清源更为重要。他到日本棋院后，棋院总裁大仓喜七郎，每月资助清源生活费200日元，以两年为满期。两年以后，就不再供给，必须自己以下棋维持生活。如果段位定得太低，从初段开始，即使每年升一段，两年以后，也不过只能达到三段。举办比赛的单位付给棋士的对局费按照段位高低而不同。被请去作私人指导，也按照段位付给酬金。因此，给他定什么段位，对清源的今后关系重大。

日本棋院中有发言权的高段棋士对授予清源段位问题进行郑重讨

论。瀚越充作认为清源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而其他的人则认为不够三段，尤其是最有权威的本因坊秀哉认为清源的棋风“邪门歪道”，不能给以三段，但念清源远道从中国而来，勉强给以初段。瀚越充作对秀哉门户之见，歧视中国少年的不公正态度难以容忍，坚持非给清源三段不可。

一方面瀚越坚持，一方面秀哉反对，双方争论不休，只好以对局来评定。秀哉首先派自己的高徒筱原正美四段棋士出战。对清源来说，这是到日本以后第一次对局，不但对自身前途关系重大，而且也对瀚越声望关系重大，临战前不免有些紧张，但他拈起棋子下了第一着以后，精神就进入棋局，什么结果全都抛到脑后了。

清源执黑先行，下到170子结束，清源中盘取胜。大家评论说，他的棋力不像14岁少年的棋，下子果断迅速，不迟疑拖拉，棋艺非同凡响。

门徒败下阵来，本因坊秀哉决定亲自出马。秀哉本名田村保寿，是上一代本因坊秀荣的弟子。秀荣死后，他承袭了本因坊的称号。按照本因坊门派都排“秀”字的习惯田村取名秀哉。本因坊派历代名手辈

出，传到秀哉，其他门派陆续消亡。秀哉在日本，被人称为“不败的名人”。

这次与秀哉对局也是清源难得的机会。他到日本以后，第二盘就与日本第一棋手对局，不能不叫日本年轻棋士羡慕，他们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同时也是对清源最严峻的考验。如果说第一局是“闯关”，那么这一局就是“夺帅”了。

秀哉上场穿一件黑色的日本礼服，戴一副近视眼镜，鼻下留有一小撮胡须，看起来很威严。许多日本的年轻棋士都被秀哉威严镇住。但清源年纪虽小，却已久经战场。他在中国曾与北洋军阀段祺瑞下过棋，并且战胜了这位大人物。他曾对我说：“不管面对什么人，地位有多高，学问有多大，到棋盘上就是我的天下。”故此他对名人秀哉并没有畏惧感，仍然平心静气、从容地下棋。

九段与初段对局，本应让三子。双方就坐后，清源在盘上摆下三枚黑子。秀哉连说：“二子、二子”。清源莫名其妙，只好听从收回一子。大概秀哉为了较有把握取胜，故此不让三子，只让二子。尽管秀哉少让一子，清源仍努力稳定自己的情绪，沉着应战，一丝不苟，直到终局。

计算结果，清源以四目取胜。

秀哉败北后，无话可说，只好评定清源为三段棋士。当时段位评定很严格，三段约等于现在的五段，清源初到日本就获得这个段位，为他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日本人狂妄声称， 中国人样样不如他们， 但在棋坛上却败给了 中国人吴清源

棋士每年都要参加日本棋院的春秋两季升段大比赛，根据成绩决定是否升段。清源身体衰弱，经医生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自然愈合的结核病灶。为避免病灶重新活动，医生劝他一年之内不参加激烈的决胜大赛。因此1929年没有参加棋院的大赛。1930年16岁时才开始参加春季大赛。

升段大赛，日本棋士把它比作相扑角力在国技馆的正式决胜赛。在升段赛场上，棋士们短兵相接，殊死搏斗。

每个棋士按规定要与8人对局。时间限制每人各9小时，两天内结束，所以第二天常常下到深更半夜。



1959年，作者与清源
及弟媳和子摄于天津车站
前

当年春季比赛，清源七胜一负，得83分，名列全院第三。当年秋季，清源一鼓作气，取得八战八捷的成绩，得87分，名列第一，晋升为四段。

当时比赛奖金是：第一名300日元，金表一块，金牌一块；第二名200日元，金牌一块；第三名100日元，金牌一块。当时100日元约合中国币260元。日本大学毕业生就职之初一般薪金每月只有60日元左右。因此，当时的奖金数额是比较高的。

第二年即1931年清源17岁，在春季比赛中六胜二败，得71分，列全院第四；秋季战果辉煌，全胜而归，得85分，名冠全院。按这样的成绩，本来应当立即升为五段，但是这时棋院升段规定有了改变，无论成绩怎样优秀，必须经过4次比赛，也就是两年才能升段。到1932年清源18岁时，又在春季大赛中战胜了所有的对手；当年秋季八局比赛七胜一负，正式升为五段。

厮杀是提高棋艺的最好途径，尤其是与高手厮杀。清源的棋艺就是在这4年内不断与高手较量中锻炼出来的，当然也与他自身的努力钻研分不开，他对日本棋界中名人的棋谱如饥似渴地加以研究，全部精力都用在棋艺之中。

1931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日本人狂妄声称，中国人样样不如他们，但在棋坛上，作为中国人的吴清源却大显身手，不断战胜日本人。

从1930年开始，由日本读卖新闻社发起，清源与当时强手10人一对局。这10局棋一直延续到1932年。清源连下10局，全胜而归。

在这期间，清源还参加了东京时事新闻社发起的棋赛。那次棋赛采取淘汰制，败者下场，胜者继续与另一个人比赛。清源在那次比赛中，一连击败18人。这样的战果在

日本是空前的。

新闻社举办的棋赛，对局费一般为300元。每盘棋胜者得180元，败者得120元。清源虽然不能说总是胜家，但是可以说胜多败少。他常常同时参加两个新闻社举办的棋赛，因此收入不断。虽然大仓喜七郎对他每月资助200元生活费到1931年期满，但他凭自己高超的棋艺，完全可以自力更生，不再需要人资助了。

吴清源“惊人一着”使本因坊秀哉“一子未下”

清源认为下棋是决胜负的，不能总使用一种战法。如果一个战法不得手，那就必须改变。他认为以往的布局相似之处很多，变化不大，限制了思路。

清源过去对局时执黑居多。晋升五段后，执白时多了。清源认为，如果按旧习惯布局，白棋总是处在下风，所以非改变下法不可。一般棋手常常以二子占据角。他想以一子代替。于是他开始走棋一面占角，一面向边开展。在布局上他以与黑棋平分秋色为原则，放弃走小目的定式。

当时与清源并驾齐驱的青年棋士木谷实也与清源观点相同。日本棋院的安永一先生把他们二人的意见写成《围棋革命新布局法》一书，书中介绍新布局法如何打破传统定式的束缚，开拓了布局的思路。经他们两人提倡，其他的棋手也相率应用这布局法，一时成为一股新风。现在日本第一流棋手武宫正树惯用所谓“宇宙流”的战法，也是清源当年布局的遗风与继续。

凡是新事物总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当时日本棋界还残留有封建的祖师爷制度。只要是反对传统走法，就有被驱逐出门的危险。本因坊秀哉就反对新布局法。

1932年秋，读卖新闻社举办一次棋赛，选出当时棋力高手6人参赛。计有清源、濂越宪作、木谷实、岩本黄、林有太郎、桥本宇太郎。胜者可以与二十一代本因坊秀哉对局。清源一路过关斩将，取得胜利。

清源得胜，正是读卖新闻社所希望的，因为这样可以安排清源与名人秀哉对局来吸引读者。

在清源与秀哉对阵前，各报纸都以“不败名人”秀哉与鬼才吴清源决胜为标题，大肆宣传。

自从1928年到日本后，5年之间，清源身经大小战局200多次，已是沙场老将。这次与秀哉对局，他仍然好整以暇，毫不紧张。他认为那盘对局还不如参加升段大赛紧张，因为升段赛每一局都关系升段大事。在别人看来，与名人对局非同小可，而他只把这当作在升段大赛中抽空下一盘而已。当时他正参加秋季升段大赛。

对于以秀哉为首的本因坊一门来说，这是一场重大的对局，关系到本因坊一门的声望。如果输在清源手下，将大大有损家门的权威。

清源与秀哉之战于1933年8月开始，清源执黑先行。他按照新布局的次序，首先下三三，第二子下星位。他看秀哉在两个角上都下小目，为了使黑棋实地与外势保持平衡，第三子下在棋盘的中心点，日本人叫作天元。

当时清源已经在升段棋赛中运用新布局法多次，但新布局法的书尚未出版，广大棋界人士还没有理解它的真正意义，尤其是天元那一着，使许多棋手和围棋爱好者感到新奇和迷惑。秀哉不知所措，濂越先生也十分担心，说道：“像这样的怪布局，恐怕不到百子就要溃不成军了。”

三三本是本因坊一门的禁忌之子，天元更是被他们认为是岂有此理的一着。他们愤怒指责清源轻视名人，狂妄到难以令人忍受的地步。

不少指责的信件纷纷投到读卖新闻社。但是这样大力打破传统的战法却博得日本广大围棋爱好者叫好。

日本自从1931年9月18日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以后,第二年1月28日又在上海挑起淞沪战事。6月成立伪满洲国。1933年进攻热河,占领山海关。5月逼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一步一步加深。

中日战争的形势使清源与秀哉这场棋战笼罩着中日对抗的气氛。东京各报纸也夸大其词,渲染上浓厚的对抗色彩,使社会各界人士对这盘棋越来越关注。

为了照顾秀哉的健康,每周星期一下一次。从1933年8月开始,一直下到第二年1月29日才结束,拖了半年之久。当时还没有采用封棋制(就是中途休息时,最后一子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中,等到重新对局时再拆开),这样对秀哉有利。他可以随时要求暂停,回去召集门人共同研究对付办法,然后继续对局。读卖新闻社每天刊登一两手,吊得读者好奇心越来越高,一时东京街头巷尾都谈论这个话题。

这盘棋实际下的天数只有14天。在半年之中打打停停,总共暂停18次,次数之多足棋史上少有的,最长一次暂停7天之久,也是空前的纪录。在那次暂停7天之后,白棋把考虑成熟的一子投出,清源只考虑两分钟就回敬一子。秀哉又不知如何是好,考虑了三个半小时没有下子,又要求暂停,创下个特殊的例子。读卖新闻社当天不好报道这盘棋的对阵情况,只好把“名人身体不适,一子未下”的消息刊登出去。

这局棋一开始旗鼓相当,进展到中盘时,黑棋略占优势。到160手,白棋出一妙手,结果以一子取胜。据说这一妙手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想出来的。

清源事后回忆说,那天终局以

后,秀哉脸上硬邦邦的肌肉立刻松弛下来,喜上眉梢。木谷实当晚带清源去饮食店休息。他为清源鸣不平,认为这局棋只给白棋有利条件,是不公平的对局。社会上也有不少公正人士为清源抱不平。清源那一盘棋虽然输了,反而因此名声更大起来。

长达16年的10局决胜战,吴清源以天下无敌的气概横扫三军

在清源一生的围棋生活中,最为辉煌、为日本棋界人士称道不已的是他当年与日本棋界精英所作的10局决胜战。这10局决胜战从1939年开始至1955年为止,长达16年之久,下了近百局棋。用桥本宇太郎的话说:“吴清源以天下无敌的气概横扫三军。”清源自己则说:“我把所有的对手全都踏倒在脚下。”他还说:“战后,我作为读卖新闻社一张王牌,独霸擂台,下了十多年的10盘棋。我的处境若说是悬崖上的决斗也不过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日本棋院,单枪匹马独自背水战斗。因此,一旦被人击败,身价就一落千丈。这意味我的棋士生命将就此结束。”

10局决胜战是从1939年秋天与木谷实在镰仓的迷长寺中开始的。那时秀哉名人引退了,日本棋院八段空无一人。七段成为最高段者,有濂越宪作、铃木为次郎、加藤信三位长者。木谷实与清源刚刚升入七段,是最年轻的七段棋士。当时清源20岁,木谷实30岁左右。日本读卖新闻社举办这场棋赛,付给每人对局费700元,而一般对局费两人共300元,可见读卖新闻社对这场决战的重视。

读卖新闻社规定,在10盘对局中,有一方先胜4局,就改变交手棋份。限制时间为13小时,三天结束。三天之中两人同馆同宿,闭门

封棋。为了环境安静,决定在镰仓的各寺院中进行。

第一局木谷实执黑。第一天双方只是布局没有什么厮杀。第二天黑棋挑起战火,双方开始绞杀。第三天绞杀扩大,难解难分,双方都全身心投入战斗。这时木谷实突然在棋盘边倒下。经短暂休息后再战,结果白棋以二目取胜。这是清源近百局决战中的第一局,是一场自始至终苦战不休的大厮杀。

木谷实在对局中途晕倒的事,由观棋记者报道后,引起一场风波。一些读者写信给读卖新闻社,责骂清源,说什么:“当木谷七段鼻血流出,异常痛苦的时候,你却装作不知道,只顾继续下棋,这简直太残忍了。你为什么不马上休息一下?你为什么连照顾一下的话都没有说?你真是没有武士精神冷酷无情的只顾取胜的动物!”

清源认为在这么重大的对局中,在临近终局还是难解难分的时刻,他绞尽脑汁思考,周围发生什么事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至于休息不休息,只能由棋院派去的干事决定,他没有权力。

与木谷实的10局棋一直下到1941年为止,清源六胜四负,取得胜利。

清源战胜木谷实后,读卖新闻社又开始策划下一次10盘决胜战。问题是选谁作清源的对手。木谷实的棋力在棋士中最强,一向与清源并驾齐驱。现在他被清源杀败,谁能一马当先,出来与清源挑战,确实很难选出。

在日本棋院找不出人来,只好在日本棋院以外去找。雁金准一是棋正社的八段棋手,他与本因坊秀哉都是本因坊秀荣的门下才子。因为与秀哉不合,另立门户与秀哉分庭抗礼。读卖新闻社邀请他出马与清源较量。

这10盘决胜战从1941年8月5日开始,至1942年5月第五局为

止,清源四胜一负,雁金准一被逼到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再败一局,那就以战败告终。有关人士考虑到他的名声与健康,决定这10局决胜战就此终止。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至1944年,海军惨败,马利亚纳群岛落入美军手中,美军轰炸机可以直接轰炸东京。东京食物短缺,每天配给的大米不够维持体力。清源为了生计,不得不整天为弄到食物而到处奔走,无心下棋。1945年3月,美机空袭东京,清源的家被烧得片瓦无存,日本棋院也被炸掉了。

当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前景彷徨迷惘不知所措时,就呼天求神寻找救主。清源夫妇从1945年至1948年约四年时间内,随玺宇邪教漂泊各地。他把下棋的事抛到脑后,认为坐到棋盘前与人对局的日子不会再有了。

清源重新坐在棋盘前与人对局是1946年8月与桥本宇太郎的10盘决战。本因坊秀哉引退前,把本因坊这一家传的头衔让给日本棋院。日本棋院于是举办全日本选手交战,优胜者可以取得本因坊这一头衔。

第三期本因坊头衔战,桥本宇太郎获得胜利,荣冠本因坊称号。是否他就是天下第一?人们希望他与清源决一胜负。

读卖新闻社规定一人7小时,当天终局,对局费是每局每人10000日元。

清源的心那时还没有回到棋上,对棋艺已经荒疏了两年。虽然执黑先行,全力以赴,但仍敌不过白方,被白方杀得七零八落,败下阵来。关心清源的人都有些失望,说:“当年吴清源的威风哪里去了?”连桥本也说:“吴先生的棋不是那么厉害了。”大家担心那10盘棋会成为一边倒的势头。

不料第三天进行第二局时,清源扭转乾坤,取得一目胜。经过两

次厮杀,清源的棋力已经恢复,加上一年多不问俗事,头脑得到充分休息,思考变得更加清晰敏捷,棋锋锐不可当。10盘结果,清源六胜三败一平。

战败桥本以后,读卖新闻社又策划清源与岩本黄进行10盘决战。岩本黄刚刚从桥本宇太郎手中夺得本因坊桂冠。10局下来,清源以七胜二败一平奏凯。

秀哉死后,九段成了空白。1949年藤泽库之助晋升为九段,坐上了棋坛第一把交椅。但是他曾经败在清源手下,他升为九段,压在清源之上,于理说不过去。

为测验清源能否晋升九段,日本棋院选出10名六、七段的高手向清源挑战。清源虽然认为这样安排不合理,因为只有高段对低段进行测验,没有低段测试高段的,但他仍然接受了挑战。

年轻的棋士组成吴清源研究会,高举打倒吴清源的大旗向清源挑战。结果清源九胜一负,棋院不得不于1950年授予清源九段。这样日本棋坛就出现了两个九段,藤泽库之助的名人地位受到挑战。读卖新闻社这时就筹划清源与藤泽争夺名人地位的10局战。

藤泽顾虑很多,迟迟不肯出战。读卖新闻社无奈,改请桥本宇太郎与清源再作一次10盘决战,10盘结束,清源再一次战胜桥本后,与藤泽九段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了。1951年10月,他们二人的决战开始。结局清源七胜二败,取得了胜利。

藤泽战败后,要求再战。时间从1952年10月至1953年3月,清源五胜一败,把藤泽的交手棋份降为定先,藤泽以惨败收场。随后清源又与坂田荣男进行了10局决战,清源八胜二负,把坂田八段降为定先。

击败坂田后,清源已横扫日本棋坛,只剩下高川格八段还没有与他交手。高川八段,当时正争得本

因坊称号,意气风发,可是经十局决战他仍然败在清源手下,清源以六胜四败取得胜利。

高川格落马后,在日本棋坛上再也找不到可与清源匹敌的对手了。读卖新闻社只好宣布10盘决胜赛就此告终。

清源苦战16年,击退所有的对手,按理他应当是日本棋坛上坐第一把交椅的人。日本围棋评论家山田虎吉、三崛将等人都说:“早就应该授予吴清源名人地位了。”但是日本棋院根本不考虑把名人称号授给清源,而且借清源参加过邪教的缘故,暗暗取消了清源棋士资格。三崛将先生说:“昭和的棋史就是吴清源的棋史,不提吴清源,就无法讲昭和棋史。”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周恩来在接见访日代表团时,提到了“在日本的中国围棋名师吴清源”

1960年瀚越宪作先生率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北京,陈毅同志接见他,请他转告吴清源,希望他回国看看。这是祖国对他第一次关怀的声音。

1973年,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访日代表团出国前夕,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部分代表团成员时,问道:

“陈祖德来了吗?”

“来了。”陈祖德回答。

“有一位在日本的中国围棋名师吴清源,你认识吗?”

“早已知道他的盛名。”

“好好,你们这次访日,可以去看看他,邀请他回来看看祖国嘛!”

遵照周总理的嘱咐,陈祖德在东京特意去拜访清源,转达了周总理的邀请。清源听了之后非常高兴,表示时时思念生育他的故土。

在此之前,1956年梅兰芳曾率京剧代表团访日,与清源会面畅叙。

清源对梅先生说：“围棋是中国的国粹，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日本的围棋还是唐代流传过来的。我想在祖国伟大建设中，围棋也应该是人民文化生活中一种艺术活动。要振兴中国围棋，首先要发现天才少年，送到日本留学。我一定尽全力照顾他们，使他们加快学成回国，成为骨干，使中国的优秀传统艺术能够发扬光大。”

梅先生回国后，拜托顾水如先生推荐人选。顾水如推荐陈祖德与陈锡朋两位少年。不巧，那时长崎发生焚烧中国国旗事件，中日关系恶化，这事也就搁浅。清源为这事深感遗憾。

1980年8月我去东京探望清源，劝他回国看看。他对我说，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请一些中国年轻的优秀棋手到日本棋院进修。这样，他们就有机会与日本第一流的棋手对局。常常和高手对局才能很快进步。他将与读卖新闻社商量资助1500万元作为进修棋手两年的生活费用。

我回北京后，把清源的建议告诉当时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李梦华赞同，但因日本棋院反对，他的想法未能实现。

1984年清源宣布从日本棋坛引退。引退前，读卖新闻社的一位编辑问他引退后打算作什么？清源回答说，想对中日友好与国际和平作些贡献。

1985年5月，他接受李梦华同志的邀请，偕同妻子到达上海。在机场受到中国围棋协会顾问金明同志的欢迎，又由金明同志及全国体协国际部副部长赵启鑫陪同飞往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李梦华、孙平化、陈祖德等人欢迎。第二天晚上国务委员方毅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和宴请他夫妇二人。第三天中日友协会长王震又接见他们夫妇，与他们作长时间友好谈话。他在北京短暂逗留期间，曾与北京棋界人士在北京棋院欢聚。在北京的亲友也到他下榻的长城饭店相聚留影。清源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与欢迎，心情非常激动，认为这是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他的回国访问，在中国围棋界也引起很大轰动。

从1985年以后，清源不断回国，有邀必到，无邀也随旅游团回国观光。1989年尧舜杯世界围棋业余选手大赛在北京举行，他应邀来京出席。1995年5月，日本NHK派人员来华拍摄“吴清源故土寻梦”

的纪录片。首先要拍清源少年时代崭露头角的地方——海丰轩茶社。这个茶社当年坐落在北京西单南绒线胡同西口大街上，现在早已不存在了。我依稀记得它的位置，现在是一家饭馆，也已经关门歇业，我不敢肯定它是否就是当年的海丰轩旧址。我陪同清源访问了附近的老住户。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告诉我们，那家饭馆就是当年海丰轩的地址，并且对我们说，他曾听到老一辈人谈论过围棋神童吴少爷的故事。他一家人端出新沏的茶殷勤招待我们，说是有幸在这里见到清源。过些日子这一带房子就将拆掉，这里的住户要迁往大兴县去了。清源听到这位老大爷讲的话，激动不已，感谢乡亲们没有忘记他。

在天津他对《天津日报》的记者说，他一生只收了两个弟子，一个是林海峰，一个是芮乃伟。一男一女，都是中国人。他们两人棋力都很高超。他又说：他现在并没有闲着，正在研究围棋新的下法。

今年4月他又应邀去上海出席应氏杯世界选手杯赛，任总裁判。他以82岁的高龄，正继续为中国围棋事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 林 耀）

吕思勉作文 倚马可待

● 朱继功

我国史学家中，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并不多。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23岁时，《二十四史》就全部读了一遍。他一生中究竟读了几遍？他自己曾说：“我于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两遍而已。”

吕先生年轻时善作文，文思敏捷，倚马可待。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吕先生20岁时赴南京参加乡试，尝一日作文14篇。他在日记中写道：“是年在场中助人作文甚多，时同人多抱微恙也。计二场助文甫作两篇，叔源、调卿、诗舲、鲁青各一篇。又有史滋德者，文甫之强人也，以文甫之请，为作两篇，改削两篇。时文甫患恙最重，设非予以相助，则二场即不敢入场矣。文甫谓予忒有豪气，因此定交，还里后又介李君涤云与予定交云。比时予兴会甚佳，虽在场中代人作文甚多，而出场仍甚早。”后来，吕先生56岁时，看到自己的学生陈楚祥才思敏捷，不禁勾起自己对年轻时往事的回忆，赋诗一首：“万言倚马亦豪哉，垂老何图见此才。隄疑名场三十载，又随影事上心来。”

“第二条战线”的闯将 袁永熙的传奇人生

● 章学新

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解放战争期间蒋管区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为“第二条战线”。抗战期间任昆明西南联大党的总支书记。联大复员后任北平地下党南系学运主要负责人的袁永熙，可以称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员闯将。

现年七十有八的袁永熙，在人生的道路上颇具传奇色彩。

一个“归附于革命阶级” 的热血青年

袁永熙出生于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他的大姑，是晚清“盛京将军”赵尔巽的儿媳妇。段祺瑞执政时，赵尔巽是临时参政院议长。二姑是北洋军阀徐世昌的儿媳妇，袁世凯窃国后，徐任国务卿。父亲袁作霖，科举落第后，在袁世凯的新军中当文书起家，军阀政府向日本国大借款时，他是“官小油水大”的营口海关负责人。段祺瑞执政时，他移居天津意大利租界，一面经营粮油买卖，投资枣庄煤矿，一面又在安徽凤阳海关任职，官商结合，“风光”依旧。

出身于如此家门的袁永熙，是怎样背弃原来的阶级，“归附于革命阶级”的呢？

1928年，袁永熙十岁时，全家移往北平，住在后海米粮库4号一幢二层楼房里。此时，虽然随着封建军阀的倒台，袁作霖的“肥缺”丢了，买卖亏了，但他的子女却通过现代教育接受了新的思想。袁家子弟从此置身于新知识份子阶层。

袁永熙1932年初中毕业于育英中学，1935年高中毕业于师大附中。他好学上进，又是篮球、足球爱好者，经常出入于清华园，和孙国华教授的弟弟孙国梁、朱自清教授的女儿朱彩芷等同辈人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议

论时事政治。崇实中学的地下党支部书记力易周说，那时他已是党的培养对象。可惜袁永熙为报考清华日夜复习功课累得吐了血。1935年，当震动全国的“一二·九”运动蓬勃而起时，孙国梁、朱彩芷等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的哥哥袁永辉则在平郊福寿岭一带组织中學生搞军事训练，而自己却无奈地躺在病床上同疾病作斗争。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平津陷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北平的地下党员、“民先”队员纷纷离开故都参加抗战，大哥永辉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介绍，投笔从军，到八路军五台山的随营学校学习。20岁的袁永熙再也耐不住性子养病，于次年春，拖着病躯随同五姐永懿和朱自清教授的家眷一起，启程经青岛、绕道香港、河内前往西南联大所在地、抗日大后方的重镇昆明。

在独具春意的西南联大

袁永熙到昆明时，西南联大刚于5月4日开学。这里校舍虽然简陋却荟萃着冯友兰、吴有训、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等士林名流和民主斗士。全校学生近千人，是战时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

联大的文学院当时设在蒙自，准备报考经济系的袁永熙便借住在蒙自朱自清教授的家里。这时，原北平崇实中学的党支部书记力易周也来到蒙自。力易周1936年入党，北平沦陷后，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因受康生制造的一起错案“金田事件”的株连，被调离延安，到国统区接受斗争考验。袁永熙、朱彩芷和力易周等一边复习功课准备报考，一边和原来清华学生中的“民先”队员取得联系，利用蒙自县的文庙作校舍，办起了一所近百人的民众夜校。这是“民先”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据点，袁永熙积极参加民众夜校的工作。暑假以

后,联大的文学院集中到昆明,袁永熙等也随着离开蒙自。力易周和从北平撤出来的黄元镇、郝诒纯会合后,自动组织成党的临时小组,并且和中共云南省特委领导的“抗日青年先锋队”取得了联系。在中共长江局巡视员马子卿的指导下,“民先”和“抗先”合并,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地方总队部”,总队长力易周介绍袁永熙加入了“民先”队,担任总队部的组织干事。不久,临时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12月吸收袁永熙为党员。联大发榜后,袁永熙被录取入联大经济系,力易周录取于教育系,郝诒纯、黄元镇分别进入地质地理气象系和土木系学习。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局,长江局撤销;6月,原长江局巡视员马子卿改任云南省工委书记。这时,联大新生入学,学生人数猛增,新生中有来自重庆、北平、武汉、长沙的部分地下党员。云南省工委为加强领导,首先整理党的队伍,接纳组织关系,正式建立西南联大党支部。临时支部负责人力易周,因在组织上考察期间,经请示南方局后,保持单线联系;省工委确定袁永熙为支部书记,邢福津(方群)为组织委员。

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党支部组织委员邢福津,联系了二十多名同学,发起组织一个团体,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开展文体活动,交流学习心得。袁永熙积极予以支持,动员几名党员参加,使报名人数半个月内在五十多人,广泛开展了时事演讲,歌咏戏剧,生活服务 etc 群众性活动;聘请曾昭伦、余冠英等教授为导师,并向训育处正式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到1938年底召开成立大会时,团体定名为“群社”,正式社员一百四五十人,参加“群社”活动项目的人数多达二三百人,成为西南联大内群众基础最广泛的社团。在国民党顽固派对“热血青年受人煽惑”防犯有加和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政治局面下,“群社”活动成为地下党既能发动群众,又可保障组织安全隐蔽的有效方式。当年9月,为纪念“九一八”七周年,联大同学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结队上街宣传;年底,汪精卫投降日本,联大一千多同学联名通电声讨。他们冲破国民党控制下大后方“可怕的冷静”局面,使西南联大的校园里独具关不住的春色。

为建设“民主堡垒”奋斗

1939年暑假,袁永熙赴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委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西南地区八所大学的党支部书记训练班。在这里,他听了董必武、胡乔木、冯文彬、蒋南翔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还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有关组织建设、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秘密工作知识等,这是袁永熙入党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学习,使他提高了觉悟,开阔了眼界,明确了斗争形势和任务。

这年秋天,联大第二届招生,南方局转来新生中秘密党员的组织关系。一天,按照约定的时间,袁永熙在昆明市郊一间农舍里和新来的一位女同学接上了关系,她就是陈琏,是蒋介石贴身秘书陈布雷的女儿。她也是一个决心背叛家庭“归附于革命阶级”的战士。从此,陈琏便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女同学方面的工作。陈积极热情,和群众打成一片,得知袁永熙患有肺病仍然坚持工作,出于同志感情,她经常关心袁的健康。

1940年,校内的三青团组织了“青年剧团”,分化联大的话剧团,党组织即通过“群社”组成戏剧研究会,在纪念鲁迅逝世四周年时,排演《阿Q正传》。9月初,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曾密电抄送云南中共分子调查报告一份给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军委昆明行营主任龙云,所附黑名单上有联大师生约二十人,第一名便是“群社”的导师民主教授曾昭伦,袁永熙、池际尚、周绵钧、缪景湖等都在其内。握有云南军政财文实权、又有护国元老和开明士绅支持的龙云,素与蒋介石有矛盾。他虽将密电内容批转省教育厅,并说“严密注意防范”等等,实则并不采取具体行动,仍同中共保持友好关系,在龙云的虚与委蛇下,曾昭伦、袁永熙等得以安然无恙。9月25日,《阿Q正传》在省党部大礼堂公开上演,先后连演15场。党组织动员二百多人参加前台和后台的工作,陈琏是前台招待工作的负责人。

这时,西南联大内已拥有秘密党员83人,占全省党员247人的三分之一,是联大党员最多的时期,省工委决定成立党总支,袁永熙为总支书记,陈琏为宣传委员。9月,省工委任命袁为青委委员,由李晨接任总支书记。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原来控制在国民党和三青团手中,由于进步势力的发展,经过三届选举的斗争,全校学生代表大会主席为郝诒纯;学生自治会干事会主席为邢福津,进步力量掌握了领导权。西南联大名副其实地成为大后方高等学校中的一个“民主堡垒”。

白色恐怖下的隐蔽斗争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联大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利用壁报,大肆污蔑共产党和新四军。为了回击顽固势力,进步的“群声”壁报率先在校园里贴出《皖南事变剪报特辑》,揭露事变真相,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义愤。2月下旬,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康泽杀气腾腾地带着黑名单和举办集中营的计划赶到昆明,准备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学生。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决定将已经暴露的党员和进步骨干撤离学校,疏散到昆明周围的泸西、昭通和滇南个旧一带的地区隐蔽。

袁永熙率领一批党员来到锡都个旧。他以地下党

员办的《曙光日报》社为据点，负责联系疏散的同学和在周围几个县开辟党的工作。邢福津以教师身份隐蔽在蒙自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陈琰在石屏师范学校任教。当康泽的法西斯计划在云南的上层人士和联大常委梅贻琦的抵制下走着落空时，疏散隐蔽的党员和进步骨干却在新的环境里积极开展民众运动。

为了安全起见，省工委根据南方局指示，通知袁永熙等改变方式，利用可靠的社会关系或社会职业，作长期隐蔽的打算，于是袁永熙离开个旧，到四川江津县的白沙，落脚在他的五姐夫国立编译馆的孙国华教授家里。临走前，他到石屏去看望了陈琰，他知道陈琰已经和家庭中断了联系，所以给她留了一笔生活费。在险难的斗争生活中，爱情的种子渐渐在彼此心田中萌芽。

寒假期间，袁永熙到南方局汇报工作。他先通过沈钧儒的侄女沈语和邓颖超接上头，规定暗号，约定时间地点，搭乘邓颖超的汽车进入上清寺50号周公馆。邓颖超是袁在支训训练班期间认识的。一进周公馆，她就问：“小袁，你们隐蔽在哪里呀，我们正找你们哩！”当晚，邓带着袁到红岩村，这时，钱瑛已经在等他们。袁永熙详细地汇报了隐蔽在滇南的党员名单、社会职业。当谈到陈琰时，他说：“她转移到宜良的狗子街农村去了，还没有找到职业。陈布雷正在登报找寻她。”钱瑛说：“知识分子在农村，若没有社会职业掩护，反而容易暴露。”邓颖超说：“还是派人把她找回来，留在她父亲身边可靠。”接着，钱瑛向袁传达了周恩来“勤学、勤业、勤交友”和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的指示，她强调说：形势险恶，要沉着隐蔽，保存力量就是胜利。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言行不要激进，更不要发展党员。形势好转后，组织会和你们联系的。钱大姐还指定一批文件让袁阅读。

初到白沙时，袁永熙化名李义芳，在山区一所中学里教书。从重庆汇报回来后，他转移到国立九中任教。

1944年4月，日寇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千里溃退。9月中，中共代表林伯渠在参政会上提出，要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春城人民纷起响应。双十节时，联大的闻一多、李公朴教授主持召开五千人大会，在《宣言》中呼吁：“坚持抗战，实行民主，结束党治，还政于民。”在日益高涨的民主潮流中，中共南方局通知袁永熙回西南联大复学。

向蒋介石挑战：

制止内战，实施和平

袁永熙返回西南联大时，秘密党员洪季凯和马千禾（马识途）正分头在酝酿成立“民主青年同盟”的组织。1945年1月，经袁永熙汇报云南省工委后，2月召开代

表大会，宣告成立；5月，马千禾组织的“民青”也宣布成立。省工委决定，前者称“民青”第一支部，由袁永熙领导；后者称第二支部，马千禾负责。两者互相平行，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标志着联大进步力量的新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蒋介石逆历史潮流而动蓄意挑起反共内战，在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公开镇压民主运动。

11月25日，联大、云大、中法和英专四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起，在云大的至公堂举行时事晚会。此时云南省省长龙云已被蒋介石胁迫下台，接替他的国民党CC骨干分子李宗黄立即下令禁止“一切集会或游行”，不准云大出借会场。会议只好改在联大新校舍的大草坪举行。会前，袁永熙安排了主席团和纠察队的工作，并请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和潘大逵四教授发表讲演。

李宗黄如临大敌，布置军警特务在会场内外进行捣乱和威胁。他们先是割断电线，使六千多到会的青年陷于一片漆黑中。费孝通激昂地呼喊：“在黑暗中我们更要呼吁和平！”会场镇静，汽灯点燃，演讲继续进行。继而，一个身穿长袍自称是姓王的“老百姓”的家伙，跳上主席台，说什么“中国目前是内乱，不是内战，共产党称兵作乱，政府理当戡乱”。同学们当即递条揭穿，原来这个冒充的“老百姓”是国民党云南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查宗藩，地道的特务分子。纠察队便将查押送出校门。李宗黄的诡计一一破产后，警备司令关麟征命令包围会场的第五军邱清泉部，用机关枪、步枪一齐对空扫射，火红的子弹在学生头上狂飞乱舞。次日中央社编造谎言说什么昨晚西门外“发生匪警”，驻军赶去捕捉，“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云云，竟然称学生为“匪”。这无异是在师生们反法西斯的怒火上浇上一瓢滚油。

28日，经过两天酝酿后，昆明市学联组成由31所大中学校参加的罢课联合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由袁永熙起草的《罢课宣言》，宣布从11月26日起罢课。《宣言》呼吁当局立即制止内战，实施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出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自由。向云南省当局提出四项要求：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取消不准集会游行的禁令；不许逮捕同学；责令制造谎言的中央社道歉。

蒋介石电令李宗黄“以组织对组织，以宣传对宣传，以行动对行动”，于是军警出动，恣意殴打上街宣传的学生，强迫学生“无条件复课”，事态扩大。

好心的教授力劝学生复课。斗争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时刻。当晚戒严，袁永熙冒着危险，到西仓坡教授宿舍找闻一多，恰好民主同盟的吴晗在闻家。

那时中共和“民盟”保持联系的是南方局派来专做上层统战工作的华岗，但在蒋介石袭击龙云后，华已奉

命撤离昆明。“民盟”的同志并不知道袁永熙起草的《罢课宣言》中的主张和要求是经南方局同意的。袁永熙婉转向吴晗和闻一多说明这些情况后说：“罢课刚刚开始，学生的要求一条也没有实现，此时若无条件复课，无异示弱于暴力，不但学生难以接受，对整个斗争也不利。希望老师们理解。”又说：“为了避免损失，我们可以劝说同学在校内活动，停止街头宣传。”

商谈以后，联大教授会、“民盟”云南支部立即向当局抗议，支持学生罢课。

12月1日，丧心病狂的李宗黄，竟命令党徒携带凶器，分头闯入联大、云大、中法大学和联大附中、南菁中学等，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大打出手。南菁中学教师于再被手榴弹炸死于联大新校舍门前，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和昆华工校的张华昌也在手榴弹爆炸声中倒入血泊，另有25人重伤，30多人负轻伤。

惨案发生后，袁永熙和省工委书记郑伯克商定：抓住时机，组织反攻。一是编印《一二·一惨案实录》、告全国同胞、告师长、告家长及《向昆明父老沉痛呼吁》等公开书，广为散发；二是公祭被难的四烈士，在联大图书馆设置灵堂，接待社会各界前来吊唁；三是出版《罢委会通讯》，派人去重庆串联。一时间，昆明大中学教师罢教，市民沸腾，谴责国民党当局，声援学生的舆论遍于全国。

色厉内荏的蒋介石力图平息事态，授意关麟征假惺惺地向学生“道歉”，并“缉凶慰抚”，以求补救——无非是处理几个“替罪羊”，拿出一点法币来搪塞学生。罢委会断然拒绝，并在12月6日第二次《告全国同胞书》中要求：严惩主谋凶犯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负担死伤同学的丧葬、抚恤和医疗费；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等。第二天，蒋介石不得不宣布“将关（麟征）停职，听候议处”，授意新上任的省主席卢汉和教育部长朱经农，会同联大等四校校长，和罢联代表谈判复课。斗争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谈判中，卢汉答应解决丧葬、抚恤、医疗及赔偿等要求，“唯惩凶须国民党中央处理”。这时，罢课已半个月，为了保护同学的斗争热情，中立地方实力派卢汉，袁永熙和郑伯克审时度势，决定由联大自治会提出“停灵复课”的建议，先决条件是惩办主谋凶犯，废除集会游行的禁令，中央社向学生道歉。1946年1月18日晚，袁永熙再度造访闻一多教授，请他将“停灵复课”的方案向教授会和联大常委梅贻琦转达。闻一多和梅贻琦交谈四个小时后，梅便出面主持联大教授会议，逐条讨论自治会的建议，并作出相应决议。

1月24日，当梅贻琦等在记者招待会上报告事实真相，联大教授会发出对李宗黄、关麟征的两份《告诉状》时，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主任李宗黄在万众声讨中逃离昆明。三天后，昆明44所大中学校学生一律复课，教

师复教，《罢委会通讯》在终刊社论中宣布：“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抗暴”的遭遇战到 “五二〇”的主动出击

新的斗争等待着袁永熙。

1946年2月，袁永熙来到红岩村中共办事处。钱瑛高度评价西南联大的党组织在“一二·一”运动中广泛团结群众、敢于和蒋介石斗争、适时收兵的成功经验。她同时指出：群众运动中的口号分两类，一类是宣传性的，一类是行动性的。“长期罢课”，即使作为宣传口号也是不妥当的，因为事实上做不到，反而脱离群众，孤立自己。你们后来很策略地提出“停灵复课”是正确的。

当时，国民政府正准备还都南京，中共办事处也将迁到南京。西南联大决定5月复员，钱瑛布置袁永熙速回昆明，率领五十多党员、一百五十多“民青”成员返回平津。最后，她关切地问到他和陈琏的关系，并告诉他陈琏现在中央大学，要袁去看看她。袁永熙这才来到沙坪坝中央大学。嘉陵江畔，一对恋人倾诉着衷情。行色匆匆中，他们互相叮咛，互相祝福。别后，陈琏随家庭复员南京，袁永熙肩负重任，奔向古都北平。

阔别八年的北平笼罩在全面内战的氛围中，日本战俘正被分批遣送回国，代之而来的是助蒋内战的十一万余的驻华美军，其中有5万余海军陆战队官兵驻扎在平津地区。他们横行不法，1946年9月至11月三个月内，残害中国民众的暴行就有32起，死伤40人。民众的愤怒烈火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根据南方局的指示，复员到北平的党员转地不转组织关系，原有的两个党支部继续由南方局（后来是上海局）直接联系。到北平后，袁永熙即和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余涤清取得联系，双方确定指导北京学生运动的党组织，独立行动，不发生横的关系，在斗争中互相配合。前者称南系，由袁永熙和王汉斌领导，后者称为北系。从此，袁永熙以金城银行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和北系领导人一起，分头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陈琏也转移到了北平以贝满女中教员的身份，在袁永熙的领导下负责职业青年的工作。

12月24日晚，两名美国兵强奸了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学生沈崇。30日，清华、燕京的学生结队进城，和城内的北大等校的同学会合，在抗议美军暴行的口号下形成了上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影响所及，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愤起响应者达五十多万人，打响了内战爆发后蒋管区学生大规模反美反蒋的第一炮。

抗暴运动告一段落，袁永熙第一次来到上海向钱瑛汇报。此时，中共上海办事处已经撤返延安，钱瑛化名

陈苹,打扮成一个家庭妇女模样,隐蔽在一幢普通的弄堂房子里。她满意地对袁说:“北平的斗争发展这么快,规模这么大,我们事先没有估计到。你们的做法符合速战速决的策略。”接着她指出:“现在看,蒋管区学运的高潮已经到来,今后要配合和支援解放战争,积极主动地组织斗争。”

如果说,抗暴运动是一场遭遇战,那么红五月的斗争是中共上海局请示中共中央后的主动出击。临战之前,袁永熙再次来到上海。钱大姐向他传达了上海局的部署。4月底的一日,钱瑛带着袁永熙到南京路的先施公司,在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按约定的联络暗号和中共上海局书记刘晓接上头,然后,袁和刘登上一辆三轮车,进入一个弄堂房子的阁楼里。这时,上海局负责学运的吴学谦、张本已经先期到达。双方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商定了斗争步骤。袁永熙离开上海时,钱大姐关切地说:“你和陈琏相爱多年,该结婚了,婚后,有陈布雷的社会关系作掩护,更有利于隐蔽。”

红五月的斗争是从纪念“五·四”开始的。这天上海各校学生与市民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此后,学生的反饥饿斗争与工人阶级要求改善待遇、反对国民党政府冻结工资的斗争相汇合,于是八千多工人和学生包围上海市政府,公共汽车和电车工人二千多人,丝织厂工人一万五千多人游行示威;10日百货公司职工也走上街头。

5月18日,北平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宣传队走上街头,警备司令部调动青年军二〇八师的人员冲击宣传队,殴打学生,酿成“五·一八”血案。当晚,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联合天津的南开、北洋,唐山的交大召开紧急代表会议,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委员会”,决定20日在平津两市同时举行示威游行。

5月20日,在国民党的心脏南京,宁、沪、苏、杭的学生六千多人向国民党参政会请愿,被国民党的军警和骑兵团殴打五十多人;天津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等的游行队伍同样遭到殴打。北平的学生队伍一万五千多人,从沙滩北大的红楼广场出发,冲破了特务的阻挠,游行示威,历时五个半小时,安全返回红楼广场。这时群情激昂,“反饥饿反内战联合委员会”主席团在同学们的临时动议下,把红楼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同时宣布6月2日为“全国反内战日”,要求发动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的“四罢”斗争,在匆忙中表决通过。

袁永熙、王汉斌等南系学委当即和北系学委的负责人紧急会商,一致认为“四罢”的决定不够慎重,不够策略。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于实施,而且使敌人预作准备,可能造成损失。双方决定本着保护同学的斗争热情、避免损失的原则,说服同学,修正临时动议。改定6月1日举行“民主广场”命名典礼,6月2日在各校校内

分散集会活动。

6月2日,北平城内一片恐怖,北大、清华、燕京、中法各学校四周,军警林立,机关枪口对准学校大门。但是,学生们却在华北学联主持下,在“民主广场”召开追悼被国民党杀害的闻一多、李公朴和“一二·一”运动中殉难的四烈士大会,巧妙地避免了敌人的屠杀。

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山东战场上解放军在孟良崮全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在西北战场上,解放军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连捷,把进攻延安的胡宗南部拖得精疲力尽;而刘邓大军即将千里跃进,挺进中原;东北的民主联军已逼近长春,四平旦夕可下。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6月上旬,袁永熙第三次来到上海。上海局成立了以钱瑛为首的蒋管区学生运动领导小组,成员有朱语今、吴学谦、袁永熙、王汉斌、赖卫民、洪德铭(季凯)等,这是“第二条战线”党的领导核心。

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

1947年8月,北平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礼堂里张灯结彩,乐队奏起“花好月圆”的流行歌曲,袁永熙和陈琏这一对“归附于革命阶级”的恋人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前来道贺的是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帖的国民党北平市党政军要员,证婚人是北平市长何思源。在蒋介石颁布《戡乱总动员令》一个月之后,两个共产党员穿起结婚礼服,大摇大摆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生活的复杂性真个耐人寻味!

袁永熙和陈琏本来不乐意接受如此排场,但是,代表乃兄陈布雷从上海赶来主持婚礼的陈训念,一面对侄女说:“不要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可你是陈布雷的女儿,你姐姐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孔祥熙院长还亲自来道贺哩!”而中共上海局的钱瑛,在袁永熙离开上海时,也关照他说:“婚礼要办得体面些,因为这是陈布雷嫁女儿,有了这层社会关系,更有利于你们安全隐蔽。”钱瑛还陪同袁永熙到上海的四大公司选购结婚用品。同时,她语重心长地叮嘱袁永熙说:“共产党员要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保持革命气节,头可断,革命意志不能动摇。倘若被敌人逮捕,不得暴露政治身份,不能出卖同志和党的机密。”这位久经考验的大姐,在袁永熙面前从来不讲个人的经历,这次例外告诉袁说,1931年她的丈夫谭寿林被蒋介石惨杀于南京雨花台。两年后,因叛徒出

卖,她不幸被捕;从法庭申辩到狱中绝食,敌人软硬兼施,她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经周恩来交涉,才结束了四年多的囹圄生活,回到党的怀抱。

袁永熙心里非常明白,钱大姐谈自己的经历,既表现了大姐对他的信任,更反映了对他的期望。

这时,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揭开序幕。前方战事吃紧,蒋介石对后方的防犯日益严密。8月底,临近中秋的一个夜晚,北平东城棉花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袁永熙正在和职业青年支部的邢福津、陈琰开会;清华大学的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也来向袁汇报发展“民主青年联盟”的工作。突然,自称是北平行辕派来的人,紧敲袁宅大门,说一定要见袁永熙。袁让陈琰前去应付,自己返身回屋,立即把自己手头的和等候在另室的陈彰远手里的《民主青年联盟章程》收藏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几个特务已经闯进门来。

袁永熙挺身而出,应对来人。邢福津、陈彰远都说自己是大学生,糟糕的是油印的《民主青年联盟章程》被特务搜了出来,特务将袁永熙夫妇连同邢、陈共四人,押进两辆美国吉普车,当晚关入炮局的囚房。

接着,特务又守在袁宅逮捕了北大的吴漠、力易周,燕京的龚理康等同学。消息传开后,北大、清华、燕京的学生立即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学生。正在这期间,蒋介石夫妇为挽救华北和东北的军事危局,从南京飞到北平转向沈阳。蒋生怕事态蔓延扩大,影响后方秩序,不得不释放部分被捕的学生,邢福津和陈彰远等得以在被押五天后安然出狱。没有学生身份的袁永熙夫妇,却仍被关押审讯。

袁永熙夫妇被捕实属偶然。原来他们结婚时,陈琰的同事、贝满女中的教师田冲前来贺喜,素不相识的袁永熙和田交换了一张名片。8月下旬,地下党情报系统的秘密电台遭敌人破坏,田冲的朋友、报务员李政宜被捕叛变,田因此受牵连。敌人从田身上搜出了袁的名片,按图索骥,才前来逮捕袁永熙夫妇。党的情报电台被破坏,惊动了正在转战陕北的中共中央,周恩来和任弼时立即布置情报电台,改变电讯密码。但令人纳闷的是,情报系统和学运系统的组织关系是严格分开的,敌人为什么“捕去学运小袁夫妇”呢?中央一面急电在上海的钱瑛立即撤往香港,一面致电晋察冀城工部和中央青委冯文彬,利用关系“追查此类破坏真相,并研究有无营救可能和办法”。

在押的袁永熙夫妇,正在和敌人作艰苦的斗争。特务们力图追查袁永熙和报务员李政宜的关系,袁永熙说:“我根本不认识他。”追问他和田冲的关系,袁说和他只交换过一张名片。

特务指着在袁家搜出的油印文件,逼问他由谁介绍加入“民青”,当时进步青年的群众组织遍于北平各大

学,北大有:“进步青年联盟”、“中国革命青年联盟”,清华有“中华民主青年联盟”,但袁永熙为不牵连别人,便灵机一动说是闻一多教授介绍的。而特务们都知道闻一多早在一年多前在昆明被他们暗杀了。

特务对袁永熙动刑,他们先用香烟火烧袁永熙的皮肤,再用鞭打和用竹板夹手指,袁永熙咬紧牙关,忍受着剧痛,几度昏厥。他牢记钱大姐的嘱咐严守秘密,绝不动摇。

保密局的特务束手无策。既打不出袁永熙和秘密电台的联系,又没有证据确定袁的共产党员身份,考虑到他是陈布雷的女婿,“投鼠忌器”,只好向上司提出两条建议,一是送青年集中营感化,二是交军法处审理。11月29日,袁永熙、陈琰等23人,被押上飞机,送到南京,关入宁海路19号保密局的看守所。

不久,蒋介石发话让陈布雷“把女儿领出来严加管教”,袁永熙仍关押在保密局。一日,一个特务手持一沓印好的《悔过书》发给在押人员填写。上面的文字是“余受共产党煽惑,误入歧途,为奸工作,危害民国,愿悔过自新……”,接着一个自称是当年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生的家伙,假惺惺地对袁说:“我年轻时也信仰过马列主义,后来阅历增加,方知马列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知识分子是个信仰问题,你只要在上面签个字,办个手续,保证你没有事。”

袁永熙明白无误地表示:“我没有误入歧途,也没有受人煽惑,我无过可悔,我不签名。”

后来,还是难友梁嵩然,这位隐蔽在北平市政府的秘密党员,老练沉着,他对袁说:“既然我们没有误入歧途,那就在这些字句前面一律添上‘并未’两字,这样就改变了《悔过书》的性质,又不激怒他们。”袁永熙认为有道理,于是照此办理。不久就被转押到南京陆军监狱。1948年5月28日,由陈布雷和袁永熙的姐夫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出面,将袁永熙保释出狱。

袁永熙出狱后,在上海和陈琰劫后重逢,不久,陈布雷为他们在南京找了“差事”,学经济的袁永熙到中央信托局,陈琰在国立编译馆。在上海期间,陈琰的表妹,秘密党员郁文来看望他们,陈琰向她表示:“有没有办法到那边去?”“那边”指解放区。郁文心领神会,向党组织反映了陈琰和袁永熙的愿望。上海地下党的领导知道袁永熙夫妇的情况,要郁文继续保持联系,寻求适当的机会护送他们进解放区。

这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淮海大战方酣。国民党大势已去。陈布雷“目睹耳闻,饱受刺激”。于12日晚服安眠药为主子“殉节”了。郁文当即抓住吊唁舅父的机会,赶到南京,在灵堂一角,通知陈琰夫妇作好一切准备。南京的追悼活动结束后,袁永熙夫妇利用送灵柩去杭州安葬的机会,摆脱特务的监视,由郁文陪同在

地下交通的护送下，化装登上沪宁列车，在镇江渡过长江，兼程北上到山东兖州中共中央华东局所在地。经华东局与中央联系后，袁永熙夫妇奔向解放了的北平，迎接他们不顾安危为之奋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度尽劫波意犹坚 青史千古明泾渭

回到已经解放了的北平，从事秘密工作11年的袁永熙却遇到了麻烦。

由于袁永熙曾被捕入狱，组织上审查他在狱中的表现，这是完全正常的。袁永熙如实地向党作了交代。只是因为出狱前填悔过书一节，中央青委审查后认为，可以恢复党籍，但要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而主管部门把问题看得更重，认为他“政治动摇，不敢坚持真理而向敌人屈服，丧失党员气节”，决定开除其党籍后，批准他重新入党。

这个处理，无疑否定了袁永熙那十多年来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英勇奋斗的历史。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14届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香山接见学生代表，曾经战斗在“第二条战线”前沿阵地的袁永熙，却因不符合条件而失去了被接见的资格。

此后，袁永熙被分配在中央学生部任秘书长、副部长。1954年，调任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但两年后，又因“政治条件不合格”，免去第一书记职务，改任校长助理。

袁永熙又委屈又不解。他在狱中八个月，没有在敌人面前承认是共产党员，没有暴露组织，没有泄露领导他的和在他领导下的任何一个党员的身份。正因此，和他同时被捕的职业青年支部的委员邢福津、陈珪，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陈彰远，以及和他并肩战斗的南系学生领导人之一王汉斌等，得到了保护，避免了一场灾难。袁永熙和那些已经暴露了共产党员身份，在法庭上痛斥敌人，在刑场上高呼革命口号的烈士不同，在始终隐蔽着自己政治身份的情况下，他没有权利也不应该用激烈的言词和敌人舌战，因此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他可能在不损害党的原则下，去应付敌人。固然他在敌人的《悔过书》上签了字，但在悔过书的关键句子前面，都加了“并未”二字，使“余受共产党煽惑，误入歧途，为奸工作，危害民国”，成了“余并未受共产党煽惑，并未误入歧途，并未为奸工作……”。

更为严重的是，1957年袁永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并且在“左”的“唯成分论”的推论下为“阶级异己分子”，再次被开除党籍。在政治的压力下，家庭解体，陈珪被迫和他离婚，袁永熙只身下放到京郊南苑生产队接

受劳动改造，以繁重的劳动“清洗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1962年5月，摘掉“右派”帽子的袁永熙，被遣送出北京到河北南宫县中学教书。1965年10月，南宫中学32岁的化学教师张兰芬和逆境中的袁永熙结合。但是半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革”席卷全国。袁永熙自然成了全县瞩目的“黑线”人物，什么“刘少奇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袁世凯的孝子贤孙”等等，从灵魂到皮肉，饱受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唯一能给他一点安慰和照料的是甘愿和他共患难的爱人张兰芬。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强调：“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在为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同志提议纠正对薄一波等61人的错误结论时指出：应当承认1937年7月7日中组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同志经过审查可以恢复党籍的决定。陈云说：“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这对党内党外都有极大的影响，不解决这些同志的问题，是很不得人心的。”于是，寒冬过去，大地复苏。

1979年2月，清华大学党委复查了袁永熙的“右派”问题，结论宣布：“袁永熙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撤销原开除党籍的决定，在原决定中关于袁永熙同志阶级异己分子的结论是错误的，也予以撤销，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和原来的工资待遇。一年半以后，共青团中央机关党委办公室上报中，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的复查意见中确认袁永熙的被捕及狱中表现，“经多次审查，没有发现新问题”；在狱中“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保护了同时被捕的同志，保守了党的组织秘密，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品质”，出狱以后，袁“积极找党，当即向党作了彻底交代，没有隐瞒，表现出他对党的忠诚”。因此，32年前主管领导部门对袁永熙的处理意见“是不妥的”，建议予以撤销。1980年10月13日，中央组织部复函“同意”团中央机关党委的复查意见，“恢复袁永熙同志的党籍”，撤销当年“不妥当”的意见。

1982年，行年六十有五，垂垂老矣的袁永熙被任命为原北京经济学院院长，并且先后被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第七届委员。

曲折的历史，给袁永熙带来不寻常的遭遇，这是很不幸的；幸而雨过天晴，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恢复，历史终于还给他一个公正。袁永熙回顾他曲折的遭遇时说：“这更加坚定了我对党的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的信念”，可惜的是“失去了为党和人民做更多工作的宝贵时间和机会”。
(责任编辑 洛松)

梁实秋之女

梁文茜的昨天和今天

● 杨小武

1948年的冬天，窗外飘着大雪。

北平东城内务部街一个大四合院的书房里，半夜还亮着灯光。梁实秋先生和自己心爱的大女儿梁文茜在灯下长谈。父亲耐心劝导，女儿理直气壮，谁也没有说服谁。

梁实秋又一次耐心地说：

“茜儿，共产党就要进北平了，国内形势很紧迫，我们不宜在这里长期居住，我和你母亲商定，全家到海外去生活……”

梁文茜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学生。她天性活泼开朗，爱说好动，极富口才表达能力。在大学里，她是个多才多艺的高才生，不仅学习优秀，而且踊跃参加学校组织的诗歌朗诵、歌咏、演讲、跳舞、游泳、划船、演戏等各类文体活动，她的名字常在获奖者的前三名之列。

1948年11月下旬，我们的民族已是“百载沉痾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

文茜的个性、知识和见解早已使其父亲觉得有说服她的难度。尽管文茜当时不可能象父亲对形势有明晰的判断，但她的人生信念已有根本的转变。1946年她耳闻了闻一多先生被暗杀和沈崇被美兵强奸而犯罪者在中国本土上逍遥法外的事件，使她对现实极为不满，认识到国民党的虚伪、腐败和无能。1947年，她参加了学校中的进步戏剧活动，并主演了抨击现实的话剧《升官图》和《万世师表》，积极



梁文茜女士

投入革命洪流，把拯救祖国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坚定的人生信念。

然而父亲的打算与她的思想格外抵触，使做女儿的十分为难。但她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信念，使得一直亲热的父女关系，因走与留的问题平添不尽的波澜。

面对这个难题，父女俩讨论过十多次了，最后，文茜毫不动摇地说，“爸爸，如果你们要走就走，我得留下来读书。”

梁先生说：“现在走与留关系到你将来的前程和生活。”

“北京大学是人们渴望的最高学府，我是在父亲的支持下才考取的，现在学业未完，走了再到哪儿去继续学业呢？”文茜以学业为由抵制父亲的观点。

梁先生最关心的是女儿将来的生活，苦口婆心地对女儿说，“你如果不走将来会吃亏上当的，这是主要的；至于念书，总还是有办法的，到了外面也可以找个学上，自学也可以嘛。”

“我不愿放弃已拥有的北京大学，这里是一片青年的热土。现在北大的学生运动日益高涨，许多爱国的教授、学生都积极参加，而眼下我又怎能抛弃这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运动呢？”

面对女儿的爱国之情，梁先生认为“到海外也是爱国，也能为祖国做事”。小文茜则认为“爱国更应现实。”父女俩的意见仍未取得一致。休息片刻，梁实秋又再三对女儿说，现在世面很乱，我和你母亲都走了，谁来管你呢？和亲人在一起，再苦再累也有温暖，况且到了海外，生活也不错，为何非要自找苦吃呢？”这是采桑喂蚕捕食喂燕般的人间父情。

梁文茜仍耐心地对父亲说，“北平可能会和平解放，新的生活在等待着我，父亲怎么肯定我将来会吃亏上当呢？你们走了，几年后我们也会见面的。抗战也不过八年，内战定会结束，到那时，我再到你们身边去也不迟，这样我们也都如愿以偿……”

梁先生无可奈何，最后也认为女儿的选择不无道理，只好让步，放弃了带文茜走的念头。

梁文茜在回忆那时与父亲争执的情景时说，“我们父女俩十余天闹的不合，但很快就和好了，主要得益于父亲开放民主，他平常也很尊重儿女的意见，从不训斥，也不强迫我们做事，父亲的民主使我在北京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

1948年12月13日清晨，梁文茜送父亲和弟妹穿过隆隆的枪炮声，伴着呼啸的北风，来到荒乱萧条的前门火车站，与亲人依依惜别（她母亲因清理东西三天后才走，当时火车已不通行，只得从东单乘飞机到上海然后到广州与梁先生会合）。弟妹从窗户探出头来，泪水涟涟地叫着“姐姐多保重”。而梁文茜已挥泪如雨，火车启动的一瞬间，她倏地想起父亲有胃病，而又嗜酒，便含泪追逐着火车对父亲说，“您有胃病，再



1982年6月，梁实秋与
长女梁文茜合影于西雅图华
盛顿大学

不要喝酒。”

“我知……道……了……”梁先生哽咽了。

父亲的声音常回响在女儿的耳畔，呼唤着父女俩新的团聚。没想到这父女俩一别就是34年，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在美国西雅图会面。父亲兴奋地对文茜说，“我那时就记住了你的话，至今没有饮酒，胃病也好了。”

坚心守志十余年

1950年，梁文茜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配至华北文工团工作。他虽爱文艺，但更愿学以致用，以所学专业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于是她找到父亲的老朋友、司法部部长史良相助，调至当时司法部试办的全国第一个基层法院——北京市第一区人民法院任见习审判员。在仅有8人的法院里，她积极肯干，工作得心应手，白天在外调查、取证、调解，晚上整材料、写判决书，干得十分卖力。至1956年调至司法局三处筹建我国第一个律师学会止，已办案千余件，她的愿望是将来当一名出色的律师。

正当她满怀信心地独立生活时，爱神来到了她的面前，一位英俊、诚实、正直的同志走进了她的世界，他就是法院的党委书记王立。他俩朝夕相处，在工作中产生了爱情，共同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

当时的王立颇有勇气，曾有人多次劝告他不要与梁文茜发展爱情关系，告诫他如果同梁文茜恋爱结婚，将断送其前程。但王立对文茜的爱情忠贞不渝，从不动摇自己的爱心。然而现实却异常残酷，就在他们结婚的当天，上级以“王立不听组织劝告、坚持同‘反动文人’梁实秋的女儿结婚”为由，给他严厉的处分。新婚夫妇面对现实，没有流泪，没有后悔。他俩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他俩相爱，他俩更珍惜自己的幸福，更加互励互勉，营造自己的家园。

1957年，梁文茜被错划成“右派”，离开法律岗位，先下放到北京昌平劳动，后调任区房管局做租金统计工作。检查写了一本又一本，大

小批斗会一个接着一个，诽谤诬陷却不容申辩。文茜是法律意识强烈的大学生，她懂得人格的尊严。现实愈残酷，她愈坚心守志，无论道路多么坎坷，决不可矢志沉沦，如果矢志沉沦等于雪上加霜，自造重负。她工作不怕苦和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事事先行一步，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她干租金统计3年，3年获流动优胜红旗。但由于她是“反动文人”梁实秋的女儿，又不得不继续批斗、审查、改造……

3年后，她被发配至丈夫的家乡河北安国县长期劳动改造。她认为丈夫的家乡也是她的家乡，那里的一切都与她有亲近之缘，她热爱安国的物，安国的人。看到农村的姐妹没有文化，她偷偷教她们识字。派她喂猪，她便喂猪，叫她牧羊，她便牧羊，奇怪的是，那些别人喂养得又瘦又弱的牲畜，经她喂养后，变得膘肥体壮，毛顺溜油。后来人们才知她偷偷钻研了饲养理论和兽医学。她心灵手巧，做事麻利，插秧也快，几次参加插秧能手竞赛……她以行动赢得农民兄弟的好评，得到他们的信任。

靓丽风景浴晚年

1982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她又回到法律工作岗位。“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她鼓起了事业的风帆。

十年动乱，中国社会到了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的混乱地步。梁文茜认为，文明进步的社会必是法制健全的社会。中国社会要发展、振兴，法制建设应有相应的发展与振兴，那么律师必有用武之地。于是，她白手起家，创办了面向海内外的北京市四海律师事务所。

一时间，她声誉鹊起，繁忙不迭，几十年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愿望得以实现。有位台湾商人来北京投资建一餐厅，经营后以40万元成交给北京的一个经营者，但买主不守信用，长期拖款不付，台商很发怵，对赖主又无可奈何。后来他经人介绍找到四海律师事务所，向梁文茜律师细说详情。梁律师立即立案调查，很快调

解让买主退了餐厅并赔一年损失费。台商得以重新将餐厅成交成功。由于梁文茜办案公正,这位台商对在大陆投资解除了顾虑,继续在浙江、福建投资,那台商已在南方扎下根,扩大了“根据地”,经常给梁律师打来电话互通信息。

至今,四海律师事务所已为海内外当事人办理民、刑事和经济案件 1200 余宗,受到当事人的普遍欢迎。一个称职的律师所付出的心血是巨大的,她往往既是办案律师又是法律、经济、经贸等知识的宣传者。有家中外合资企业,因合作不理想,中方退出了合作。外方请梁律师立案,要求中方赔偿违约金 1000 多万。梁律师分析了双方所持的合同,发现该合同不受法律保护。我国有明文规定,凡在中国的中外合作的合同,必须得到国家经贸部批准,方可有效。而这份违约案合同恰恰未经经贸部批准。她帮助中方挽回了 1000 多万元的损失,这是侥幸的。如果外方违约又该如何呢?类似这样常识性的案件还很多。梁律师呼吁海内外人士在文明进步的时代,应全面掌握法律、经济、经贸等基本知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梁文茜律师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分管法制工作。她为普法执法默默奉献,常常义务为他人咨询、代理,以法育心、仗义执言。近年市民财产如自行车等财物被盗严重,她组织人员专门调查研究,向市政府提出了许多可行性建议。去年她牵头搞了一项“百案调查”对犯法的嫌疑犯、在逃犯,详摸细查,嗣后向市委递交建议报告,有力地支持了今年的严打工作。今年又被评为十佳律师,被推荐担任了仲裁员,在政法战线上发挥她的才能。

终圆亲人团聚梦

多少年来,梁文茜很思念父母,她的父母也在千方百计地打探她的消息。

“文革”后期,美国有一考察团来北京,团里有一位她父亲的朋友,梁先生托朋友找到梁文茜,这时梁文茜才知父母和弟弟都在台湾,妹妹

在美国西雅图一所大学营养系任教,她多年飞翔的思念终于有了定位。

事过不久,“文革”结束了,她开始秘密与妹妹并通过妹妹与父亲通信,禀告她的情况。

为什么要秘密通信呢?梁文茜说:

“我‘文革’挨整,就因为我是‘反动文人’梁实秋的女儿。当时组织上还不知道我父母及弟妹在何方,也从未提过我海外关系的联系,如果知道,我更是雪上加霜,在劫难逃。”她露着侥幸的喜悦说,“动乱结束时,海外关系仍很敏感,只能与亲人保持秘密联系。”

文茜欣喜地把她的家庭情况告知父母。

她有个温暖的家。丈夫因她受牵连而无境地挨批斗,审查,但他从未动摇对梁文茜的爱心。她受难时,王立曾多次抱病偷偷到家乡探望。而文茜也在 1971 年冒着风险偷偷回城照顾瘫痪的丈夫。夫妻俩蕙兰情性,相濡以沫。她的三个儿女极尽孝道,下乡期间省吃俭用,竭力支持落难的妈妈,回城后不没勤学家风,自学成为律师、高级工程师。为她平添慰藉……

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政策宽泛了,她和父亲相约于 1982 年夏天在西雅图妹妹家中会面,圆了父女团聚之梦。那情那景使她永志难忘。离别时的痛苦和相见时的喜悦交织在一起,使父女俩几天兴奋不已,相互倾诉着真诚、挚爱、亲情,充分享受天伦之乐。

当她与父亲惜别时,梁先生送女儿至飞机的舷梯旁,来不及更长的话别,父女只有最诚意的祝福。在飞机起飞的一瞬间,父亲对女儿说,“文茜,保重、保重……”

这是梁文茜最后听到的父亲的声音。

梁先生逝世后,文茜时常掬泪尽哀。为缅怀父亲,她收藏了父亲的著作和一些关于父亲的文章,她喜欢父亲温情、淡雅、优美的散文,尤其是他在《槐园忆梦》里对他们见面和她母亲的记述,使她终身难忘,她为父亲对祖国文化所做的贡献而感到自豪。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居官之箴规

察官之明鉴

● 李文林

在炎黄文化的百花园里，箴铭之作犹如一朵很不起眼的小葩。它多不过百八十字，少只有三言五语，然而却语多精辟，其于人熏陶海诫之功，有时不在宏文大作之下。在此，让我们赏析一则明代的官箴：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这则官箴，言约而意深，道出了做官的要领，为明清两代的居官者传诵，甚至勒石于署，自儆且儆人。据说，1990年李瑞环同志在陕西视察时，讲到廉政问题，曾引用了它。现在西安碑林的第五室，有此官箴刻石；河北省无极县县委大院里，亦有此官箴刻石。随着党的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发展，这则官箴的传布越来越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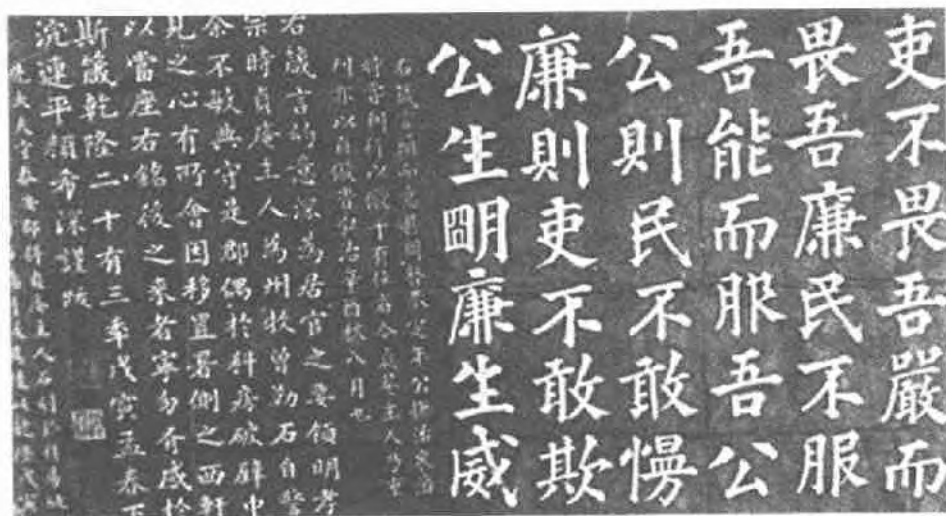
箴言源自曹端答郭晟问政

首先说，这几句箴言究竟出自何人？出自明代的曹端。《明史·曹端传》有：“知府郭晟问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

曹端的父亲本是山西霍州曲沃县人，后来迁到了河南滎池县，故《山西通志》及山西《霍州直隶州志》（道光本）与《新修曲沃县志》（乾隆本）均有曹端的传记。霍州、曲沃两志中之《曹月川先生传》所载曹端答郭晟问政之言为：“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欺，公则民不敢犯。其公廉乎！”

曹端（1376—1434）。他自中举人后，先任山西霍州学正九年，后任蒲州学正四年，最后又返回霍州做学正，一做又是九年。

曹端学宗朱熹，务重实践，不信佛老，不迷信鬼神。他不仅学术纯高，而且品行卓异，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经师人师，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他一生授徒甚多，其门生不仅仅是山西人，“秦、蜀、齐、鲁、燕、赵之士从至数百人，以文行科名显者甚多。”



西安碑林官箴刻石

曹端一学生郭晟(霍州人)于永乐十二年中举人后,授西安同知,赴任前,拜别恩师,并请教为政之道,曹端的回答,就是这则流传至今而被奉为官箴的不朽之言。

明清时代的“吏”

搞不清明清时代官与吏的区别,尤其是不了解明清时代吏这一阶层的特殊情况,对箴言中之“廉则吏不敢欺”等三句就一定是似懂非懂。因此,在解释箴言之前,先得说一说明清时代的“吏”。

对今天的人来说,“官”也罢,“吏”也罢,“官吏”也罢,无非是一个意思,即都指的是古代当官的人。但是,在历史上,“官”与“吏”却经历了一个由同而异的演变过程。汉代以前,“官”与“吏”没有区别,“吏”即百官之通称。从汉代起,才将俸禄在400石以下的卑秩小官称作“吏”,也就是说,“吏”与“官”开始有了点区别,即“吏”变成低级官员的别称。不过,汉代择官注重才能,由吏而晋为高官者屡见不鲜,如位至丞相的于定国、公孙宏皆起家于狱吏,京兆尹赵广汉也是出身于小吏。汉以后,吏的地位逐渐下跌,在升迁拔擢上越来越受到限制。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了九品中正制度,择官重家世,故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状况,为吏者绝难升迁。隋唐实行科举取士制度,于是,“士有爵禄”,而“吏无荣进”。迨及明清两代,官与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途,吏已经不属于官的范畴了。

明清时代的吏,其待遇极其微薄,更极少有升迁荣进的希望。但是,他们却执掌着衙门中簿书、钱谷、刑名等具体事务,如库吏掌管着府堂财物,典史掌管着文牒档案,都吏(即古代的胥)领导着隶卒。官箴中所说的吏,就是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个阶层。

吏的这种处境,决定了他们贪婪狡猾的本性。手掌衙门中具体业务,待遇却极微薄,势必要千方百计中饱私囊。吏作奸犯科,相沿成习,但知图利,不计是非。他们假借官威,恐吓乡民,逛捏惊诧,乘危索骗。曾有人说,一旦为吏,“其处心积虑,大约与屠业者相似”。说得够形象的了。

明清时的官,多是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故多不熟悉簿书、钱谷等细事,再加上异地做官,难以一下就熟悉治下的风土人情,而等到快要熟悉了的时候,也许又调往他处了。吏呢,都是些当地人,甚至一辈子混迹衙门。衙门之内,官少而吏多,官暂而吏久,所以,当官的每好依赖于吏,轻信吏言,而凡事一经吏手,几乎无不作弊,当官的常被吏欺而不觉,更有生死曲折不操之于官,而操之于吏的现象。明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即有“随你官清似水,难逃吏猾如油”的话,由这两句话也可看出官与吏的区别,也可以看出吏是十分狡猾贪婪的。所

以,古人说,“吏安则民自安”,是不无道理的。

曹端箴言释义

曹端答郭晟问政,就是站在为官者的立场上,首先告诫他应该如何御吏的。

吏,固然是一些任官驱使的人,善于逢迎媚上的人,但同时又是一些最会窥测长官私弊,以为挟制把持之计的猾贼。为官者若不警惕这一点,一定要上大当,吃大亏。南宋吕本中在《舍人官箴》中说:“后生少年乍到官守,多为猾吏所饵,不自省察,所得毫末,则一任之间,不复敢举动”,实在是经验之谈。新官上任,颇有抱负,但缺乏从政经验,他们虽怀从严治吏之志,却不懂御史的关键却在一个“廉”字,一时不慎,于不知不觉中陷身于不廉,授吏以把柄,必致心虚而畏吏,难展其初衷。不仅如此,吏一旦捉住了官的私弊,一定要进一步借官以谋私,他们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到头来,当官的落得个为吏左右的下场。清人陈宏谋说:“胥吏剥民之术,惟愿官之多欲而尚刻。一中其计,予取予求,无如其志矣。”所以,居官者要整治好那班贪婪的猾吏,唯一的办法是依靠自身的廉洁,以廉律己,以廉御吏。对于一心谋贪的吏来说,最怕的是一尘不染的清官,因为清官嫉贪如仇,使他们无机可乘,无柄可捉。因此,当官的自身的廉洁便是最大的威严,若自身不廉,何严之有?所以,曹端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廉则吏不敢欺”。

曹端跟郭晟讲了以廉御吏的从政之道后,接着又讲以公服民的从政之道。以廉御吏,是为了整顿衙门,以便有一个廉洁奉公的办事机构。以公服民,则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戴,创造一方和平安定的环境。

官者,百姓之悬命也。当官就要为老百姓作主,为老百姓办事,特别是被百姓称作父母官的府、州、县官,更是民生休戚所系。但是,百姓看重于官的,主要是公正无私的品德,而不是才干能力的大小。如果有才而缺德,不以政平讼理为务,专以弄权谋私为能,或循私枉法,以曲为直,或谄畏权贵,颠倒黑白,或纵容猾吏,为害百姓,这样的官,岂不是才能愈大,害民愈烈吗?老百姓对他能够服气吗?民心不服,怨声载道,久而久之,怎能不有侮慢“犯上”之举!

《管子》云:“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听,公之谓也。”说得也是惟有公道可以服人、服天下的意思。公其心,则万善出,何愁治理不好一方?所以,为官者若能治公事而不营私家,在公门而不言货利,当公法而不阿亲戚,公事公办,不偏不党,百姓自然心悦诚服,又何“慢”之有!所以曹端说:“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

(下转第76页)

145年前，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规模空前、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间持续了14年，势力扩展到18个省，建立了政权和法制。这场伟大农民战争的风暴，不仅沉重打击了清朝封建反动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而且还猛烈涤荡了封建社会固有的以及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而来的伤风败俗、祸国殃民的污泥浊水，积极开展了严厉打击赌博、娼妓、吸毒活动的斗争，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也为后人提供了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1

洪秀全在发动金田起义和建立农民政权之前，在宣传其创立的拜上帝教教义时，其早期著作中就曾苦口婆心地劝人：（一）戒赌。《原道救世歌》说：“第六不正为赌博，暗刀杀人心不良。戒，戒，戒！理不当”。“无所不为因赌起，英雄何苦陷迷乡。不义之财鸠止渴，士农工商耐久长。千个赌钱千个贱，请尔易虑细思量”。（二）戒淫。《原道醒世训》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天下男女都是“皇上帝”“生养保佑”的兄弟姊妹，不得淫乱，兄弟不得蹂躏侵害姊妹，姊妹不得自贱自弃。《原道救世歌》强调“第一不正淫为首”。（三）戒毒。《原道救世歌》说：“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颠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天父诗》说：“吹来吹去吹不饱，因何咄蠢变生妖。戒烟病死胜诛死，脱鬼成人到底高”。

在金田起义前夕，洪秀全进一步制定了拜上帝会的教规《十款天条》，作为会众的道德行为规范。《十款天条》脱胎于“摩西十戒”，而根据中国国情，在“第十条不好起贪心”条下，增加了“赌博、买票、围姓，皆是犯天条”的具体规定。“买票、围姓”都是清朝道咸年间两广尤为盛行的大规模赌博活动，“围姓”应作“闹姓”，即以乡闹——文武举人考试中试的姓氏来赌输赢。除“围姓”之外，还有山票、铺票以及白鸽票等。这无疑是对当时社会特别是两广社会赌博之风盛行的积弊而制定的。第七条强调“不好奸邪淫乱”，规定：天国男女都是“天堂子女”，是平等的，“凡男

太平天国的 禁赌 禁娼 禁毒

● 邱远猷

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十款天条》第七条还把“吹洋烟”即吸食鸦片，提到“犯天条”的高度，加以禁止。《十款天条》是拜上帝会共同遵守的生活准则，这既反映了拜上帝教规的严肃，同时也表现了洪秀全等人企图以此拯救社会的愿望。金田起义建立太平天国之后，就成为人们遵守的军纪国法。

2

太平天国建立以后，洪秀全更是运用政权和法制力量来实行禁赌、禁娼、禁毒。

天王禁诏把赌棍列为“生妖十九项”之一。法律明文规定：“凡朝内军中如有兄弟赌博者斩首”。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发布告示规定：“娼妓最宜禁也。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倘有习于邪行，官兵民人私行宿娼，不遵条规当娼者，合家剿洗，邻佑擒送者皆有赏，知情故纵者一体治罪，明知故犯者斩首不留。”太平天国法律还规定：“凡我们兄弟俱要各归各衙，不准私人过馆及在别馆寄宿等弊，违者斩首”，其用意主要是为了反对蹂躏妇女的娼妓制度。1852年3月17日，太平天国在

永安发布法令，严禁“吸洋烟”，如有违令，“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当太平军向长江流域中下游进军时，又在法律中具体规定：“凡我们兄弟俱要修正炼好，不准吹洋烟……犯者斩首不留。”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南京后，洪秀全在《劝人戒鸦片烟诏》里郑重指出：“戒烟病死甚殊死，脱鬼成人到底高。”并且再颁禁烟法令：“洋烟……不可贩卖吸食也。洋烟为妖（指清朝统治者）夷（指外国侵略者）贻害世人之物，吸食成瘾，病入膏肓，不可救药……倘有贩卖者斩，吸食者斩，知情不禀者一体治罪。”太平天国的禁烟法令，不仅针对国内的鸦片吸食者、贩卖者、开馆者，还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鸦片侵略。太平天国断然宣布鸦片贸易为非法，并采取措施，严防输入进口。1853年，太平天国方面由罗大纲告诉美国人“不应再卖鸦片”。1854年6月，东王杨秀清命翼王石达开、卫天侯黄玉昆回答英国“拉特勒”号舰长麦勒西的三十条提问时，郑重申明太平天国禁烟的严正立场。天王洪秀全还亲自对一个外国船将说：“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将来事定，惟有洋烟勿再来华。”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重申严禁“一切生熟……鸦片”，而且提出了四条措施：一是“先要禁为官者，渐次严禁在下”；二是“绝其栽种之源”；三是“遏其航来之路，或于外洋入口之烟不准过关”；四是“走私者杀无赦”。

太平天国开展禁赌、禁娼、禁毒斗争，是有它自己的政策和策略的。首先，太平天国为了力挽社会颓风，严肃太平军军纪，巩固农民政权，推进农民战争的需要，采取了严刑峻法，从重打击的政策。凡是违反禁赌、禁娼、禁毒法律法令者，原则上都处以死刑，绝不宽宥。其次，鼓励人民群众揭发检举，协助天国开展斗争。再次，有时也注意用教育与惩办相结合的办法，采取疏导方针。如太平天国对民间赌犯的处理就没有像在官兵中那么严厉。总的来看，太平天国禁赌、禁娼、禁毒斗争的政策与策略，主要方面还是积极的，可以肯定的。但也有失之过严之处，即对违反禁赌、禁

娼、禁毒法律法令的人，原则上一律处死刑，而没有区别已经犯罪与一般违纪、重罪与轻罪、惯犯与偶犯，而给予不同层次的法纪处分。而在后期也有执法不严和徇私舞弊的趋向，如苏州钱竹溪，曾于1851年为清科试案首，后应太平天国科举考试取为秀才博士，因吸食鸦片，被查出后，仅处以杖责，荷校鸣锣示众；蒋知虚吸烟更被恩谕查放。

3

太平天国开展禁赌、禁娼、禁毒的斗争，是很有成效的。

太平天国后期在苏浙开辟了根据地。可是，在这些水网地区，赌魁豪徒拉起“枪船”（土匪武装），称霸一方，扰乱治安，危害天国。当时盘踞在苏州、松江、嘉兴、芜湖各地的“枪船”，还经常勾结地方团练、聚赌闹事械斗，甚至与太平军公然对抗。1862年忠王李秀成下令并指挥所部剿洗枪匪赌徒，一举获胜。当时许多地主阶级文人也不得不承认：“旬日内波恬浪静，四境肃清，反赖长毛（指太平军）之力，为除一害。”可见，太平天国禁赌是很有成绩的。

太平天国禁娼也是很有成绩的。太平天国的英人朋友呤喇以自己的亲身见闻回忆说：太平天国“废除了……卖淫”。“太平天国妇女中结婚成家庭一员，或入姐妹馆，而不准单身妇女有其他生活方式，这条法令是为了禁娼，违者处以死刑，自然这是非常有效的办法，因此在太平天国所有城市中，娼妓是完全绝迹的。”呤喇这段话难免有溢美之词。事实上，在地主阶级腐朽落后思想的侵蚀、泛滥和包围下，在当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极其低下的历史条件下，在战乱不已、社会秩序不安定的环境下，在太平天国管辖区的所有城市中，要使娼妓“完全绝迹”，是不可能办到的。但是，可以肯定，经过太平天国法律的严行禁止和打击，“在太平天国所有城市中”，娼妓将大大减少或基本绝迹是可能的。

太平天国禁毒成绩更为显著。1853年11月12日，太平天国在天京新桥拿获吸鸦片烟犯周亚九、李连升、于顺添三人后，由巡查稟报检点、丞相。丞相上报给北王韦昌辉、翼王

石达开。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禀报军师、东王杨秀清。而后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联衔奏天王旨准，将三犯斩首：

“小弟杨秀清立在陛下暨小弟韦昌辉、石达开跪在陛下。奏为吹吸洋烟大犯天条事：缘据夏官正丞相何震川禀称，转据殿右贰检点胡海隆禀称，前叁巡查赖桂英于拾月拾捌日在天京城内新桥地方拿获周亚九、李连升、于顺添等朋吹洋烟一案，并起获烟具烟泥等件，已由该官承审确实，取有口供禀报前来，弟等未敢擅专，理合肃具本章，粘附原供，启奏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御照施行。

御照：弟等所议皆是，周亚九等即斩首不留。钦此。”

1855年，林来发等因犯吸食洋烟，列王奏旨斩首，天父开恩奴落监牢。祁万如、胡琰祥等因吸食洋烟被黜为奴。

时人王永丰说他在南京亲自看到的情况是：“鸦片烟之禁尤严，劝善惩恶”。南京地区，由于执法严肃，“鸦片烟断绝”。1861年12月，忠王李秀成攻占外国侵略者输入鸦片的基地宁波以后，立即严厉取缔鸦片买卖和防范鸦片入口走私活动。据美国鸦片公司“怡和洋行”宁波支店负责人格林的报告说：两个月来，连“一箱鸦片都没有卖得出去”。“一家开设在中国的大商行（邓特洋行），拟在南京上游五十余里的芜湖和太平天国建立鸦片贸易，曾派鸦片船‘尼姆纳号’停留在芜湖6月之久，可是结果终未成功”。

太平天国禁赌、禁娼、禁毒的斗争，在当时不但具有反封建的意义，同时也具有反资本主义侵略的意义，这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主

要是指太平天国禁毒斗争锋芒，还指向了当时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走私，给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维护了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1853年4月，英国任香港总督兼驻中国公使文翰在访天京以后，综合了他及其随员所搜集到的情报，得出结论说：“如果叛军（指太平军）成功，……他们无疑会允许通商的，不过从他们的出版物以及他们的行为看，我们可能推断他们将严禁鸦片。”呤喇说：“太平天国的法律以鸦片为违禁品，吸者处死，一切违法者均斩首不贷。由于鸦片是每次对华战争的主要原因，由于人人知道太平天国获得成功就要彻底废除这种贸易”，因此，“英国政府以及所有鸦片商贩至今敌对革命军”，“列强一致来扑灭在被鸦片毁灭的中国中所崛起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事实也是如此。正当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风暴席卷长江两岸、清朝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英、法在俄、美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扩大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取得的侵略权益，开辟更多的市场，倾销更多的商品，并使鸦片进口完全合法化。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一位西方国家的作家说过：“1858年……订的条约，他们（清政府）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了。……太平天国却不是这样。……明白了这些事实，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及商人都反对太平天国。”由此可见，呤喇所说的话是多么深刻，同时也足以说明太平天国禁烟主张的历史作用所在。太平天国禁烟主张及其实施所表现出的这种反侵略的严正立场，同清朝的屈膝卖国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责任编辑 萧 徐）

作者李茂林来信说：《炎黄春秋》今年第5期刊登他的文章《长征：共和国在马背上》，第24页中栏，在“贺电称我们的民族英雄与红军领导者”中，漏掉了彭德怀、萧克，特此补正。

作者辛平来信说：《炎黄春秋》今年第7期刊登他的文章《有关记述长征故事的故事》，第61页一栏，“化名施平”应为“化名廉臣”，特此更正。

欧阳修严以责包拯

● 春 江

包拯和欧阳修，是北宋仁宗年间的两位名臣，也是两位清官。可是，就是这两位清官之间，却产生过尖锐的矛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朝野，直至今日回顾此事，仍然具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这场风波，是由欧阳修挑起的。他首先对当时正得到仁宗皇帝信任，事业十分顺利的包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1059年3月（嘉祐四年）包拯任御史中丞。当朝有位任三司史的张方平，由于利用职权贱价收买他人的房地产，包拯弹劾张方平失去廉耻，不宜身居高位，由宋祁接任三司史。宋上任不到20天，包拯又指出宋祁游宴太多，铺张浪费，不懂理财。同时他的哥哥宋庠在朝中任副宰相，兄弟不宜同朝执掌财权（三司史执掌财政大权），宋祁又被免去三司史之职。宋仁宗经过一番认真考查和选择，任命弹劾张方平、宋祁的包拯为三司史。包拯曾担任过户部判官、户部副史，又长期担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史，在管理财政方面，是有经验有政绩的。他没有谦让就准备上任，于是朝臣之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张方平、宋祁是两位有声望的大臣。包拯弹劾掉这两位大臣，本已得罪了一些人，引起一些议论，在当时上层提倡名节、谦让、避免形迹的情况下，包公又不经谦让就准备上任，议论之声愈烈。

首先挺身而出的是威望很高的欧阳修。他于嘉祐四年三月向仁宗送上了“论包拯除三司史上书”的奏章。

欧阳修在这篇有名的奏章中，有三个很精彩的部分。首先，他很严厉地指出了包拯的不

妥之处：包拯“逐二臣，自居其位”，“中外喧然”，“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也就是说：有人牵牛糟蹋到别人的庄稼，固然不对，而乘机把别人的牛夺过来变为自己所有，也太过分了。不愧为文学家的欧阳修，还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猛手探物，口云不欲，虽然自信，人谁信之。此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欧阳修把包拯的行为，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军旅之事先才能，朝廷之事先名节”。朝臣的文官是“主教化”的，“以风动天下”，所谓名节就是“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利于苟随”。他希望包拯能“执节守义”，“以避嫌疑”，而使 he 惊异的是“常人皆知可避，而包拯岂独不畏哉”。

第二个很有趣的内容是：欧阳修对包拯批评虽然很严厉，但是，并不一棍子打死，在批评的同时，却又明明白白地肯定了包拯的一些很重要的优点和长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不思。”“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好一个欧阳夫子，在批评人的时候，又能够肯定“刚”、“直”、“孝”，全是一个赞扬的口气，多么难得，多么可贵，多么值得人们学习啊！九百多年前，欧阳修在“实事求是”方面已经做出典范了。时至今日，即使学过马列主义的人还经常犯片面性的错误呢。

第三个内容，他对宋朝数十年来关于“纳谏”，也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经验教训，作了很精彩的总结。“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

习成风俗，不以为非。”也就是说，由于朝廷过分地提倡服从、纪律、听话，有些朝臣便产生了见风使舵，不讲真话，干劲不足，纪律松弛的毛病。后来发展到“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也就是说：朝廷增设了谏院，重用了敢讲真话、敢提意见的朝臣。谏官的权力很大，可以批评包括宰相在内的所有的朝臣甚至包括皇帝。而宰相却没有权力撤他的职，钳他的口。于是“久弊之俗，骤见而骇”。当批评的空气形成以后，又有人不习惯不满意，很反感，指责谏官：“或以谓好评阴私，或以谓互相倾陷，或谓沽名钓誉，或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这种矛盾现象，幸亏仁宗皇帝能够“至圣至明”，察见诸事“非为己利”，“谏间不入”，才使这种批评之风，保全下来。欧阳修很有感慨地总结出这样一句话：“是则纳谏之善，从古所难。”

纳谏，接受批评和建议，太重要了，太美好，也太困难了。难就难在“非为己利”，追求“义”，追求真理，不搞一棍子打死，不搞片面性，

要实事求是。欧阳修的这一批评，虽然有些过于严厉，但是也有他合理的部分。性格刚直、比欧阳修大8岁的包拯，虽然并不完全赞同这些意见，但也未作任何争辩，冷静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回家休息了一个时候，仁宗重新坚持要他上任，包拯才泰然出山。这场轩然大波也就这样解决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在937年之前，封建皇帝宋仁宗，就大力提倡批评和监督，而且成立了谏院，赐给谏院有独立行使批评监督的大权，除了皇帝本人以外，不受任何大臣的制约，因此，批评之风盛行，连包拯这样的清官，也要老老实实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公开的，是健康的，是实事求是的。古往今来，批评和监督是一件难事，但只要有决心，也是完全可以办好的。

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它闪耀着我国古老文化的灿烂光辉，它与世界的文化是相通的，与今天的生活也是相通的，很值得人们深思、回味。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上接第71页）

为政之要，曰公曰清。常言“政声人去后”，如果为官者离任后，吏畏之，民怀之，则说明他的官当好了。曹端答郭晟问政，就是要他作一个“吏畏民怀”的公正清廉之官。

关于“公生明，廉生威”

“公生明，廉生威”两句，是明代山东巡抚“恭定年公”（年富）在刻制第一个官箴石刻时加上去的。乍看起来，好象是前面两句的概况和总结，然仔细分析，又不尽然。

“公生明”一语本出《荀子》。明者，明察也，谓只要大公无私，就会洞察一切是非。

“廉生威”一句虽然亦为年富所加，但它可以视作曹端以廉御史三句话的归结，故不显添加的痕迹。

官箴余论

尝闻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这则官箴之所以今天仍不失其意义，是因为恪守公廉之则永远是居于官位者的要领，以古人之方，医今人之病，同样有效。前

几年，报刊上多次彰扬河北省无极县委书记刘日，据说，刘日亦以此官箴为座右铭，实在是很有见地的。为官者其兴其败其福祸于民皆在是否公、廉。也许有的人会说，今天已无“吏”这一阶层，这则官箴的意义是否减弱了呢？否。从绝对意义上讲，今天确实无“吏”可言，但从相对意义上讲，那些善于逢迎媚上、巧言令色、行贿送礼的人永远不会消失。这些人或是某首长的下层领导，或是他周围的一般干部，或是他的秘书、司机、通讯员等等，这些人又何尝不会扮演“吏”的角色呢！

这则官箴不仅是居官者之箴规，亦可作察官之明鉴。为官者清、浊、邪、正，察其是否公、廉，即可知矣。就今日言，我们干部队伍中那些贪赃枉法、挥霍人民财富的腐败分子还不是把公与廉丢得一干二净了吗？这些人不仅远不能跟古代的清官循吏相比，而恰恰是历史上那些贪官污吏的余孽。只有那些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只有那些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献身于改革开放事业的人，才肯以官箴自律，日夜惕厉，唯恐有违。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实在是民之幸，亦官之幸也。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闻一多眼中的美国

● 李凌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抨击国民党政府的黑暗腐败，被毛泽东称颂为“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的闻一多教授，早年受过美国化很深的学校教育，后又留学美国。难能可贵的是，他对美国有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的美国观，至今仍然对我们有着积极的意义。

1912年冬，13岁的闻一多，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是用美国返还的庚子赔款办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学生可以公费留美5年。教员中很多美国人，课程多是按美国标准设置的。教材也多是英文课本，甚至课外活动如演剧、讲演、辩论会等也多用英语。这是一所美国化程度很深的学校。在清华，闻一多认真学好规定课程，同时继续学习中国文学和历史，并思考中国问题。在这里他学到了广博的知识，为以后的教学和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1920年，有一家私营企业，经常在清华礼堂演出一些美国的黄色电影，闻一多和他的同窗好友潘光旦等就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同学们进行抵制，终于迫使该商人停演这类片子。1922年，闻一多在即将毕业之际，发表了《美国化的清华》一文，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母校的深厚感情，但同时又指出，许多清华学生，在选择专业时，只是从将来“吃饭”，“出洋”回来当经理、买办出发，缺乏伟大的抱负，没有人生理想；只重视英文，不重视中文；好摆阔气，好出风头，办事不彻底，等等，他认为，这都是受美国化不良方面的影响造成的。他说，这种美国化的结果是：“物质主义……平庸、肤

浅、虚荣、浮躁、奢华。”他对美国化的教育的认识是一贯的。24年之后，即1946年4月在昆明一次集会中，他对青年人说：从美国的教育中，可以学到科学知识和技术，但是，“它教我们只顾自己，脱离人民，不顾国家民族，这就是所谓的个人主义吧！”他希望青年们改变这种状况，走爱人民的道路，这样，学到的知识才能对社会有用。这时的闻一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以前更加深刻了。

1922年7月，他在清华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纽约艺术学院等院校学美术，他看到了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看到了美国的广阔和活力。他赞叹美术馆的壮丽辉煌、美术珍品收藏的丰富和美国艺术家高水平的艺术作品和审美能力。他还看到美国有不少优秀影片，并不像过去在清华看到的都是些海淫海盗的片子。他还认识了许多正直善良的、热心助人的、喜爱中华文化的美国朋友，并和其中的一些人结成终生的深厚的友谊。但整体来说，他不喜欢美国，特别美国的种族歧视使他深恶痛绝。到美国后不久，他就给父母写信说：“美国只知白种人也，有颜色之人（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法、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何者落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士大夫久居此邦而犹不发奋为雄者真木石也。”

接着，闻一多就多次亲身体会到种族歧视的滋味：他在校获得最优秀名誉奖，按规定应送欧洲艺术之都巴黎、罗马深造，但因他是中国人而被取消；他的好友梁实秋驾车与另一由美国白人驾驶的汽车相撞，警察不问情由，只因梁是中国人，就把梁抓起来，并罚款170美

元；毕业典礼时，没有一个美国人愿意和中国人排成一列去领毕业证；清华校友陈长桐到理发店理发，因为他是中国人，老板不给他理……这许多事情都使他感到极端的屈辱和痛苦。他往往宁可呆在家里，留长头发吃冷面包，也不愿外出受辱。他多次给亲友写信说：“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彼之贱视国人者一言难尽”，令人“痛哭流涕”，又说：“美利加非我久留之地”，“蜚居异域，何殊滴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

因此，他提前两年，即1925年6月就回国了。在20年代他写了许多爱国诗，其中有的是针对美国的。如《孤雁》一诗，篇首引了杜甫的一句诗：“天涯涕泪一身遥”，点明主题。他把自己离开祖国到美国来比作是一只离群的孤雁，来到这“苍鹰底领土”、“腥臊的屠场”。在这里，“鸷悍的霸王”“建筑起财力的窝巢”，“钢筋铁骨的机械，喝醉了弱者底鲜血”。这些描绘美国社会形象的诗句，说明诗人对帝国主义的罪恶已有较清醒的认识。

他还写了一首《洗衣歌》，序中说：“国人旅外之受人轻视，言之心痛。假洗衣匠口吻作曲以鸣不平。”这首诗以悲愤的心情描写华人在美国的屈辱生活，表现出诗人对种族歧视的愤慨和对一些美国人的罪恶和贪心的斥责：“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本文作者按：唐人即华人）“流一身血汗洗别人的汗？你们肯干？你们肯干？”

另一著名诗人朱自清写道：“抗战以前，他（按指闻一多）差不多是唯一有意大声歌咏爱国的诗人。”这是符合实际的。

回国以后，闻一多历尽坎坷。

1932年回到清华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抗战期间，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共同组成西南联大，他随清华到西南联大任教。目睹国民党军队在日寇进攻面前节节溃退，政治上贪污腐败，物价高涨，民不聊生，从1943年起，他走出书斋，从诗人、学者转变成为一个为民主而斗争的猛士，在中共地下组织和民主同盟战友们的帮助下，他的思想获得飞跃进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在美支持下发动内战，遭到全国人民反对。闻一多走在反内战运动的前列。在1945年8月15日的时事晚会上，闻一多和吴晗等作了讲演，闻一多说：“美国反动派在制造我们的内战”，“谁在帮助我们内战，我们就反对谁！不管他们有什么原子弹，我们还是要反对！你美国人敢用原子弹杀中国人民，我们不怕！”对美国在二战中打败德意日法西斯所作出的重大贡献，闻一多是赞赏和感谢的；但是战后美国出钱出枪并把国民党军队大批运到东北华北打内战，闻一多则是坚决反对的。闻一多的爱憎分明，在同一次讲演中，他说：“凡是人民都应该站在一起”，“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不分的，但是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是要分的”。经过学习，思想提高了的闻一多已经从过去单纯的对种族歧视的憎恶发展到懂得把反动派和人民分别对待了。

他的这些言论，美国政府是注意到了的。美国驻昆明兰登敦总领事在给美国驻华大使的第85号快报中写道：“闻一多和吴晗批评了美国支持重庆，控诉了美国强化压迫人民的军队。”尽管知道他们所支持的国民党军队是压迫人民的，但美国政府继续一意孤行。

1946年1月13日，马歇尔来华代表美国总统“调停”中国内战。闻一多和费孝通、潘光旦、吴晗等四人联名给马歇尔写信，希望国际友

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的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助力”。具体措施包括改组政府，取消特务组织等等。这封信当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美国名义上是调停，实际上是加紧武装国民党军队，并继续大量把他们运到内战的前线。于是，闻一多与19位著名教授联名于1946年5月2日，再发表《致马歇尔将军书》。如果说，1月13日的那封信还比较委婉，第二封信则是直截了当地对美国进行了批评。信中尖锐指出：“国民党军用以进攻和屠杀中国人民的一切武器装备和运输工具，都是贵国以援华的名义所供给它的。”信中要求美国马上停止这种行为。

诉诸上层的这些信，当然不会有什么效果。闻一多寄希望于美国人民。在1946年6月29日（即他被暗杀前16天），在民主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闻一多说：“我们可以发动美国人民控诉美国政府的运动。从美国内部来看，两个政党间的进步分子及下层平民正将有自由工人联合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发展将大有影响于美国未来的政治。”闻一多希望通过美国大多数人民和进步力量，利用美国舆论和议会民主制度，能改变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但他更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人民自己身上。在同一次讲演中，他继续说：“我们对外力的作用，不必估计过高。只有坚信自己的意志，把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人民的意志才是真正的力量”。

抗战胜利以后，原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决定于1946年5月4日结束，师生分批北上复校。曾经胜利地进行“一二·一”运动，给国民党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因而获得“民主堡垒”光荣称号的西南联大的师生陆续减少。反动派以为时机到来，加紧活动。从1946年五六月起，昆明街头大量张

贴反动标语,并散布流言诬蔑爱国民主人士,把闻一多叫“闻一多夫”(即说他是苏联特务),多次寄匿名恐吓信,派特务监视,还扬言要用40万元买闻一多的头,气氛十分恐怖。联大的进步同学、地下党员、亲友们都劝他早点离开。正在这时,美国加州大学以可以带家眷的优厚条件聘请他去讲学,他都婉词谢绝了。理由是:民主运动需要我,中国需要我。

7月11日,联大最后一批师生集体离昆,反动派急不可待,当天晚上就暗杀了闻一多的战友、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悲愤欲绝,他明明知道,黑名单上第二个就轮到,但他还是于7月15日上午毅然出席了“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并在会上发表了气壮山河的最后的演讲,痛斥反动派,并大声宣称:“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崇高情操,“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下午,闻一多就被特务用美制手枪杀害。

李公朴、闻一多遇难后,中外震惊,悲愤莫名,全国人民掀起强烈的抗议高潮,使国民党陷于更大的孤立,加速了它的灭亡。周恩来在悼词中写道:“我谨以最虔诚的信念向殉道者默誓:心不死,志不绝,和平可期,民主可望,杀人者终必覆亡。”闻一多的挚友、著名的诗人朱自清在《挽一多先生》的诗中写道:“你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新中国!”正如他所预言,闻一多被暗杀后三年多,国民党反动派和它的后台老板美国反动势力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新中国诞生了。

(责任编辑 洛松)

关于《光明日报》变换报头 真实情况的说明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5月号所载《报头变换光明日报曾起风波》一文,所说变换报头的情况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现将我知道的实际情况说明如后:

我于1957年到光明日报社工作后,社内外许多同志和广大读者,多次建议换用毛泽东题写的报头。1964年夏天,我曾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当时,他以为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曾说: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沫若写的报头,都不再给题写。这事便拖下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坚持报纸的正常出版很不容易。当时全国性报纸中,很少不是毛泽东题写的报头。有的“造反派”,想拿《光明日报》的报头作文章。本来,我们换用毛泽东题写报头的愿望始终没有放弃,仍然盼望能够实现。当时毛泽东特忙,不想再为此事给他增添麻烦。后见毛泽东1963年1月24日手书《满江红》末页,有“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字样。1966年12月下旬,就以其中的“光明日报”4字制成报头,并将所制的版样送请他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启用。

由此可见,该文所说新报头是在“毛主席给郭沫若的一封信中,选出这4个字”的“集字体”以及有关的描绘,是不对的。

当时所据毛泽东手书《满江红》,写在16开大小的宣纸上。共计12页,“郭词见……光明日报”是末页的最后两行。现把手迹末页的“光明日报”字样和该报仍在沿用的报头一并复印附寄,以供读者了解真相。

穆欣 1996年6月25日



光明日报

GUANGMING DAILY 1996年5月28日 星期四 第四版 中国新闻纸 109432号 定价1.10元

『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征稿启事

为了庆贺香港回归祖国,表达海内外炎黄子孙的欣喜之情,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人民日报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经济日报特刊部、新华社瞭望周刊社、广东中华诗词学会、河南诗词学会等24家新闻出版单位和诗词文化团体共同举办的“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经文化部批准,正式开赛,欢迎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中华诗词爱好者踊跃投稿参赛。

一、征稿内容:欢庆香港回归祖国,颂扬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讴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宏伟大业,赞美祖国光辉灿烂的将来。

二、作品体裁:符合诗词艺术规范的古风、律绝、词曲。每位作者限送两首未发表的作品参赛。正楷誊清,一式两份(一份不署名)。另附百字以内的简历及通讯地址、邮编。不收参赛费,亦不退稿。

三、征稿日期:自公布之日起至1997年1月31日截止(以当地邮戳为凭)。同年6月在北京颁奖。来稿请寄北京市东城区北兵马司17号“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办公室,邮编100009。信封左下角注明“参赛作品”字样,勿寄个人。

四、评奖:大赛设奖位150个。由著名诗人、学者霍松林等17人组成评选委员会,采用匿名打分方式,实行初评、复评、终评三级筛选,评出一等奖3名,奖金各5000元;二等奖15名,奖金各2000元;三等奖32名,奖金各1000元;佳作奖100名。分别给各项奖颁发证书和金、银、铜质奖章。另设荣誉奖及组织奖若干名,以表彰为大赛活动做出贡献的单位与个人。

五、获奖作品展示:获奖作品结集出版;请书画名家就获奖作品进行再创作,编辑出版《“回归颂”——庆贺1997香港回归祖国诗书画集》,并拟在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香港等地举办诗书画巡回展;精选部分获奖作品谱曲,举办“回归颂”诗词吟唱晚会。

六、“回归颂”中华诗词大赛组织委员会由周谷城、王光英、程思远、卢嘉锡、吴学谦、杨汝岱、安子介、马万祺、萧克、臧克家、鲁平、周南、强晓初、翟泰丰任名誉主任,26位知名人士任顾问,孙轶青任主任,同向荣、杨伟光、杨应斌、陈昌本、张锲、张振华、梁东任副主任。

1996年10月

披露历史秘闻追踪社会热点
展现环宇新潮感受时代震撼

共 鸣

邮发代号 46-136

综合性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1997 精心策划重点推出

《共鸣》创刊十年,以真实为生命,新的一年,将以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栏目、独特的内容,与你共鸣。

社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39号6楼

本刊为16开本月刊,每月1日出版,定价人民币4元整,欢迎海内外读者订阅、邮购。

电话:(020)87379606 87379607

邮编:510600

- 本刊特稿——由本刊采写的独家专稿,深刻反映读者关心的当代重大问题,有广度,有力度。
- 历史长焦、当代风云——亲历者以第一手资料揭示历史事件的真实面目,披露历史人物的曲折经历。
- 港澳多棱镜、台岛万花筒、海外传真——全方位介绍港、澳、台及海外风情世貌、奇闻异事,引人入胜。

风云激荡 爱国情深
欢迎订阅 《大江南北》

《大江南北》创刊于1985年8月15日,是一本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的综合性刊物,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是她的主旨。《大江南北》具有以下特色:

一、深刻严肃的主题。颂扬爱国英雄和革命志士的光荣业绩和崇高精神是贯彻始终的主旋律。

二、真淳纪实的风格,以真实为本,以善美为标,不哗众,不虚饰。

三、独树一帜的布局,集历史、现实、学术、文学于一体,交织成风云舒卷的画卷。

四、关心老区的情怀。反映老区的今昔,促进脱贫和建设。

《大江南北》(月刊)每月5日出版。今年定价每期2.80元;明年定价每期3.20元。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111/K,国内代号 4-443。

全国各地邮局报刊门市部办理订阅。

炎黄春秋



冰心和她的儿女



吴清源（左三）和我伟长、唐克等同志在会议上

跟着红军走到如今的扎喜旺徐
吴清源驰骋日本棋坛六十年
毛泽东和京剧演员李和曾
台湾作家的乡土情中国心
太平天国禁赌禁娼禁毒
闻一多眼中的美国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00元